

第 四 版



歲月蒼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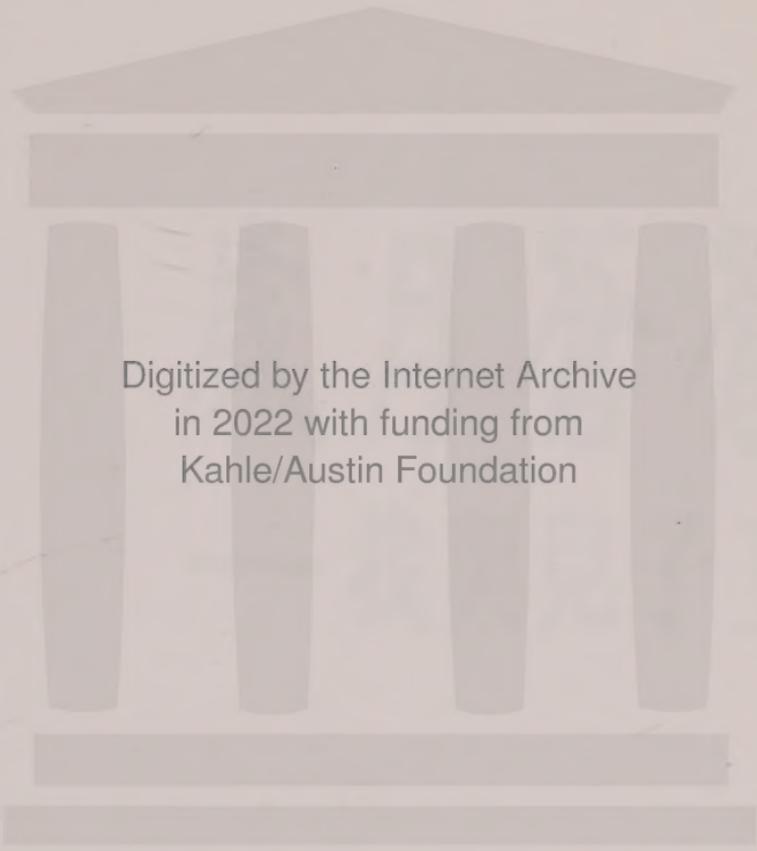
——我與兒子王丹

王凌雲



作者簡介：

王凌雲，山東省荷澤縣人，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成長在戰亂年代。一九五五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從事近代革命史的陳列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二年晉升為研究員。著有《關向應傳》、《黃花崗起義》等，發表有《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改革》、《陳獨秀》等多篇文章。「文革」後期，攜帶六歲的女兒和一歲的兒子赴「五七」幹校，在鄱陽湖畔「戰天鬥地」。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曾經坐牢，遭受公安機關監視、跟蹤，陪伴兒子走過九年風雨歷程。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2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歲月蒼蒼

——我與兒子王丹

王凌雲

歲月蒼蒼

目 錄

《歲月蒼蒼》序	許良英	i
寫在前面的話	王凌雲	ii
第一章 春風夏雨		1
電詢安危		2
觀「四·二七」大遊行		6
在絕食的日子裏		10
「六·四」之晨		16
黑雲壓城		20
收看通緝令		23
抄家		26
第二章 鐵窗軼事		29
帶病入獄		30
提審		33
初嚐階下囚的滋味		37
一塊榨菜		40
幻覺		42

歲月蒼蒼

爲難友講歷史	45
爲受罰者搨扇子	47
左腿罹病	50
取保候審	53
第三章 日月蒼涼	57
故鄉所聞	58
苦度日月	61
第一次會見	64
寒風蕭蕭	68
爲請律師奔走	71
出庭旁聽	74
開庭之後	78
大年初二闖秦城	80
第一次探監	83
寒春苦夏	85
接孩子出獄	88
第四章 春寒料峭	93
孩子回到了家	94
始料未及	98

歲月蒼蒼

深深眷戀着北大	101
「奉命」離京	104
佛山被扣	107
生日的坎坷	109
歡笑伴着陰影	112
樹欲靜而風不止	115
由跟蹤到恫嚇	118
第五章 兩地悠悠	123
難忘五月二十一	124
家再次被抄	126
抗爭	129
轉移前後	132
威脅恫嚇無奈何	135
絕食牽動着人們的心	139
爭取讀書權	141
悠悠兩地思	145
相互慰勉	150
法律何在	153

歲月蒼蒼

第六章 秋風蕭蕭	157
匆匆回京	158
迎接風雨	160
咄咄逼人	163
欲加之罪	166
嘔心瀝血寫辯詞	169
母子相見	172
等待開庭的日子	175
開庭之前	178
蕭瑟秋風今又是	182
第七章 正氣凜然	185
申請迴避	186
法庭調查	188
自我辯護	191
爲王丹辯護	195
法庭辯論	198
其心昭昭	200
宣判	204
相見	206
欲蓋彌彰	209

歲月蒼蒼

舉世嘩然	213
無聲勝有聲	216
再見王丹	220
十分鐘裁決	222
憤而靜坐	225

第八章 冬日漫漫 227

迎接苦難	228
首赴錦州	230
第一次探監	233
「我是一棵大樹」	237
人間真情	239
冬天裏企盼春天	243
一般情景兩番心情	247
生活的失落	251
異國相聚	254

母親是我的精神支柱

——《歲月蒼蒼》後記	王丹 259
------------	--------

歲月蒼蒼

王凌雲《歲月蒼蒼》序

許良英

這是一本不同尋常的回憶錄，作者王凌雲女士以凝重感人的筆觸訴述了她的兒子王丹兩次被捕入獄前後母子二人的遭遇和情思，譜寫了一曲令人憤慨和心酸的悲歌，它既有震撼力，又發人深省。由於對自由民主的共同的真誠追求，王丹和我成了忘年交；他的不幸遭遇，又使我和他的父母成了知交。我為王丹有



正氣凜然，威武不屈——本書作者王凌雲。（作者提供）

歲月蒼蒼



王丹同恩師許良英先生在一起。(作者提供)

這樣一位正氣凜然、威武不屈的母親而感到欣幸。出於這種緣分與情誼，王凌雲囑我為她這本洋溢着風雨如晦歲月中相依為命的母子情的回憶錄作序，我自當

欣然應命。

王丹是一九八八年五月認識我的，我則是那年秋天才開始認識他。在此後半年內，我們有過多次交談，議論的主題從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到新權威主義和籌安會，以及當前的中國民主思想啓蒙

歲月蒼蒼

運動問題。一九八九年四月學潮爆發後，我們有四年無緣見面。「六·四」血案後，方勵之夫婦首先被通緝（當時官方報刊稱我是方勵之的「密友」，此言倒不假）；接着，二十多個學生被通緝，王丹名列榜首；王丹抓到的第二天又把他的母親抓去關了五十多天。這些都充分暴露了當政者的瘋狂與暴戾。一九九三年二月王丹第一次出獄後三天，就由他父親王憲曾陪同來看我，以後兩年多時間裏我們經常見面，談論的問題很多，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都取得了共識。在《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呼籲書的起草和徵集簽名的過程中，我們都合作得很好。想不到在「寬容呼籲書」發表後不久，他又遭拘禁，並被抄了家。爲了讓我及時瞭解王丹的處境，他父母常來向我通報情況，並商議對策。從此我也認識了心儀已久的他的母親。

王丹被無辜關押了將近一年半之後，權貴們於一九九六年十月演了一齣所謂公開審判的鬧劇，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給王丹判了十一年徒刑。這純屬莫須有的冤案，我即寫了一篇題爲《爲王丹辯護》的文

歲月蒼蒼

章，向世人昭示真相。王丹被判重刑後，被送到遠離北京一千二百里的錦州監獄。當時王丹父母都已年屆花甲，而他母親還拖着七年前在獄中被摧殘的病體。他們每個月都不顧旅途困頓去探視王丹，每次從錦州回來總要向我訴述與王丹見面的情況，讓我共享他們親子之間的離合悲歡。在國內外主持正義者的壓力下，王丹終於在今年（即一九九八年——編按）四月獲准去美國「保外就醫」，被放逐國境之外。

王丹總算得到了在國外生活的自由，但在中國當局的眼裏，他依然是一個要再服九年刑的重「罪犯」！他究竟犯了什麼罪？無非是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帶領北大同學參加悼念含冤去世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活動，由此引發了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中心口號的全國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而王丹為此坐了三年半牢以後仍不思悔改，依然執着地致力於自由民主事業。

一九八九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被自封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動用坦克和衝鋒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

歲月蒼蒼

民，造成了在中國和世界都是「史無前例」的大血案。鄧小平這一「創舉」，被前蘇聯一些老共產黨員判斷為「葬送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因為它使共產黨失盡民心，導致了東歐和蘇聯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全面崩潰。一手罷黜了兩任總書記的鄧小平，雖然貌似成功地用經濟發展來掩蓋政治上的倒退，但是欲蓋彌彰，腐敗愈演愈烈，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深化、激化，當年學生們呼喚的「反腐敗，爭民主」，今天更顯現其正確性和迫切性。如今鄧小平已經追隨毛澤東去見了馬克思，新的當政者如果能正視現實，順應民心和歷史潮流，就應該從鄧小平的新「凡是」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客觀地重新評價一九八九年的運動，為所有受害者平反昭雪，撫恤「六·四」死難家屬和傷殘者，並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同時，切實履行業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確保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以及結社自由。而所有這些公民權利，也正是當年王丹和他的同學們所要爭取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北京中關村

歲月蒼蒼

寫在前面的話

王凌雲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送兒子踏上去國流亡之路，我們家庭的歷史，終於翻過了一頁。我決定將這一頁灑滿心血和淚水的歷史寫下來，留給後代。

我這個家庭是一個普普通通知識分子家庭。我們勤於工作，安於淡泊，教育孩子努力讀書，誠懇作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王丹出獄當天同家人合影。（作者提供）

歲月蒼蒼

人。

王丹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孩子，待人寬厚，尊重長輩，孝敬父母，富有同情心，做事執着，是一個招人喜愛的青年。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怪誕的時代，成長在改革開放時期，時代的動盪，在他年幼的心靈中留下烙印；我因從事中國共產黨的黨史研究工作，時常向他講述在過去的年代裏，共產黨人反對專制，追求光明，不屈不撓，英勇奮鬥的故事；我同我先生同畢業於北京大學，都有一種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有同學、朋友來家，時常議論時政。所有這些，對王丹的成長都不無影響。他在小學、中學時代，一直積極向上。一九八七年考入北京大學，那時，社會環境比較寬鬆，在北大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熏陶下，萌發了渴求民主的理念。八九年學運給他以契機。從此，他便歷經了九年的風霜磨礪，我們這個家庭也陪伴他，走過了九年的風雨歷程。

九年來，我們這個家聚少散多，幾度悲歡，幾度離合。一家四代蒙受煎熬。王丹八十二歲的外祖父，千里迢迢，從山東前往遼寧探監，外祖母在彌留之

歲月蒼蒼

際，仍然牽掛着外孫，臨終時最後一句話還在問：北京來信了沒有？王丹第一次入獄後出生的小外甥，同舅舅感情甚篤，他剛剛學會說話，媽媽便帶他去監獄看舅舅。他第二次入獄，孩子已經懂事。他雖然不說，不問，但心情也同大人一樣沉重。有一天，舅舅給他寫信，說：「等舅舅回家時，一定給你買一大盒巧克力作禮物。」當媽媽把信唸給他聽時，他卻心情抑鬱地說：「舅舅能回家，就是最好的禮物！」我同他父親、姐姐、姐夫則不遠千里，不避寒暑，奔波在探監路上，精神上的牽掛更不待言。當然，最苦的還是王丹本人。

我也有機會使王丹和這個家庭免遭於難，但卻都沒有做到。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四月末，當我得知兒子已經參與學潮，特別是聽說政府很可能要抓他時，我可以強行把他拖回來，鎖在家中。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理由強制孩子。我認為學生的行動沒有錯。「反腐敗，爭民主」的口號，道出了萬千人民的心聲。我為他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第二次是一九九三年他被假釋出獄後。出獄前，我曾想，待他刑滿釋放

歲月蒼蒼

後，只要政府開一道門縫，我也得讓孩子趕快出國，爲此，我也曾多方託人在美國爲他聯繫學校。可是，當他出獄後，我卻沒有勸他出國，一是出於作母親的私心，三年多兒子不在身邊，不捨得讓他即刻遠去；二是他決心留在國內做些事情，我尊重他的選擇，只是怕學業荒廢，多次催他聯繫學校。半年後，他獲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函授，不久，又參加高教部組織的自學高考。我的心踏實了許多。在此期間，儘管王丹同政府間坎坎坷坷，我家也不平靜，但我總覺得，只要兒子不做違法的事，堂堂皇皇之下，政府不會再度將他下獄。

豈料，一九九五年當權者再次把他囚禁，秘密關押十七個月之後，以莫須有的罪名，不顧國際輿論的強烈呼籲，公然對王丹判以十一年重刑。我徹底失望了，毅然走上營救兒子的漫漫之路。我爲他伸冤，爲他奔走，不遺餘力。在國內外正義呼聲的壓力下，王丹獲得了自由。這種自由對他來說是苦澀的，有國難歸，有家難回。我苦苦企盼兒子歸來，結果卻是，兒子兩手空空，踏上了不歸路。

歲月蒼蒼

這本書完稿了，我如釋重負。對後人，對歷史，總算有了個交待。捲起稿紙，我又無限困惑，為什麼一個青年學生，僅僅是爲了推動自己國家的民主和進步，他及其一家卻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寫這本書，是爲了昭示國人，這樣的悲劇不能允許再在中國重演。

藉本書出版的機會，向國內外各界關心、支持、幫助過王丹和家人的組織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你們給予我們莫大的勇氣、鼓舞和信心，也正是這種正義的力量，支持我們度過那艱難的歲月。

我也感謝許良英先生在繁忙中爲本書撰寫序文。感謝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爲出版本書所做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於北京

第一章

春風夏雨



歲月蒼蒼

電詢安危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來得比往年遲。

四月十五日，天色陰沉，時有濛濛小雨。我同我先生已購好火車票，準備當晚乘車前往山東探望我的父母親。傍晚，兒子王丹從北大回家，為我們送行。一踏進家門，他便衝着我們說：「胡耀邦今天早上去世了！」語調低沉。接着，他又補充了一句：「聽到這個消息後，我流了眼淚。」話沒有多說，他便騎自行車回校了。我們倆人也揹起行李，趕乘當晚的火車。

坐在南行的列車上，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兩年前，胡耀邦被「罷黜」，在人們的心中投下了陰影。如今又突然離開了人世。我感嘆，為什麼好人總是不能長壽！從兒子來去匆匆和他那副不安的神情中，我有一種說不清的不祥預感。

這一年的寒假，他整天忙得不歸家。我很不放心。原來他正在和幾位同學忙着籌辦一個名叫《新五四》的刊物。他將由他起草的發刊詞拿給我看，我還提了點修改意見。王丹還興奮地告訴我，冰心和夏衍老人為他們的刊物題了詞。

開學之後，他參與主持一個專題討論會，說是叫「民主沙龍」。大約在三月份，他又告訴我，他領銜簽名，張貼小

歲月蒼蒼

字報，向北京大學校方要求民主權利。

兒子的這些活動，令我們不安。我們不希望他過早地參與政治活動，只要求他安安靜靜，把書讀好。

王丹的這些活動，引起了北大歷史系的關注和不滿。他們要請家長了。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們來到歷史系辦公室。一位姓陳的老師接待了我們，他滿臉陰雲，歷數了近半年來王丹的種種「不安分」的行爲。要求我們對他加強教育。「我們對王丹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他再這樣下去，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他那冰冷的表情，咄咄逼人的話語，使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沒有來得及同兒子細談，便應父母的要求，回故鄉探親去了。

回到父母身邊，心卻時時牽掛着兒子。

四月二十日，從電視新聞節目中得知，北京的學生「衝擊」了新華門。事態嚴峻。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實況轉播。我雖然不知道當天北京十萬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但卻感覺到追悼會的氣氛很不正常。此後一連幾日都有關於北京學生「衝擊」新華門的報道。聯想到王丹往日的活動和歷史系的警告，我十分不安。二十四日，我們給王丹發一封電報，詢問他「是否還在上課，平安與否」。他很快回了電報，說：「稍稍參與，尙安。」

歲月蒼蒼

獲悉兒子已經參與了學生「鬧事」，我們決定立即返回北京。那時，火車票非常難買，我們買了兩張站票，便匆匆登上北返的火車。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抵達北京。我們剛剛走出西直門地鐵站，便看到一隊學生在出站口講演，只聽見說，在新華門前，警察毆打學生，要求嚴懲「四·二〇」血案的兇手。一個學生手捧紙糊的錢箱，請求大家捐款。我沒問緣由，便投進了五元錢。

回家稍事休息，我們便急急前往北大，想見見兒子。一走進北京大學南校門，便感受到一種異樣的氣氛。只見人們三三兩兩在路旁議論着什麼。跟着人群，我來到小飯廳南面的「三角地」，宿舍樓的牆上，已貼滿了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原來，學生在幾天前已經罷課。

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即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社論將學生的愛國運動譴責為動亂。這表明，中共已經為這場運動定了性，在為日後的鎮壓製造輿論。社論措詞強硬，殺氣騰騰。

傍晚，在十二樓地質系的一間辦公室內，王丹找到了我們。他剛剛從記者招待會上回來，聽說我們在等他，便前來相見。和他同來的還有兩個同學。他告訴我們，剛剛聽說，政府要逮捕他和北師大的吾爾開希。讓我們做好思想準備。

歲月蒼蒼

一九八九年五月，王丹
在天安門廣場宣讀學生
呼籲書。（美聯社）



我聽後不禁愕然。沒說幾句話，他便急着要走，說是還有事。我送他到門外，千叮嚀萬囑咐，要他千萬不要一個人單獨在校園裏亂跑，要和同學們一起行動。

歲月蒼蒼

觀「四·二七」大遊行

四月二十六日，同兒子匆匆見了一面，在暮色中目送他湧入學生的人群中。孩子隨時可能被捕的傳言，雖然在我心中投下陰影，但還是將信將疑。大概是怕我擔心，第二天要舉行大遊行的事，他沒有對我講。回到家中已是掌燈時分，一夜的火車勞頓，在北大一天的奔走，情緒的激動，這時方感到疲憊不堪，便早早地休息了。

第二天去上班。我在天安門站下車時（我工作的單位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地處廣場東側），廣場上的情景一下子使我驚呆了。只見廣場內空空蕩蕩，往日熙熙攘攘的遊人已無蹤影。再仔細一看，三人一行，五人一隊的武裝警察佈滿廣場四周。博物館西門外，一隊隊軍警在快跑。廣場的東西兩側，軍警組成一個個方陣，在緩緩移動。這異常的氣氛好像在告訴人們，一場博鬥即將發生。

來到辦公室。同事們正在議論紛紛。有人聽說，鄧小平在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中，聲言要不惜流血，堅決制止動亂；有同事的親屬參加了二十六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的基層黨員萬人大會。市委書記李錫銘要黨員、幹部制止動亂，「不制止動亂，國無寧日」。聽着這些議論，又聯想到廣場

歲月蒼蒼

上密佈的軍警，猶如一把利劍懸在頭頂，我坐臥不寧。

不一會，傳來消息說，各校的大學生要上街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聽說學生要遊行，我想，也許他們不知道，天安門廣場已被封鎖，密佈如林的警察正在嚴陣以待。學生們若來廣場，可能會發生一場流血事件。我心急如焚，立即給北大的一位老師打電話，告訴他廣場已經戒嚴，請他設法轉告學生，千萬不要來天安門。他說：「北大的學生已經走出了校門。」我問：「什麼時候出來的？」「九點鐘左右。」我無力地放下電話。當時，我還估計不到，數十萬名大學生純情、誠摯的愛國行動因被譴責為動亂而激怒了的行動，一發不可收拾。

我怕交通斷絕，被困在博物館大樓裏，便決定立即回家。這時大約是上午十時許。我走出博物館西門，只見幾輛大轎車和麵包車停在西門內的場地上，裏面坐滿了警察，都在窺視着廣場，像是在等待着什麼。西門外的小樹林裏，隱藏着三、五成堆的警察，坐在地上待命。我沿着馬路往前門方向走，一輛輛警車，齊刷刷地車頭向着廣場。來到二十二路車站，候車的人很少。站台上坐着兩個警察，他們也不避路人，只聽見他們其中的一人問：「學生要是來了怎麼辦？」另一個說：「上邊不是說了嗎，如果有人搞打、砸、

歲月蒼蒼

搶，我們就採取行動。」

我剛剛到家，王丹的父親也從北大回來了。他看見北大的學生遊行隊伍在圍觀群眾的歡呼聲中浩浩蕩蕩走出了南校門，正向白石橋方向進發。我們顧不得吃午飯，便來到復興門立交橋，估計北大的遊行隊伍要從這裏經過。這時，橋上橋下等待觀看學生遊行的群眾已人山人海。我們找到一個有利的位置，焦急地翹首張望。

大約下午二時左右，學生遊行的隊伍過來了。從上往下看，一條洶湧澎湃的人的河流，正由北向南而來。群眾歡聲雷動，「大學生萬歲」的呼聲在天空迴盪。橋下有一隊警察，組成一道防線，在滾滾而來的學生潮流面前，顯得那麼單薄、無力。橋上的群眾高喊：「警察讓開！」「警察讓開!!」

中國人民大學的隊伍走在最前面。他們在警察的防線前停下來，兩相對峙。圍觀的群眾也安靜下來。學生沒有衝擊防線，不一會，警察撤到了兩邊。學生和觀眾同時爆發出一陣歡呼聲。人民大學後面是外國語學院、北方交通大學等院校。旗幟招展，人潮洶湧。

北京大學的隊伍過來了！遠遠地便看見一面紅底黑字的大旗迎風招展，「北京大學」四個大字，發出耀眼的光輝。

歲月蒼蒼

作為北大校友，我激動得跳了起來。北京大學這面大旗，七十年來，在民主愛國運動中，都走在前面。校旗後面是兩條醒目的大標語：

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擁護社會主義！

我們拚命地往前擠，睜大眼睛，尋找我們的兒子。當隊伍來到橋下時，我看見在北大校旗的後面，有一個由幾十名學生手拉手圍成的圓圈在緩緩地向前移動。圈內有兩三個學生，其中一個像是王丹，在奮力地帶領大家呼口號。我拚命地向他招手，沒有回應。學生隊伍中有節奏地喊着：「**北大北大，人民養大，為民請願，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我不禁想起，一九三二年，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北大學生組成南下請願團，前往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呼喊著：「**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搖旗吶喊，示威南下。不怕！不怕！北大！北大！**」想不到五十多年後，北大學生為了反對腐敗，推進民主，又喊出了這樣的口號。

群眾組成兩道人牆，把學生夾在中間，悉心地保護着他們。我們無法接近學生，始終沒有找到王丹。我們隨着洪流前進。有人推着自行車，邊走邊講演，聲援學生；有人提着

歲月蒼蒼

一桶水，奔走在學生中，不時地向學生送上一碗水；一個小販，推着一車麵包，分送給學生，目睹這感人肺腑、摧人淚下的一幅幅畫面，再看看一張張稚嫩的學生的臉龐，誰又會相信這是一場動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廣場上嚴陣以待的軍警，顯得多麼渺小，多麼無力。

「四·二七」大遊行，以慷慨赴義的大無畏精神，衝破了政治上的高壓，衝開了一道又一道封鎖線，以和平、勝利宣告結束。

第二天，我到北大去看望兒子，一進南校門，便看見教員宿舍樓牆間懸掛着一條醒目的大橫幅，上面寫着：

後生教先生 先生趕後生 生生不息

在絕食的日子裏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北京的大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夕陽下，紀念碑前，校旗林立，圍觀的群眾熙熙攘攘。晚上，王丹的父親從北大回來，始確知兒子已經在廣場絕食，且是發起人之一，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贊成學生採取這種不留退路的行動，但又理解孩子們，他們此舉，肯定是出於不得已，才以生命抗爭。可是，作為父母，誰不心痛孩子！

歲月蒼蒼

第二天是個星期天，王丹的父親到廣場去看他。學生被人們重重圍住，沒有找到他。五月的北京，雖是初夏，夜晚還是寒氣襲人。想到孩子們飢腸轆轆，怎麼能耐得住這般寒冷。真不知為他們做點什麼好。

聽說絕食可以喝水，我和他父親商量，給孩子們送點糖水去。爲了能夠找到兒子，只有趕在清晨人們還沒有出門的時候。十五日凌晨，我們將家中僅有的兩個暖水瓶裝滿了糖水，趕頭班車來到天安門廣場。



一九八九年五月，
王丹作為學運領袖
之一參加了絕食。
(美聯社)

歲月蒼蒼

晨曦中，廣場靜悄悄。一面面校旗下，一簇簇學生，或躺或坐，幾個人披一件棉大衣。顯然，他們沒有做禦寒的準備。我們不太費勁便找到王丹。他滿面倦容，聲音嘶啞。我趕忙把暖水瓶交給他，要他和同學們趕快把熱水喝下去，以暖暖身體。同他還沒有說上幾句話，便被人叫走了。這時，一個因絕食而暈倒的同學被抬着從我身旁經過，只見他雙目緊閉，嘴裏流着鮮血。我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至今想起來，還猶如昨日。

絕食的學生，既沒有禦寒的準備，也沒有防曬的設施。上班後，我同幾位同事商量，建議博物館出資，給孩子們搭個帳篷。當天上午，便在廣場的東部樹起一座軍綠色的帳篷。這座帳篷成爲日後救護室，來不及送醫院的絕食學生，便在這裏搶救。

這第一座帳篷，像一聲軍號，很快，廣場上樹起了許多五顏六色的遮陽傘。絕食學生的需要，就像無聲的號令，人們很快便從四面八方送來。

五月二十日宣布軍事戒嚴之後，幾度傳言，政府要來清場，可能會放毒瓦斯。學生們需要毛巾防護。很快便聽說，光明日報社送來一大卡車毛巾。一天晚上，我正在辦公室，兩個學生進來，說還需要毛巾。我帶他們到所有能進得去的

歲月蒼蒼

辦公室搜索。人人都盡其所能。

絕食後期，外地學生增多，政府不予安排食宿。他們幾乎全靠北京熱心的市民捐款捐物供養。一位老大媽，當年是給八路軍做軍鞋的能手，如今，又白天烙大餅，傍晚由老伴用三輪車帶她送給廣場的學生，一連數日，天天如此。記得是五月二十四日，狂風大作，氣溫驟然下降。外地學生衣着單薄，南方來的女生，有人還穿着裙子。北京市民心繫學生，單衣、棉衣、還有羽絨服，源源送往廣場。外地同學離京前，將這些衣服碼得整整齊齊，堆放在前門地鐵站口，旁邊貼了一張感謝信，讀來，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由於我工作的博物館大樓同廣場毗鄰，又因為我的孩子參加絕食，自五月十三日起，二十個日日夜夜，心繫廣場。

同事們大都無心工作。我們終日在樓頂的平台上，俯視廣場上那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為千百萬人民的愛國熱忱感動，為絕食學生的命運擔憂。在那條由學生糾察隊精心維護的「生命線」上，隨着絕食天數的增加，救護車的呼嘯聲越來越緊促，到第七天，竟每隔兩分鐘便有一輛救護車開出。

救護車載着生命垂危的學生，奔向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淒厲的呼嘯，是抗議，也是召喚，各個階層的人們，也從四

歲月蒼蒼

面八方湧向廣場。「我愛學生，學生愛國」，冰心老人道出千千萬萬市民的心聲。

我坐在辦公室內，猶如置身廣場。每當端起飯碗，就想到廣場上挨餓的學生，淚水止不住的流淌。

李鵬政府置三千多名絕食學生的生死於不顧，激怒了北京人，遊行隊伍日益增多；也激怒了絕食學生，十幾名女生絕食後又要絕水，躺在人民大會堂北側。我聽說後，十分着急，立刻設法去找王丹，想讓他去勸阻她們這種決絕的行動，但沒有找到他。

五月十八日清晨，我們在博物館西門外見到王丹，只見他滿面黑灰，疲倦不堪，身上不知穿了一件誰的皮茄克，髒兮兮的。我不禁衝着他說：「看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像是從垃圾堆裏扒出來似的。」此時，他還不知道，上午即將同總理李鵬等人對話。

記得是十九日的下午，一位同事想到廣場去看看她正在絕食的兒子，懇求我陪她一同去。我們來到學生防線的外圍，守衛很嚴，不得而入。我只好悄聲對一位糾察隊員說：「我是王丹的媽媽，想去看看他。」他放我們進入第一道防線。我們打着這張牌，通過了三、四道封鎖線，來到一輛大轎車旁邊。尋找王丹不見。正在此時，只見從紀念碑方向往

歲月蒼蒼

北過來一隊人，風風火火，像一陣旋風。前面是幾個扛着攝像機的外國記者，面對着人群，邊退邊走。王丹在一群人的簇擁下走了過來。他的身後一個人扛着一副擔架，左右兩邊兩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抱着氧氣袋。我立刻意識到，孩子隨時準備被搶救，止不住眼淚流了出來。王丹走近，看見我呆呆地站在那裏，十分意外，生氣地衝着我說：「媽！您怎麼到這裏來啦！這裏到處是『便衣』，趕快回去吧！」他又補充了一句：「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說着，頭也沒回，便隨人群而去。

我一句話也沒說。說什麼呢！眼前發生的一切，就是一頁歷史，我只記住它就夠了。我和同事稍稍一停，便看見對面幾個人對着我們拍照，身邊一個小伙子得知我是王丹的母親，便要求採訪，我婉言謝絕了。她找到了兒子，我便匆匆離開了廣場。

十九日晚上，廣場上傳來消息，學生們宣布停止絕食，改爲靜坐。此時，我正在我們博物館北門的傳達室裏。聽到這一消息，懸着的一顆心稍稍放下了一些。黑暗裏有幾位大學老師來借電話，通知學校說，學生們已經宣布停止絕食，要求校方趕快送稀粥來。從語調中聽得出來，他們個個欣喜萬分。老師對學生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

歲月蒼蒼

就在學生宣布停止絕食的同一天晚上，李鵬在軍級以上幹部會上宣布這次學潮是動亂，北京要實行軍事戒嚴。學生們被激怒了，廣場上的氣氛一下子又緊張了起來。還沒有等稀粥送來，有的學生又要絕食。我們意識到，結局將是凶多吉少，只有盡快撤離廣場，才有可能避免犧牲。

「六·四」之晨

戒嚴開始後的一天，王丹到我們的傳達室借電話，通知北大校方，廣場上的學生準備大遊行後返回學校，要求校方派汽車在動物園接學生。後來不知為什麼，此舉沒有實行。

五月末，王丹和北大大部分同學返回學校，我緊張的心情稍稍放鬆了一點，焦急地盼望着滯留在廣場上的同學盡快撤離，早日結束那種危在旦夕的局面。

兒子既然回到學校，我們最關心的是他的健康，便同北大校方聯繫，希望校醫院爲他體檢一次，可能的話，住幾天醫院，恢復一下體力。學校答應了，王丹卻執意不肯住院，只同意體檢。他怕住院是陰謀，從此將他軟禁。

六月二日，我到北大圖書館去查閱資料，中午順便去看看孩子。因爲他從天安門廣場回到學校後一直沒有回家。見他不在宿舍，我便在那裏等候。不一會，見他手裏拿着兩個

歲月蒼蒼

包子，邊吃邊走進屋來，見我坐在那裏，吃了一驚。剛說幾句話，他便說下午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在那裏準備絕食的劉曉波等四君子。我也只好離去。

此時的北大校園，躁動不安，氣氛異常。我的心緒也飄乎不定，不知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王丹和同學們。傍晚，我乘車回家途經北京師範大學校門口時，車被堵塞，在昏暗的燈光下，聚集着上千的民衆，正在聆聽學校高音喇叭的廣播：**同李總理嘮嗑**。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我卻有一種說不清的不祥的感覺。

六月三日下午，王丹由他父親陪同在校醫院作了一次體檢。晚飯前，他同一位同學來家。與他同宿舍的三個同學都去了別處，只剩他一人，爲了安全，他打算和另一間宿舍的同學同住。此來，是想從家中拿走一張折疊牀。晚飯後，電視新聞節目中反覆播出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要求人們呆在家中，不要去天安門廣場。氣氛十分緊張。後來家中又來兩個同學，我再三警告他們，千萬不要去廣場。我想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晚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那一幕，許多人被警察包圍在廣場上，慘遭棍棒毒打，更有甚者，被捆綁着丟在我們博物館西門大廳裏。現在看來，十二年後，那一幕又要重演了。

歲月蒼蒼

晚上大約十時，王丹和同學帶着一張折疊牀離家回校。事後我聽那位同學說，他們打了一輛車要去廣場看看，此時遠處已經響起了槍聲，司機堅決不肯去，他們只好回學校去了。豈料此一去，就是三年零七個月，直到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才重踏家門。我非常後悔，那天晚上，爲什麼沒有爲兒子做一頓他愛吃的飯菜，爲什麼沒有給他一點零用錢，爲什麼就沒有問問他，倘若發生不測，他將去何處安身。萬萬沒有料到，那一晚竟是生離死別。

他們剛剛走出家門，便從西南方向隱隱約約傳來槍聲。槍聲由遠及近，一陣緊似一陣。我告訴在家中的女兒、女婿，要他們不要睡覺，以應付意外。我無法證實兒子是否真的回到學校，又擔心他聽到槍響，一時激憤，帶一批同學又衝向天安門廣場。因爲聽說吾爾開希帶着北師大的同學又去廣場了。夜已深，我們無法去北大，情急之下，想到住在北大的一位朋友家中有電話，便打電話給他，請他代我們去看看王丹是否在宿舍，轉告他，今晚千萬不要外出。

這一夜，城內的市民大多沒有睡覺。我從窗戶中往下看，樓下的小院中，人們三三兩兩在議論着什麼。是啊！北京的市民，恐怕八十多年來在城內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槍聲了。那一次是一九〇〇年因義和團運動，引來了八國聯軍攻

歲月蒼蒼

打北京城。此後，日本人和八路軍佔領北京，都沒有在城內發起戰爭。

我們兩人坐在牀沿上，面對窗戶，傾聽着槍聲。說來可笑，我們竟然天真地認為，那是兩支部隊在火併，因為一陣比一陣密集的槍聲，儼然是一場戰爭。奇怪的是，槍聲為什麼由西向東，由遠及近？即使這樣，也萬萬想不到是軍隊在向人民開槍，真是善良到了發迂的地步。就這樣，我一動未動，一直坐到四日凌晨。

大約四時，一隊學生從窗前的馬路上呼喊而過。我清楚地聽到喊：天安門廣場已經開槍，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我頓時明白了一切，終於還是用血的代價來結束這場運動。一夜的幻想破滅了，我無力地倒在牀上，久久不能起來。

天亮了！一位鄰居在胡同口看到一隊返校的學生，有人身上滿是血跡，她回家大哭。鄰居們聞哭聲以為是王丹在廣場上出了事，紛紛到我家探詢。是啊！孩子昨晚是否去了廣場？安危如何？我如夢初醒。待天大亮，槍聲停息後，他父親騎車匆匆趕往北大，到了他的宿舍，已不見人在。同學說，他夜裏還在宿舍，現在不知到哪裏去了。有的說，可能去吃早飯了。他等到十時左右，仍不見人來，便懷着一顆忘

歲月蒼蒼

忑不安的心回到家中。

這一天，有幾位親戚和朋友冒險來我家中，詢問王丹的安危。我的一位老同學，六月三日出差來北京，住在軍事博物館對面的一家招待所裏，目睹了六月四日北京發生的一切。四日早晨，他竟步行，穿過一輛又一輛正在燃燒的軍車，通過一個又一個戒嚴部隊的崗哨，走了兩個多小時，來到我家。腳還沒踏進家門，氣喘吁吁地開口便問：「丹丹怎麼樣？現在在哪裏？」他陪我們在家整整坐了一天。是這些朋友爲我們分擔了許多恐懼和憂愁。

黑雲壓城

六月五日，不時地還能聽到稀疏的槍聲，城內有幾處飄着濃煙，這是軍車在燃燒。我來到樓下院子裏稍稍一轉，鄰居們便圍上來，打聽王丹的情況。聽說人民大學有幾個學生被打死，清華大學爲死難學生設了靈堂，北京大學的南校門貼出了「血沃中華，慘絕人寰」的大字輓聯；還聽說市民們在搶購食品、糧食。我的心頭佈滿烏雲。兒子下落不明，我已令女兒、女婿搬往別處去住，以免再發生不測。

我們倆人呆坐家中，一天沒有吃飯。傍晚，剛剛做好飯，一位同事沉重地向我報告：聽說在某一家大醫院裏，有

歲月蒼蒼

五具屍體沒有人認領，其中有一具身穿黑色 T 恤衫和白色褲子；很像王丹。他含着熱淚向我要了丹兒的照片，準備輾轉託人去辨認。同事走後，我如同墜入五里霧中，腦子裏一片空白。我們兩人默然對着剛剛做好的飯菜，無法下嚥。這一夜，倍受煎熬。後來被告知，那具屍體已被人認領了，我懸着的一顆心方落了地。

這幾天，我既不想出門，也不願意說話，天天把自己關在屋裏，腦子裏空空蕩蕩。同事和鄰居勸我們到外邊去住幾天，躲一躲風頭，也免得三更半夜戒嚴部隊登門搜查，我擔驚受怕。在他們的再三勸說下，我們決定離家出外住幾天。到哪裏去呢？城內的公共交通尚未恢復，只有地鐵可以通行。再者，平日即便是親朋好友，今遭此變故，貿然登門，怕人家爲難。思慮再三，決定到北京東郊我的一位老同學家去試一試。

六月七日午飯後，我們兩人來到新街口豁口地鐵站。站台上滿眼都是學生，像一群驚魂未定的小鳥，沒有了往日的嘻笑，個個表情苦澀，無可奈何。他們之中或許有人經歷了天安門廣場那腥風血雨的夜晚，也許有人被迫剛剛走出圖書館、實驗室。我站在他們中間，聽着他們的議論，止不住熱淚橫流。多麼好的一群青年，他們滿腔的愛國熱忱，政府竟

歲月蒼蒼

用坦克和槍彈來回答，蒼天何在！

走出朝陽門地鐵站，像到了另一個境地。天陰沉沉，沒有一絲陽光。路上行人稀少，幾個拉三輪車的工人在路口招攬顧客。交通要道和立交橋旁，都有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戒嚴士兵站崗。儼然是一片戰爭過後的肅殺景象。六月三日之後，這一天是第一次走出家門，目睹這一切，猶如在夢中。

從朝陽門到同學家還有一段路程，沒有公共汽車，只好步行。沿途看到不少站崗的哨兵。令人不解的是，兩人站崗竟背對背，三人站崗竟朝向三個不同的方向，好像是在敵國。走到東大橋，十字路口上停着兩輛被燒毀的無軌電車，車上赫然掛着兩個大花圈。這番景象，令人肅然。

來到同學家，受到熱情接待。他告訴我，六日上午在小關（位於北京市東郊，屬朝陽區）一帶見到了小丹，他正在人群中觀看燒毀的軍車。同學不敢高聲叫他，便走到他面前，小丹認出了他，告訴他，準備出去躲一躲，過幾天就回來。不一會，他見一輛白色的小麵包車停在不遠的路邊，小丹便同一位成年人向麵包車走去。這位同學追上去，要給他一點零用錢，小丹沒要。

這是一個稍稍令人寬慰的消息。但此去何方？都是茫

歲月蒼蒼

茫。

住在這裏的前幾天，每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裏，連續播出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嚴令北京高自聯、工自聯的爲首分子自首，又播出了對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的逮捕令。在每天的電視屏幕上，接連播出抓捕「暴徒」的畫面，景象之慘，目不忍睹。

北京的初夏，溫馨宜人，而今年卻與往年不同。北京城上空陰雲密佈，寒流滾滾。我在同學家，足不出戶，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呆呆地從早坐到晚。他們勸我出去走走，我說我有坐功，要是坐牢，一定能把牢底坐穿。這本是一句戲言，豈料不幸而言中，不久真的坐了牢。這是後話。

收看通緝令

六月十二日晚，我懷着不安的心情坐在電視機前，心想今晚不知又會出現什麼驚人的消息。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開始後，播音員用急促的聲音播出了公安部轉發的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令。猛然間，丹兒的形象赫然出現在屏幕上，名列榜首。我極力控制住情緒，聽完了二十一名學生的名字。

我們正在電視機前吃晚飯，此時，誰也沒有心思進餐。

歲月蒼蒼

主人想安慰我，但卻說不出有力的話語，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給我挾菜。我倒還平靜。想來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早在運動中就聽人傳言，一份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單已經擺在了鄧小平的桌子上，為首的就是王丹。

這一夜我幾乎不能成眠。這一年的夏天，像是不願降臨這多難的人間，已經是六月中旬，仍然涼氣襲人。這是一個月黑之夜，北風拍打着窗戶，室內沒有一絲暖意，本來已經冷卻的心更覺得寒冷。我想了很多。我不明白，為什麼殺了還要抓！

我想到了六十多年前，段祺瑞政府下令槍殺徒手請願的學生，四十六位熱血青年橫屍國務院內。釀成「三·一八」慘案。槍殺之後，又將他們誣之為「暴徒」。這一天，被魯迅稱之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屠殺之後，軍閥政府也曾發出通緝令，嚴拿被指控為幕後操縱者的北京大學教授、共產黨人李大釗和國民黨人徐謙等。歷史固然有相似之處，但「三·一八」較之「六·四」，卻大有遜色。二十年代若有坦克，不知段祺瑞是否也會將其開進國務院的大門之內。

這份名單公諸於世，不知國人作何感想。二十一名莘莘學子，成為被政府通緝的要犯，留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

歲月蒼蒼

壯觀的一頁。我想到行蹤不定的孩子，他知道被通緝嗎？能不能承受得住？

通緝令中，王丹的年齡和籍貫都搞錯了，二十歲寫成了二十四歲，山東人寫成了吉林人。照理說，早已被列入黑名單的王丹，對他的年齡、籍貫、出身、簡歷，早已應調查清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錯誤呢？此事引起了許多人的議論和猜測。有人認為，可能是有人有意保護他，對此，我不敢苟同。我認為，年齡是有意搞錯的。因為，二十歲，應該說還是一個大孩子。這樣大規模地公開通緝政治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年來還屬首次，在歷史上也不多見。而為首的，竟是一個年僅二十歲的大學生，豈不是大刹風景！當局也會感到心虛。當然，也不排除「六·四」屠殺之後，荒亂之中發布通緝令，以致出現此錯誤。

不論是出於何意，將年齡、籍貫搞錯，卻白紙黑字印了出來。通緝令發出不久，王丹舅舅所在單位的領導找他談話。問他：「通緝令中的王丹是不是你外甥？」「我是有個外甥叫王丹，在北京大學讀書。他今年二十歲，是山東人。通緝令中的王丹不是我外甥。」弄得那位領導十分尷尬。北京市公安局找到我在南京工作的堂妹，也遭到了同樣的搶白。致使公安人員不得不當面承認，通緝令有錯誤。

歲月蒼蒼

兒子成了被政府公開通緝的政治要犯，其後果的嚴重性不言而喻。他和我們全家都將如臨深淵。既然如此，我決定返回家室，等待更加嚴峻的現實。我們婉言謝絕了主人的挽留，於六月十五日回到家中。

抄家

回到家，心情仍不能平靜。

六月八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之後，便開始全市範圍的大逮捕，大街小巷不時傳來警車刺耳的響聲，令人惶恐不安。每抓到一個「暴徒」或通緝犯，都要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播放。

王丹既然被通緝，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想知道孩子的消息，又怕面對那兇險的畫面。回到家後，每天在晚上七點至七點三十分這段時間裏，我都要躲到另一個房間裏，像躲避兇神一樣。這個機會又不能錯過，每晚都由他父親來看新聞。

我們明白，通緝令發出後，我們的家，隨時有被查抄的可能。我天天在家恭候。

六月三十日下午，正值我一人在家，聽到敲門聲，開門進來五、六個公安人員，身後跟着一個頭戴鋼盔、身揣步槍

歲月蒼蒼

的戒嚴部隊士兵，待把他們送進我家後，他便轉身下樓，估計是到樓門口警戒去了。

來人向我出示了公安局的搜查證，問我哪個房間是王丹的住房。我告訴他們，王丹考入北大後，便住在學校，家裏沒有他的住房。他們又問，哪一張桌子是王丹的？我只好將他讀中學時用過的那張書桌指給他們。來人很輕便地便撬開了抽屜上的鎖，仔細地進行搜查。

我坐房門口，木然置之。沒有恐慌，心中坦然。孩子沒有作壞事，無需心虛。抽屜裏究竟放了些什麼東西，我也不清楚。我想，運動期間的材料，不會放在家中，家裏無非是他中學時的筆記本等等之類的東西。後來方知，王丹的幾本日記就是從家中抄去的。此後，北京市檢察院竟以日記中的材料作為起訴王丹的罪證。有人還在報紙上公開引用王丹日記中的話，以至於有些人誤認為是他在獄中的交待，大作文章。孩子蒙冤，我悔之莫及。

抽屜裏的本本和紙片被搜索一空。

他們問我，王丹有沒有裝衣服的櫃子？我指給他們，從中搜出來的竟是他讀小學時玩的畫片和一堆小人書。他們不甘心，又問我，王丹的書都放在哪裏？這時，我多了個心眼，因為他看書時，常常在書上亂寫亂畫，恐怕他們從中發

歲月蒼蒼

現蛛絲馬跡。我說，王丹的書都在學校裏，書架上的書都是我的（反正我們母子倆都是學歷史的）。他們沒有搜書。

該查的都查了，他們仍不甘罷休。一個警察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我們想打開這個沙發看一看。」徵得我的同意後，他們翻開沙發，反覆地拍打。原來他們怕沙發裏藏有武器。我暗自好笑。王丹從小連鞭炮都不敢放，竟然還敢有武器！

不足七平方米的小屋，除那一架書之外，幾乎翻了個遍。最後，他們見櫃子頂上放着一隻嶄新的黑色手提箱，執意要帶走，說王丹離開天安門廣場時，提的就是這隻箱子。我爭辯說：「他提的什麼箱子我不知道，但這隻箱子確實不是他的。」在我的堅持下，他們沒有動這隻箱子。

臨出門時，他們丟給我一句話：「王丹要是回家，到公安局報告一聲！」我心中一驚，難道孩子已經回到了北京！

第二章

鐵窗軼事



歲月蒼蒼

帶病入獄

七月一日下午，小 Y 突然來我家，帶來了王丹的一封信，說他已於幾天前回到北京，住在一位朋友家裏。果然不出所料！來人說，王丹已手無分文。聽罷，他爸爸立刻去銀行，將家中僅有的一千餘元存款取出，交來人帶去。

我們請小 Y 轉告他，好好呆在住處，不要到處亂跑。我們認為，王丹既然回到北京，無疑是自投羅網，再想逃離，幾乎是不可能了。目前能躲過一天是一天，躲過這個風頭，即使被捕，也許會好一點。

六月三日晚兒子離家距今已一個月，下落不明，我苦度日月。今獲知孩子已回北京，但卻有家難歸。真想去看看孩子，問問他，這一個月是如何在風霜雨雪中度過的。爲了避免過早暴露，也爲了不給保護他的朋友增添麻煩，我強忍着滿腔的思念之情，七月三日，託一位要好的朋友，代我去看看他。

她走後，我一個人留在家中，好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坐臥不寧。上午十時，還不見朋友回來，是她出事了？還是王丹已經被捕？我急得在屋子裏來回轉，俯視樓

歲月蒼蒼

下，無意中發現傳達室門前有幾個陌生人在走動，止不住我的心咚咚直跳。總覺得將會大禍臨頭。我拚命地用拖布擦地，好像這樣，心情才能平靜些。

大約中午十一時左右，敲門進來五、六個陌生人。沒有向我出示證件，只說他們是市公安局二處的，來此前去過博物館。說話間，一個人舉起攝像機，對着門廳拍攝，我家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攝進了他的鏡頭。

他們說來找我瞭解些情況，我說，就在這裏談吧！來人說，最好到市公安局去談。王丹被通緝後，公安機關遲早要找家長談話，對此，我已有思想準備。此時，王丹父親恰好從外面回來。他說，「他母親的身體不好，正在吃中藥，要談還是我去吧！」「她瞭解的情況多，還是讓她去吧！」他們還向他保證，說一會兒就回來，指着停在胡同旁的一輛白色麵包車說：「我們還用這輛車把她送回來。」

我沒帶分文，只帶一把家門的鑰匙，跟着他們上路了。

車開出後，經西直門立交橋往東北方向行駛。我覺得不對頭，便問：「你們不是要到北京市公安局嗎？爲什麼車向東北方向開？」他們說需要繞路走。我將信將疑，沒有再說什麼。車經雍和宮，向南轉進一條東西向的胡同，開進一座大院內。大門旁「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大牌子在我眼前

歲月蒼蒼

一晃而過。我不禁一楞。雖然還沒有立刻意識到這對我將意味着什麼，但心裏總覺得恍恍惚惚。

車子停在院中，兩個警察下車交涉什麼去了，我和其他幾個警察坐在車裏等候。眼前是一座陳舊的院落。大門坐北朝南。院子南邊是一排平房，左邊有一幢三層樓房，右邊是圍牆。我猛然發現圍牆上樹着鐵絲網，心中一驚。再看院子的北邊，是一座形似倉庫的平房建築，門很小，兩個警察持槍守衛。我立刻聯想到進門時看到的那個大牌子。我只想，爲什麼帶我到這種地方談話，沒做更多的猜想。

等了好一會，一男一女兩個警察走過來，讓我下車。女警察帶我到十分簡陋的小屋裏，說是要搜身。只搜走了一把鑰匙，別無他物。她邊搜邊問我是爲什麼事進來的。我說，我是王丹的母親，不知道爲什麼事叫我進來。她說，進去後，有什麼就說什麼，沒有不要亂說。

出來後，仍由二處的人帶我走進北邊那座房，來到過廳口門衛森嚴，一股陰冷氣迎面撲來。辦完登記手續後，我只聽見喊：帶到西四去！「西四」原來是西邊的筒道第四號牢房。這座形似倉庫的大牢房，有東、西、北三個筒道，呈幅射狀，每條筒道有相對的兩排牢房。二處的人辦完交接手續後就算完成了任務。他們中一個胖胖的小伙子略帶歉意地對

歲月蒼蒼

我說：「你就在這裏啦！我們也是執行任務。」沒等我說話，他便轉身走了。

進入四號牢房，大鐵門在我身後砰地一聲關上了。這是一間大約八、九平方米的小屋，一個小窗戶高高地嵌在南牆上，木地板，軟乎乎的牆壁，靠近門口的一角有一個方形水池。此時，地上已經躺滿了人，正值午休。見進來一個陌生人，躺在門口的一個姑娘審視了我一會，問我：「爲什麼事進來？」我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爲我是王丹的母親吧！」話音剛落，呼地一聲都坐了起來，她們好像見到了親人，一個個自我介紹，問我話的那個姑娘說：「我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曉波是我的師兄；」另一個姑娘說：「我是市民敢死隊的。」「我是工自聯廣播站的播音員！」「我是個體戶，聲援學生的。」「我是汽車司機，在廣場上見過王丹！」看着這一張張娃娃似的臉，我不由得熱淚滾滾。多好的孩子啊！他們把最好的位置讓給我，勸我先躺下休息一會，下午可能就要提審。

就這樣，我糊裏糊塗進了監獄，留下一頁難忘的歷史。

提審

這一天下午二時左右，來人將我帶走。出了筒道，出了

歲月蒼蒼

門，通過小院來到一座三層樓上，進了哪一號房間記不清了。屋子裏迎面是一個像櫃檯似的高高的台子，台後已經坐了四、五個人。旁邊架着一台攝像機，不知開動了沒有。門口有一個圓形的木墩子，同高台相對，是供受審人坐的。木墩旁邊的地上放着一隻喝水杯，顯然是供犯人用的。這分明是審訊室，哪裏是什麼談話。我正恍惚間，警察示意我坐在木墩上。

主審員五十多歲，看來很老練。他首先讓我自報姓名、年齡、工作單位、職務等等，然後開始審訊。問話也還平和，所問無非是關於王丹的情況，我也坦誠相答。話題一轉，問我與方勵之、李淑嫻是什麼關係？我說：「我們根本不認識，從沒有見過面，不信，將來等他們出來可以對質（此時方、李正在美國駐中國使館內）。」他以不屑的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出不來啦！」我也不屑於同他爭辯。他又問吾爾開希和柴玲到博物館去過沒有？王丹是不是跑出去了？你們海外有沒有親戚等等（後來得知，此時王丹已經被捕）。有問有答，氣氛還比較輕鬆。

審訊結束，我要求送我回家。他說，他們研究研究，讓我暫且回去，實際上都是托詞。等我一回到看守所那個大房裏，還沒有進牢房，早有人在筒子裏（過道）等候，見我進

歲月蒼蒼

來，他拿出一張印好的單子讓我簽字。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看見上寫「收容審查通知單」，下面的小字看不清楚。「收容審查」是一種什麼處罰，我不清楚，但從字面上理解，肯定暫時不能回家。我問：「根據哪條法律對我進行收容審查？」回答是根據國務院五十六號文件。文件是怎樣規定的，他沒有向我說明。事已如此，也無需再問。

回到牢房已是下午五時左右，第二頓飯（一日兩餐）已經開過，姑娘們爲我留了一份飯菜，兩個玉米麵窩窩頭，半碗水煮茄子。我端着飯碗發楞，猶如在夢中。她們勸我，到這裏來，以後日子還長着呢，該吃就吃。聽說這一天下午包遵信的夫人也被抓來，關在四號牢房，大概他們發現我們是同案犯的家屬，不宜關在一起。當我被提審回來前夕，立逼着她端着飯碗轉到其他監號去了，我十分惋惜。聽說她第三天即被放出，我們在此沒能見面。

晚十時左右，我剛剛躺下，忽聽鐵門外喊我的名字。有經驗的難友告訴我，這是叫你去提審，沒有大事一般夜裏不會叫人提審，並安慰我不要緊張。

這一天的夜晚，月明星稀，涼氣逼人。我當時的心中既沒有恐慌，也沒有哀怨，只有任人擺佈。黑夜中，我走在前面，警察走在後面。道路不熟，走走停停，我示意讓他先

歲月蒼蒼

走，他喝道：「老實在前面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規定，大概是怕犯人逃跑，所以在後面押解。審訊大樓燈火通明，又來到了下午來過的那個房間，還是那位主審員，但氣氛卻同下午迥然不同，人員也多了幾個。我心裏想，真正的審訊開始了。我決定沉默以對，因為要說的話，下午都說了。

一上來，主審員就用一種威逼的口氣問我：「你想知道王丹的下落嗎？」聽後，我心中暗暗一驚，莫非孩子已經落入他們手中。若是如此，何必還要用這種口氣問我，明明是在挑釁，我很生氣，一言不發。他見我不說話，便非常得意地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他就在我們北京市公安局。」一邊說，一邊用手狠狠地指着地。顯然，他是想給我一個下馬威，利用母親的弱點，想從我口中得到點什麼。不知道當時我怎麼那麼冷靜，聽後，稍稍停了停，便非常平靜地說：「那好啊！這我就放心啦！」他大概沒有料到，一個母親聽到兒子被捕的消息時，會這麼平靜，話語這樣安然。過了好一會，他才慢慢地說：「是！是啊！他到處亂跑，你也不放心啊！」

之後，他又責問我，王丹回到北京，我們託人給他送錢的事，下午為什麼不交待。我一聽就明白了，小 Y 也被抓

歲月蒼蒼

進來了！這幫人，連一個孩子也不放過！我說：「錢是我讓送的，這事與別人無關。」他們又逼迫我承認，送錢是資助王丹潛逃，我拒不承認。我向他說明，我們知道孩子回到北京，就難以再逃。他已身無分文，給錢是想讓他暫時躲一躲風頭。王丹生活尚未獨立，給他生活費是作父母的義務。他沒有再說什麼。那人再一次逼問，我同方勵之一家到底是什麼關係？學生在廣場時，李淑嫻到我們家去幹什麼？我冷笑一聲，說：「我下午已經說過，我們根本不認識，李淑嫻也從來沒到我們家去過。」這次提審不足一小時便結束，帶我回到牢房。從此，我再也沒有被提審。

初嚐階下囚的滋味

懵懵懂懂進了監獄，不管你承認與否，來到這裏，便成了囚徒。我嚐到了階下囚的滋味。儘管這段經歷是淒苦的，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撫平的傷痕。但是，能有機會體驗一下這種生活，卻也機會難得，所以我至今無悔。

入獄的第二天，管教人員找我談話。來到管教人員的辦公室，我順手拉過一個板櫈正待坐下，她趕忙示意阻止，我用不解的目光看着她，不知所措。她指着放在地上的一堆草紙（又稱馬糞紙，供犯人作手紙用）讓我坐在上面。原來，

歲月蒼蒼

犯人和管教人員不能平起平坐。這是我第二次意識到自己失去了與人平等的資格。第一次是七月三日下午初次提審時，看到一隻供受審人員喝水的杯子放在地上，我雖然沒有用它，但卻強烈地感受到人格受到了侮辱。

既入監獄，不管你是不是願意，就要遵守監規。聽同牢房的伙伴說，進來以後要「滾大板」。「滾大板」，我立即聯想到，清朝時，到公堂喊冤的人先要滾釘板，以試真偽。電影《楊乃武與小白菜》中，小白菜為楊乃武喊冤時，在公堂前撲在嵌有鐵釘的鐵板上滾動的畫面，立刻在我眼前晃動。儘管我不相信社會主義的監獄會有此事，但還是心中發慌。三、四天後，果然叫我去「滾大板」。我被帶到二樓的筒道中間，來到一張桌子前，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在一份表格上按手印。這種按手印的方法，果然非同尋常。它不是只按一個指頭，而是伸開五指一齊按，按時五個手指逐個着紙，似有滾動的意思，因連同手掌，又像個大板，故稱「滾大板」。不知我理解得是否正確。

按完手印之後，我被帶到筒道右邊一個用鐵皮搭成的亭子間，像是一個站籠，只能容下一個人。說是要給照像，工作人員遞給我一張白紙，上面用墨筆寫着編號，命令我貼在胸前。我昂首挺胸，面對鏡頭。恍惚間，我感覺照像機的鏡

歲月蒼蒼

頭就是槍口，心中油然升起一種赴刑場的感覺。

每隔一星期左右，管教人員便進行一次「搜監」，這種行動都是搞突然襲擊。搜監前，先對監號裏的犯人逐個搜身，然後被帶到另外一個房間。管教人員在監號裏對犯人的衣服、被褥及用品大肆搜查，不知道要搜查什麼。每次回到監號裏，都看見衣服、用品扔滿一地，狼藉不堪，像是一場颱風襲擊之後。衣、褲的口袋都被翻過，就連裝牙刷的紙袋也不放過。每次搜監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滿腔憤恨只能埋在心底。

還有一件事，令我終生難忘，也至今不能理解。入獄四、五天之後，家中方收到我的一張明信片，索要衣物。有一天，家中給我送來一包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按規定，這些東西必須經過管教人員的嚴格檢查方能送到犯人手中，這都無可非議。當我被叫到看守處去取衣物時，只見被翻得亂七八糟，扔得滿地都是，一捲手紙也被抖開，滾滿一地。當我伏下身從地上揀這些衣物的時候，感到自己作人的尊嚴受到莫大的侮辱。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照理講，收容審查，只是審查，尚未定案，不應以犯人對待。實際上，在他們看來，只要進了這座大門，一律都視同犯人。這是中國法律的缺陷。即使是犯人，也應該尊重人

歲月蒼蒼

家的人格，犯人也有他作人的尊嚴。

一塊榨菜

六月十日起，北京市大肆捕人，各個監獄、看守所都暴滿，據說還設了一些臨時監獄。我所在的這個看守所也不例外。每個監號原本定員九人，如今男號多達三十多人，女號最多時也有十七、八人。人員嚴重超額，生活待遇就更差了。有一天，聽到看守所所長發牢騷說：「送菜的車（用鐵皮做的長方形的盆）就這麼大，人員超一倍，還是這輛車，你讓我怎麼辦？」這麼說，原來每人每頓可以喝一碗菜湯，如今只能喝半碗了。每日兩餐，每餐每人兩個玉米麵窩窩頭。每個窩窩頭重半斤，由於太大，十之八九蒸不熟。半碗菜湯上面，漂着幾滴油星，還有各種菜蟲的屍體。每天晚上，每個監號只供應三杯開水，不管人多人少，僅此而已。平時，只能喝水龍頭裏的生水。

這隻水龍頭下面，是一個深約一米的方口池子，底部連着下水道，位於門口的右側。犯人大小便、洗漱、洗澡、洗碗筷、洗衣、飲水等都在這裏，毫無遮掩。我初到此時，在衆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很難爲情，時間長了，也就習以爲常了。

歲月蒼蒼

在這枯燥難耐的日子裏，人們眼巴巴地苦等着一日兩餐飯，而飯，又是千篇一律。盼望着改善，又每每失望，時間久了，肚子裏沒有了油水。女孩子本來就嘴饞，現在的苦滋味可想而知。每天開飯時，大家對着半碗菜湯，開着苦澀的玩笑，稱之為精神會餐。也只有在每天兩餐時，沉寂的監號裏，才有一點生氣。

有一天，一個女孩子被叫出去打掃筒道，意外地發現地上有一塊榨菜，喜出望外，她看四下沒人，便趕快偷偷揀起，藏在衣袋裏。她把那塊不足半個拳頭大的榨菜帶到號子裏時，立刻引起一陣轟動。大家立即行動，七手八腳，把這塊又黑又硬的榨菜洗淨，藏了起來，等待開飯時自行改善伙食。吃飯時，每人一小塊，我也分到了一份，放在口中，越嚼越覺得有滋味，真是其味無窮。榨菜分完後還剩下一小塊，一個女孩當眾宣布，這塊留給王老師下頓吃，我趕快謝絕，並提議留給揀榨菜有功的那個女孩。所有這一切，都是巧妙地躲過看守人員，若被她們發現，不但被沒收，還要受到懲罰。

有一次，廚房的人送來一筐發爛的柿子椒，讓我們幫助挑揀。一個女孩迅速地挑了幾個比較好的，裝在碗裏藏了起來。當大家正在津津有味地分而食之的時候，不料被看守人

歲月蒼蒼

員發現，臭罵一頓，還將剩餘的沒收而去，大家非常掃興。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集體裏，論年齡，我最大；論職稱，我最高，也出於幾分敬意，大家對我很尊敬，生活上給予力所能及的照顧，睡覺時讓給我最好的位置，每日僅有的三杯熱水也先給我喝。衣服、碗筷，姑娘們都搶着給我洗。我也以長者關懷她們。時值七、八月份，天氣炎熱，獄中偶爾也給犯人發冰棍，確切地說，應該是冰糕，可能是出於安全考慮，冰棍中沒有棍。每次發冰棍，我都捨不得吃，全部分給姑娘們。有的女孩菜不夠吃，我時常把自己的一份分給她一點，她非常感激。我們相處得很融洽。

幻覺

自己身陷囹圄，心卻時時惦念着兒子。

每當拿起窩頭，端起漂着油星的菜湯，就想到了孩子。自四月中旬以來，風風雨雨，他沒有正正經經吃過一頓飯、睡過一個安穩覺。絕食期間，他曾經向我表示，待恢復進食以後，一定得先吃一隻雞。停止絕食後，他仍然奔忙，沒有回過家。不久，政府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用坦克和槍炮鎮壓了這場運動，隨即遭到通緝，四處逃亡，始終沒能吃上一隻雞。如今，母子同在獄中，不知他一頓能吃幾個窩窩頭，能

歲月蒼蒼

不能喝得上菜湯。他從小挑食，現在真不知他如何度日！

在看守所，不時傳來犯人挨打的慘叫聲。有一天晚上熄燈後，就在我所在的西筒道，傳來要求管教開風扇的喊聲，喊聲剛落，便聽到監號的鐵門咣噹一聲被打開，那個人被拉到筒道裏，

撲通，撲通落地的響聲，伴着慘叫聲，怒吼聲，響成一片。女號裏，個個都在心痛地捂着臉，不敢抬頭，一聲不發。直到一個女孩子嚇得心臟病發作，才有一個女孩大着膽子喊：「別打啦！有人犯了心臟病啦！」外邊方停止了打人聲。那



歲月蒼蒼

一天，天氣悶熱，二、三十個男孩擠在一個九平方米的房間裏，其難耐可以想象，人家只是請求給開一開風扇，卻遭此一頓毒打。我心裏想，被打的，也許是一個剛剛被抓進來的學生，他的母親若是聽見，當是如何！我的兒子會挨打嗎？他能挺得住嗎？我不敢再想下去。

更令我擔憂的是，兒子還年輕，幼稚，還是一個沒有涉足社會的學生，能經得住嚴酷的審訊和威逼利誘嗎？如今，他還沒有走向社會便走進了監獄，這一株生長在溫室裏、未曾經過風雨的幼苗，能經受得住這般狂風暴雨嗎？不知什麼樣的厄運在等待着孩子，為他的前途焦慮。夜闌人靜，心潮起伏，不能成眠。我天天在心裏呼喚：兒子，你在哪裏？何日才能母子相見？

母子雙雙身陷囹圄，當今社會，還有哪一個家庭會蒙受這麼大的苦難。思念之情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可能是神靈的安排，有一天中午，正在午休，十分安靜。我剛剛入睡，突然聽到鐵門外有人喊：「媽！」聲音凝重、悲涼。「他怎麼來啦！」我騰地翻身坐起。側耳再聽，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伙伴們熟睡的鼾聲。屋子裏顯得格外的寂靜和遼闊。原來是幻覺。那凝重悲涼的喊聲，好幾天都在我的耳邊迴響，久久令我回味。如今回想起來，仍然聲猶在耳。

歲月蒼蒼

為難友講歷史

我初到第四號牢房時，這裏已經有十個人，其中九人是因為天安門事件被收容審查的，大家彼此親切地稱「天安門人」。另一個是刑事犯，據她自己講，來這裏已經一年多了，是「二進宮」。她介紹說，這第四號牢房，此前是管教的辦公室，不久前騰出來作牢房。大約是六月八日，將她一個人調到這個空房間來。任務是監視「反革命」。第二天，她「迎接」來的第一個「反革命」竟然戴着腳鐐和手銬，着實把她嚇了一跳。

九個「天安門人」來自各行各業，有研究生、保育員、糧店售貨員、公共汽車司機、美術工作者、個體戶等。她們是六月十日北京市開始大逮捕後陸續進來的。她們進來時，個別的戴過手銬，但再沒人戴腳鐐。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三十二歲，最小的二十歲。大家的情緒都還比較好，沒有沮喪和悔恨。只要自由活動時間一到，姑娘們便有說有笑。管教們不理解，訓斥道：「有什麼好笑的！別忘了這裏是監獄！」她們便回敬道：「不笑，難道還要哭嗎！」

平日裏，各自談論自己在運動中的所做所為，所見所聞，津津有味，好像是置身廣場而非監獄。我正是在這種氣

歲月蒼蒼

氛的感染下，減少了許多憂愁。而此時，大牆之外，正是寒流滾滾，五十多天來北京所發生的一切，在人們中間已經噬若寒蟬。兩相對照，很有意思。

大家雖然都是廣場上的積極分子，正直，熱情。我卻發現，多數人對這場民主運動瞭解不深，對中國的歷史，知之者就更少。她們知道我是學歷史的，每當晚飯後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裏（按規定其他時間不許交談，閉口思過），便要求我給她們講故事。我雖然學歷史，但卻不擅長講故事，便給她們講歷史。從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講到李大釗、陳獨秀，說明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爲了中國的民主、富強，不屈不撓，流血犧牲；從袁世凱稱帝失敗，說明民主是中國歷史的主潮流，任何勢力不可逆轉。我還向她們講述中國歷史上歷次學生運動，從五四運動講到八九學潮，說明歷次學生運動都是愛國的。

這些孩子都稱我爲老師，此事引起了管教人員的注意，她們把我叫去，十分不理解地問：「她們爲什麼叫你老師？」大概獄方意識到點什麼，不久，就把我從四號牢房調到六號牢房。

為受罰者搨扇子

六號牢房裏，大部份是刑事犯，她們到看守所的時間都比較長。我初到這裏時，大部份人對我都比較冷漠，我也很苦惱，曾要求調到四號去，自然不會獲准。在四號那裏，和伙伴們有共同語言，大家有說有笑，日子過得也還比較快。

我初到六號時，說話很謹慎，因為不知道哪些人是刑事犯，哪些人是政治犯，特別是刑事犯，不敢隨便同她們說話，一是有幾分嫌棄，二是怕出語不慎傷害了她們的自尊心。通過幾天的接觸，彼此都有了些瞭解，因天安門事件進來的不用說，很容易溝通，彼此都有一種他鄉遇知己的感覺。她們之中，一位是剛剛大學畢業、在原子能研究院工作，同未婚夫共同在運動中作市民的工作，結婚證還裝在口袋裏，未及入洞房便雙雙被關在同一個看守所。她待人誠懇，熱情，很快我倆便成了朋友。她對我照顧有加；一位是北京某大醫院的在職研究生，她是受牽連，不久便被釋放了；還有一位是汽車售票員。年齡最小的一位剛剛十六歲，六月三日晚同她母親一同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在市民憤而欲推翻一輛軍車時，她推了一把，此舉落入了公安人員現場錄像的鏡頭。「六·四」後，按圖索驥，被抓了進來。

歲月蒼蒼

據說，她還是罪行嚴重的「要犯」。她卻滿不在乎，審訊她時，她還繪聲繪色地在大堂上向審訊官講述六月三日晚的所見所聞，講述戒嚴部隊怎樣在天安門廣場北面的南池子胡同內追殺市民。搞得審訊官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

各式各樣的刑事犯，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對我也比較尊重，向我講述她們各自的煩惱。我誠心誠意地開導她們，尊重她們，鼓勵她們走自新之路。有一個女孩很受感動，哭着對我說：「看到您，就想起了我的媽媽。她也和您一樣瘦弱，現在還不知道她怎樣為我擔心呢！」

兩個因賣淫被關押在這裏的女孩子，要被送往農場去勞動教養。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幾個女孩子大概很傷感，便用歌聲來發洩感情。一支歌接一支歌，歌聲越來越高，我勸阻無效，結果，釀成了大禍。

歌聲飛出了窗外，傳到了看守所所長的耳中，他一路問罪下來，值班看守受到了批評。大鐵門猛然打開，歌聲嘎然而止，女看守怒氣衝衝地站在門口，厲聲責問是誰在唱歌，除我之外她們全都站了起來，其實，多數人都沒有唱。找不到為首的，就拿那兩個既將離去的女孩問罪，把她倆叫出去，不一會，她倆都帶上了手銬被送到監號來。

第二天，看守們還餘怒未消，待將她們倆人送走後，又

歲月蒼蒼

來到六號，除我和一個歲數較大者外，令所有的人面壁站立。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了，有人的腿慢慢地由紅變腫。但卻誰也不敢挪動一步。

開飯了！看守仍不下解除令。我們倆人決定把全號人的飯菜都打來。我想，飯總得讓吃吧！飯菜擺滿了一地（地板就是飯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動筷子。鐵門開了，大家滿以為下令可以吃飯了。誰知看守看見滿地擺的都是飯菜，大怒，責問是誰讓打的飯。我忙說，是我讓打的。她命令我倆立刻將所有的飯菜倒掉。我聽出她這是氣話，便委婉地說：「這麼多的窩窩頭和菜都倒在池子裏，恐怕會把下水道堵了！」給了她個台階下，她沒再說話，轉身走了。重重地關上了鐵門。

伙伴們已經站了七、八個小時，此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了。她們還是昨天下午四點吃的飯，個個飢腸轆轆。天氣又熱，身體較弱的搖搖晃晃，難以堅持。我實在不忍心，便把菜湯倒在喝水的杯子裏，讓她們輪流着偷偷地喝兩口；同時，坐在地上為她們用扇子搧風。我的舉動被看守從門縫裏窺視到了，便高聲發出警告：「王凌雲！不許給她們搧扇子！」我答應着，過了一會繼續搧。她們一怒之下便把我叫了出去。我心想，這一次肯定要挨一頓訓斥了。不料她還比

歲月蒼蒼

較客氣，心平氣和地同我聊天，問我身體怎麼樣？她也流露出一種擔心，怕因天安門事件進來的女孩同刑事犯關在一起會學壞。

下午四時，第二頓飯送來了，我正思忖着怎樣去為大家打飯，管教下達了解除令。整整二十四個小時沒有進食，姑娘們兩頓併作一頓，狼吞虎嚥，一掃而盡，看着令人心酸。

左腿罹病

九平方米的號子裏，最多時住了十七、八個人。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大鐵門終日緊閉，窗戶又高又小，很少見到陽光，空氣又不能流通，空氣之污濁、潮濕，可想而知。晚上睡在這潮濕的地板上，人多擁擠，每人只有兩尺寬的空間，只能側身而卧，翻身時感困難，偶爾借用別人的空間平躺幾分鐘，就覺得是天大的享受。

我只能向左側身，長期壓迫左腿。大約七月末，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女孩發現我的左腿明顯的比右腿細。我仔細一看，果然如此，以後，左腿逐漸無力。伙伴們勸我立即向獄方提出看病。我想，這種病不痛不癢，他們不會重視，便對她們說：「我不想去求他們，有朝一日用擔架把我抬出去，看政府臉上有什麼光！」有一次放風，我走路明顯感到不

歲月蒼蒼

便，左腿難以支撐，遠遠地落在隊伍的後面。管教看在眼裏，問我是怎麼回事，我以實情相告，她們責怪我為什麼不早說。我冷冷地說：「說了又有什麼用！」

不知是女管教心軟，還是出於同情，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她們馬上帶我到醫務室去看病，醫生經過檢查，兩腿確實不一般粗細。只給開點顯茄之類的西藥。藥只能存放在管教處，一日三次服藥，都要對着鐵門的監視孔高聲喊叫：「報告管教，我該吃藥啦！」碰到有人，就給送來，若是沒人，藥就別想吃了。所開之藥本來就不能治病，我也不想治病，一日三遍喊叫，實在是一種精神折磨，所以，藥沒吃完，我便自動停止了。

病情日漸嚴重，左腿明顯癱軟，走路全靠右腿支撐。見此狀，管教便從外邊請了位醫生，經診斷，說是神經性肌肉萎縮，只有到外邊（指放出去）才能治療。

病人能否到醫院去看病，必須經負責此案的提審官同意，管教沒有這種權利。對於我，女管教積極向上反映，經查，在此，根本就沒有給我立案，自然就沒有主管提審，也就不能到醫院去看病。女管教們當着我的面表示不滿：「根本就沒有給人家立案，竟關了這麼多天，這叫什麼事！」她們只能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設法照顧我。

歲月蒼老

醫生說要多曬太陽，她們一有空閒，就帶我到院子裏坐一坐，同我聊聊天，問我作什麼工作，一個月拿多少工資，家中還有什麼人？有時也勸我想開點，孩子大了，父母也管不了。也有一些警察聽說我是王丹的母親，也走過來問幾句話。有一天，有一個男警察看看四周沒人，走過來對我說：「今年四月份我在新華門前見過王丹，是一個挺有氣質的小伙子嘛！」

管教們還從八號牢房調過來一個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一位年輕大夫（政治犯），每天為我按摩。由於長時間的關押，她身體比較虛弱，天氣又熱，每次按摩，都是大汗淋漓，我實在不忍心，便瞞着管教，讓她隔日按摩一次。

隊長張某在她的職權範圍內給我開病號，此事我很受感動，倒不是想吃病號飯，而是明明知道，我的病不是發燒感冒，也不是腸胃不適，而是腿部肌肉萎縮，肌肉萎縮無需吃病號飯。此時為我開病號飯，只是盡心而已。病號飯是白麵條，這裏的人已經很多天沒有見過白麵了。病號飯第一次送來，管教當眾申明，令我不要分給別人吃。伙伴們眼巴巴的看着這碗麵條，我怎麼能夠下嚥呢！每次開飯時，待鐵門一關上，我便迅速地分給別人一點，今天給這個幾口，明天給那個幾口。一個星期的病號飯，全號的人無疑都「改善」了

歲月蒼蒼

一次生活。恰逢一個女孩過二十一歲生日，在監獄裏吃上了長壽麵，她可能終生難忘。

取保候審

七月三日來到這個看守所，當天提審了兩次，此後再也沒人過問。後來方知，根本就沒有給我立案。既不立案，又不釋放。

五十天之後的八月二十一日，來人把我帶到那座提審大樓的一層的一個房間。這個房間比前兩次提審時的房間要小，台子也低了許多。雖然不同於一般的辦公室，我卻感到氣氛同前兩次大不一樣。坐在那裏等候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士，旁邊坐着一個年輕人，顯然是書記員。那位年齡大的人問了問王丹回到北京後我曾經給過他一筆錢的經過，又問我的左腿病情是否見好。問者漫不經心，我也只簡單地作了回答。他又說了些以後要好好學習黨的政策，要同王丹劃清界限之類的話。與已往不同的是，這次的談話記錄，既沒有讓我簽字，又沒有讓我按手印。回到號子裏才聽說，同我談話的是市公安局十三處的領導。

八月二十三日早飯前，原來參與提審過我的那個年輕人來找我，說打電話找我家裏人沒有找到，問我女兒工作單位

歲月蒼蒼

的電話，我很警惕，不知外邊發生了什麼事情，害怕再找我女兒的麻煩，就沒有告訴她我女兒單位的電話號碼。我對他說：有事可以往我工作的單位打電話，並將電話號碼告訴他。他說：不必啦！

我心中佈滿疑雲，不知還會有什麼災禍降臨這個家庭。一家五口人，兩人蒙受冤獄，還能再會怎麼樣呢？我滿腹猜疑地回到號子裏，呆呆地坐在地上。

這一天的早飯後，剛剛洗好碗筷，管教打開鐵門，喊：「王凌雲，快收拾東西！」有經驗的人知道，這是要放人！我還沒有弄清這是怎麼回事，伙伴們一下子都跳了起來，手忙腳亂地幫我收拾東西。一個女孩在一小塊硬紙上用指甲刻下她朋友的電話號碼，偷偷塞到我手裏。管教站在門口，不許交談。我抱着一個小包袱，回頭用目光同伙伴們告別，蹣跚地走出了牢門。

我被帶到一間辦公室內，還是早上找我的那位年輕人，手裏拿着一份文件向我宣讀，說根據法律的某某條，我可以取保候審。我問誰是保人？他說：「你的女兒，現在就在接待室等候！」我非常納悶，我是在職的工作人員，為什麼不找我的單位作保人呢？接着，他向我宣布兩條紀律：一，不許逃跑；二，不許自殺。他大概也覺得，面對這樣一個行路

歲月蒼蒼

困難，身體虛弱，年過五十的婦女宣布這樣的紀律，猶如演戲，所以他一邊唸一邊笑。我也覺得好笑，便對他說：「我的腿已經這樣了，走路都困難，怎麼逃跑？至於自殺，我還沒有想過。」

辦完了一切手續，我隨女兒走出了這座大門。七月三日懵懵懂懂地進來，八月二十三日，也是中午，又糊裏糊塗地出去，始終沒有被告知所犯何罪。回頭望着這座大門，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只有一種任人擺佈的感覺。進來時，因乘車，一晃而過，這一次方才看清，大門旁左右懸掛着兩塊大牌子，一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這座監獄，清朝的時候是存放槍炮的地方，這條胡同因此得名，稱為炮局胡同，位於北京城的東北角，距國子監不遠。清朝末年改為監獄，延用至今，人們又稱它為「炮局」。

回到了家，猶如一場夢！終於有了一張可供睡覺的大牀。它在監獄裏可以說是夢寐以求。同事、朋友、鄰居前來探望。我沒有委屈，沒有怨恨，好像忘卻了那五十三天的煎熬，似乎是從他鄉歸來，向人們講述着所見所聞。但畢竟我是從監獄裏出來的，又受王丹的牽連，不同一般。博物館的

歲月蒼蒼

領導對我持審慎態度。聽說他們在我回家的第二天即向上級單位國家文物局報告了此事，上面的回答是：先在家治病！同時，聽說館長還告誡本單位的員工，凡是和我同住一座樓的人（我所住樓房是博物館職工宿舍）都可以來看我，別的人暫時不要去。儘管如此，少數同事還是衝破禁令，前來探望。館長託人帶話，說他們不便來。也有幾位往日的朋友，因此怯步。對此，我都十分理解，因為各個單位正在整肅。我也主動託人帶信，請同事們、朋友們、諸位老同學，暫時不要來我家中，以免給大家添麻煩。

第三章

日月蒼涼



歲月蒼蒼

故鄉所聞

九月三日晚，突然接家中電報，告以老母親病重，令我速歸（他們尚不知我曾經坐牢），真是運交華蓋！不敢遲疑。我惦念兒子，匆匆爲他打點衣物、書籍，次日上午由他父親送往半步橋市公安局七處轉交王丹。下午，我便在先生陪同下乘長途汽車前往山東老家。近二十個小時的顛簸，我幾乎難以支持。來到母親的病榻前，我還要強打精神，怕她看出什麼反常，徒增精神負擔。

回到家，親戚、朋友來相見，中心話題自然是王丹和六月四日的大屠殺。原來，六月十二日公安部轉發的北京市公安局對二十一名大學生的通緝令發出後，很快就將此令下達到了我的家鄉荷澤和我先生的家鄉鄆城的公安部門，而沒有下達到吉林省。據說，在王丹被捕前的二十多天中，在從荷澤到鄆城的公路上，公安局的警車晝夜奔忙，荷澤地區公安局還成立了追捕王丹的專門小組，並做了「王丹若拒捕就可以開槍」的佈置。七月三日，王丹被捕的第二天，即在荷澤地委一級的幹部中進行了傳達，僅僅在家鄉一地就如此重視，在北京乃至全國如何動作，就可想而知了。

家人及親戚們各自講述了他們的經歷。荷澤東城區公安

歲月蒼蒼

派出所的人首先來到我家，把我父親和我弟弟叫到屋外，在院子裏向他們說明王丹在逃，如果他跑到家來，要求他們立刻向公安機關報告。還提醒他們，若見到王丹，一定要先摸一摸他身上有沒有帶槍，要是帶槍，一定要先把槍搶下來。臨走前，我父親問他們，要不要到屋裏看一看，他們忙說：「不必啦！不必啦！」父親還要求他們不要讓王丹的姥姥知道此事。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怕經不住驚嚇（我們一直瞞着母親，直到王丹出獄）。有意思的是，公安派出所的來人竟然安慰我父親說：「你不要緊張，這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我的弟弟、堂妹、叔叔、嬸嬸都先後受到同樣的騷擾。

鄧城的家人也沒能幸免。縣公安局把王丹的叔叔叫去，欺他是農民，對他進行恐嚇。他還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公安機關獲悉王丹乘一輛麵包車要渡過黃河回老家（鄧城在黃河南岸），於是鄧城公安局便於這一天的夜晚，在他叔叔家的四周設下埋伏，準備一舉抓獲，他叔叔焦急萬分，在四面包圍中，抱着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偷偷聽「美國之音」，祈盼聽到他逃出中國的消息。鄉親們知道後，幾個年輕的小伙子將進村的各個路口分兵把守，企圖阻止王丹進村，以免遭受理伏。他們還設計了種種藏匿他的辦法。這件

歲月蒼蒼

事使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險掩護共產黨員和八路軍的情形。時光流逝，如今，老百姓卻冒險掩護共產黨追捕的要犯，這難道不發人深醒嗎？

在家期間，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往日的同學、親戚、鄰居，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他們都懷着同情和敬意，來瞭解北京天安門發生的事變，探聽丹兒的情況，給我以勸慰。我直接或間接聽到了各階層的人士，有革命老幹部，有政府公務人員，有中學教師，有農民，對「六·四」事件，對王丹等青年學生的評論。他們對北京開槍表示不解和憤慨，對學生表示同情。有人說：那份通緝令在報上一公布，我就覺得這個政府暈了頭。二十一名全是大學生，大部分來自北大和清華，個個都是國家棟材。不公布還好，這一公布，肯定會失去很多人心。連幾個青年學生都容不下，這個政府還有什麼希望。一位農民說得好，他說：「這些學生犯了啥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都正在學校唸書，又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孩子，他們能犯多嚴重的罪呢？」多麼純樸的語言，多麼簡明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九月二十六日，我離鄉返京。老母親身旁未能盡孝，身後留下一顆欠疚的心！

歲月蒼蒼

苦度日月

回到北京的當天，忘記是爲了什麼事，李鵬等國家領導人舉行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對王丹將怎樣處置，李鵬表情嚴厲，說他們都觸犯了刑律，一定要嚴懲。我頓時感覺天空颳起一陣陰風。兒子將面臨什麼樣的厄運？我的心像一條孤船，在茫茫大海中飄蕩。我想了很多，也爲此流過許多眼淚。但我始終沒有驚慌失措，因爲我堅信，學生是愛國的，愛國是無罪的。在家鄉的所見所聞告訴我，人民已經作出了公正的判決。他們給我力量，給我信心和勇氣。不論怎樣嚴懲，哪怕是判無期徒刑，只要留他一條命，我將會堅強地活下去，等待兒子歸來。正義和非正義的較量，正義終將勝利。

十月三日午後，我家來了兩個人，他們稱是公安局的，是王丹一案的預審員，送來丹兒的一封短信。我緊緊地握着兒子寫來的薄薄的一頁紙，生怕被風吹去，就像緊緊地抱住兒子，生怕被人奪去一樣。看着熟悉的筆跡，眼淚奪眶而出。多少憂愁，多少牽掛，多少委屈，險些像決堤的洪水，一瀉千里。在來人面前，我竭力壓在心頭。因爲我曾經暗暗發誓，在任何代表政府的人面前，絕不掉一滴眼淚，絕不向

歲月蒼蒼

任何人祈求憐憫。信的大意是說：離家已經三個月了，寫張紙條報個平安。說他在那裏尚好，一頓能吃兩個窩窩頭。也不挑食了，過去不吃的芹菜，現在也能大口大口地下嚥。從內容看，有幾處顯然是奉命寫的。不論怎樣，總算看到了孩子的筆跡，略微放了點心。來人讓我寫了簡單的回條，我要他注意保重身體，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好好學習。寫了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母子間縱有千言萬語，無奈大牆內外，卻無法傾訴。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旬，我收到瞿秋白學術討論會組委會的邀請函，請我到江蘇常州去參加學術會議。該會原訂這一年的六月舉行，因「六·四」事件延至十月。此前我已向組委會提交了論文。準備工作均已做好，不料，博物館館長把我叫去，說參加會議他沒有意見，只怕公安局不讓去（指我正在取保候審期間）。他堅持讓我向公安局打個招呼，我則堅決表示，寧肯不參加會議，也不能向公安局打招呼，因為離開「炮局監獄」時，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凡離開北京都必須向他們請假。出獄十天，我即回鄉侍奉老母，也沒向公安局請假。為此，我取消了常州之行。一些同事為我抱不平，我尚能淡然處之。運交華蓋欲何求？

「六·四」之後我一直沒有上班，先是博物館領導讓我

歲月蒼蒼

在家休息，出獄之後，國家文物局領導讓我在家治病。我十分感激。自十月份起，我全力以赴治療腿病。在中醫醫院，掛了一位專家大夫的號，每日湯藥兩碗，服了一百多劑湯藥，病情不見好轉。老大夫表示無意再治療下去。

起初，大夫尋問病因時，我未敢以實相告，只說到外地去長時間受潮致病。他發現我的心情一直不好，所以失去了信心，可能又不甘罷休，便再三追問得病的原因。不得已，我說明是因為在監獄中受潮罹病。可能那段時間大家都比較敏感，老大夫的一位年輕助手忙問為什麼入獄？我說，我是王丹的母親，孩子被捕的第二天便把我也關了起來。老大夫聽後那副表情至今令我難忘。又是驚訝，又是同情。他眼前的病人好像轉瞬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老大夫連連向我表示說：「我一定治好你的病！一定治好你的病！」我深受感動。中醫治病注重心情好壞，此後，每次看病，他都以一個長者諄諄開導。後因工作和家務諸事繁多，待病情稍有好轉，我便主動終止了治療，沒有遂這位老大夫的心願。至今左腿仍時感麻木，從此落下了病根。

歲月蒼蒼

第一次會見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晚，王丹的預審員劉某等兩人登門，通知我們，春節前安排一次我們同王丹見面，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到半步橋接待處等候。他囑咐我們一定要準時到達，以免錯過這個機會，還特地告誡我：我被關押的事不要告訴王丹。我明白他們的用意。他們知道，王丹同我的感情很深，一旦他得知我因他受累，遭受牢獄之苦，他會同公安人員拚命，這樣對他的審理工作便難以進行。我答應不講，以後一直沒有向他提及此事。我是怕給孩子雪上添霜。

明天就可以看見日思夜想的兒子啦！我真不敢相信。八個月來，日夜懸念，多少次被噩夢驚醒。聽到這一消息，悲喜交集，想見又怕見。八個月的風霜磨礪，孩子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子？風傳他的眼睛被打瞎，腿被打斷，雖然我不太相信，也不願意相信這種傳言，果真成爲事實的話，此時相見倒不如不見！一夜幾乎不能成眠。

一月二十四日，正是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同先生早晨五時就起床，六時出發，七時即到達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半步橋。時間還早，我們來到附近的一座小公園裏。嚴冬的清晨，天空飄着幾點寒星，寂寥的公園裏，空無一人。七時

歲月蒼蒼

半，我們來到接待室，已經有幾位家屬在此等候。有一位北京師範學院（現稱首都師範大學）學生的家長接到通知後，竟還以為是讓他們到此來接孩子回家，今日才知道是來見面。還有一位家長，是從鄰居那裏聽說，將有一些家屬會見秦城監獄裏的學生，便聞風而至，後被工作人員勸回。劉曉波的妻子由其父母陪同來到這裏，只見她身體虛弱，難以支持，大家趕快把靠近火爐的一個位置讓給了她。有一位中年婦女，身邊坐着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正猜想這位不知是不是包遵信的夫人，她已先開口。我們同在「炮局」，卻未能謀面，不想今日卻在這裏相見。共同的苦難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八時半，工作人員令我們辦理手續。我們正在排隊時，一個女孩跑過來，低聲問我們是不是王丹的父母，我們點了點頭，待要向她問話時，她已經跑開了。手續辦完後，我們便集合列隊進入高牆鐵門內。這裏是北京市第一監獄，也是北京市的一個看守所，公安局七處也在這裏。我們去往何處，無人知曉。進入第二道鐵門後，我們被帶入一個大房間，周圍擺了二、三十張椅子。可能是獄方的一位領導向我們講話，說明政府以寬大為懷，春節前安排九個人同家屬見面。他希望大家同親人見面時要高高興興，不要哭哭啼啼。

歲月蒼蒼

我環顧四周，每位家屬都神情嚴峻，沒有一個人有高興的樣子。可能爲了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他說：「我看大家還都不錯嘛！包遵信的孩子胖乎乎的。」真是沒話找話。一位家長打斷了他的話，問道：什麼時候放我的孩子？有幾位家長隨聲附和。有人質問：大過年的，爲什麼不讓給孩子帶點吃的？一位母親高聲問道：我的孩子是我帶他自首的，政府不是說，自首可以寬大處理嗎！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放我的兒子？那位領導一看情況不妙，趕快讓工作人員分別把大家帶走。

我們倆人被人帶着轉過一座樓又一座樓，來到朝西的一間平房前，丹兒早已站在門口迎接我們，身上披着一件軍大衣。他父親一眼就認出了他，激動地喊了一聲「小丹！」我們來到屋裏，裏面已經坐了五六個人。孩子就站在面前，我倒冷靜了許多。他走過來讓我們坐下，第一句話就說：「媽！你可不要哭！」我沒有哭，半年多來，當着公安人員的面，從沒有掉過一滴眼淚。我和孩子相對而坐。沒有激動的淚水，也沒有久別重逢的歡笑，彼此都感到沉重。在衆多公安人員的監視下，都強壓着感情，表現得都十分冷靜。縱有千言萬語，在此不能傾訴，也不知從何說起。

在陰暗的房間裏，我仔細地端詳着面前的兒子，猶如在

歲月蒼蒼

夢中、想起一九八七年秋，他參加北大軍訓歸來，人還沒走進家門便喊：「媽！我回來啦！我要吃肉！」我早已爲他準備了一碗紅燒肉，那是他離家最久的一次，一個月；我又想起，一九八九年五月末的一個晚上，他突然回來，顯得很疲勞，躺在我的床上，像小孩子一樣，滾來滾去撒嬌。如今，孩子離家已經八個月，他該是多麼想家，多麼想念父母啊！我看着端坐在面前的兒子，像是長大了許多，本來就瘦弱的他，更加瘦弱了，面色如土，兩手像紙一樣慘白。四十分鐘的會見很快就過去了，好像什麼話都沒有說。

臨別時，丹兒無語送我們到房門口，爲了安慰他，我強忍着眼淚，對他說，也是說給公安人員聽：「但願我們不久能再見面。」我不敢回頭再望一眼兒子，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預審員和秦城的一位工作人員送我們到第二道鐵門外，我拖着麻木的左腿，艱難地與他們同行。我再三向他們申明，學生都很單純，他們都是愛國的。那位工作人員說：「我曾看管過蒯大富、譚厚蘭（均爲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領袖），這些學生和他們不一樣。」

這次見孩子雖然瘦弱，但精神還好，稍稍放了點心。只是那蒼白的面孔和慘白的雙手，深深印在心裏，時時激起辛酸的回憶。

歲月蒼蒼

寒風蕭蕭

一九九〇年六月，方勵之夫婦「獲准」由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出國「治病」，此後，二十一名被通緝的學生之一楊濤被釋放。氣溫似乎有點回升。據傳，亞運會前要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我天天在期待中度日。八月初，中東燃起戰火，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可能要插手，政治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看來亞運會前放人是不大可能了。我還沒有絕望。十一月初，一位同學高興地給我來電話，告訴我，據上面消息，要放王丹。我盼望冬天裏出現春天。

十一月十三日，博物館保衛部門通知我，說「炮局」來電話，要對我撤銷取保候審，讓我同保人一起去辦理手續。十五日，我同女兒前往東城區炮局胡同的看守所。在接待室等候，出來一男一女，男的仍是那位年輕人，一見面就問我：「身體怎麼樣了，好些了沒有？」說着便帶我們到一張桌子旁，拿出一份鉛印的「撤銷取保候審通知單」，放在桌上，對我說：「沒事了，在這個上面簽個字。」我沒仔細看上面寫些什麼，便簽了字，還按了手印。之後，我向他要個結論。他說：「對個人不作文字結論。」我問：「對我的工作單位呢？」他說：「讓他們來找我們！」據說此後我所在

歲月蒼蒼

的單位派人來找過他們，給的結論仍然是「沒事了」。「沒事了！」就是結論，何等輕鬆，簡直視法律為兒戲！取保候審撤銷與否，對我影響不大，這一舉動，可能與王丹一案的進展有關。

沒過幾天，北京大學的幾位王丹的同學來我家，說王丹等在秦城關押的學生的戶口已經從學校轉往北京市公安局。種種跡象表明，他的問題要結案了。看來近期釋放已成泡影。事又湊巧，到我館資料室看報紙，翻閱《香港時報》時，一則紅色的鉛印大標題赫然出現在我眼前：**中共即將對王丹等進行秘密審判，國際正密切注意**。對着這則消息，我怔怔地凝視了許久，不論準確與否，它像一塊石頭，激起我心中千重浪。我恍恍惚惚踏上回家的路。這一天，北風呼呼，落葉滾滾，踏着厚厚的落葉，淒苦的心境更加蒼涼。

孩子將要接受審判，他知道嗎？他能經受得住嗎？我要寫信告訴他。信紙攤在桌上，我呆呆地坐了好久，淚水止不住地流。寫什麼呢？大牆內外，千言萬語無法傳遞。我告訴他，昨夜颳了一場大風，寒冬即將來臨，要他加強自我鍛鍊，好好保重，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自己照顧好自己。一語雙關。怕他不明白，還引了大詩人雪萊的名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鼓勵他對前途要有信心。

歲月蒼蒼

不願意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丹的預審員到北大，在地質系領導人的陪同下，找到了王丹的父親，要他在對王丹的逮捕證上簽字。我還是在看守所的時候，聽說逮捕證要本人或家屬簽字，現種種跡象表明，王丹有可能很快被審判，我便對他父親說，公安局若是找我們簽字，一概拒絕。他父親拒絕簽字。理由是：你們對王丹審查了一年半，從來也沒有向我們交待過他犯了什麼罪。我們知道，在這樣一個沒有法制的國家，簽字不簽字都一樣，只是表明我們做父母的態度而已。從感情上講，我們也不忍心在對兒子的逮捕證上簽字。局面僵持在那裏，預審員氣哼哼地說了句：簽不簽都一樣！揚長而去。第二天，北京大學派出所轉交給王丹父親一份家屬通知單，通知我們王丹已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面前的事實如此嚴酷。在寒冬中升起的一絲暖流被凜冽的北風吹散了。兒子的命運每一分鐘都牽動着母親的心。連日來，我無心作事，不思茶飯，苦苦煎熬。像一隻小船，在無邊無際的海洋中飄蕩，茫茫不知彼岸。

歲月蒼蒼

為請律師奔走

王丹既然已被正式逮捕，下一步就是請律師。我們為他請律師，恐怕官方不允許，即使允許，又有誰敢涉足此案呢？即便請到律師，在這入治的社會中又有何用？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王丹在北大的陳老師派人來通知我們，官方已經允許王丹請律師，已委託北大法律系的一位年輕老師代他聘請，那位老師不敢公開出面活動，找到了陳老師。陳老師獲知此事後，一面親自為之奔走；一面派學生來通知我們，希望我們同時活動。時間很緊迫，只限一天時間，並且限定在北京市第一、第三兩個律師事務所聘請。

我們兩人平日都埋頭自己的本職業務，不善交往，法律界又沒有認識的人，怎麼辦？事不宜遲，我立即找到一位要好的朋友，一同為之奔走。此事不能張揚，只能暗暗進行，以免給別人招來麻煩。我倆來到已離休的一位老同事家，已是下午四時許，我們向她說明來由，請她幫忙。她慨然應允，顧不得吃晚飯，便帶我倆來到西郊中國人民大學一位老師的家。這位老師也是一位歷經磨難的知識分子。她想到一位鄰居是人大法律系的教授，為人正直，在八九年民主運動中帶頭參加遊行，他的兒子也是一位律師。這位老師請來了

歲月蒼蒼

那位教授。她慷慨陳詞，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律師，兒子又尚無正式執照。最後決定，去找人民大學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

五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在寒冬的月色中奔走，頗像當年共產黨鬧革命時的地下工作者。我們來到那位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的家門前，敲門後久久不見人出來，好不容易來人開門，我們站在門外，說明是受王丹家長委託，前來聘請律師。因時間緊迫，深夜登門很抱歉。他沒出一言，呼地一聲關上了房門。我們苦澀地相視一笑，快快而歸。

十七日，美國和伊拉克開戰，新聞傳媒連續播送戰況。紛飛的戰火更加重了我心情的焦灼。中午，北大的一位同學來我家，說陳老師經多方奔走，終於請到了一位第三律師事務所的姓趙的律師，要我們即刻同這位律師聯繫。王丹父親立即去第三律師事務所會見趙律師。他表示，願意為王丹作無罪辯護，建議我們盡快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取得聯繫，將請到律師一事告訴他們。不敢遲疑，我們兩人立即趕往中級人民法院，向刑一庭報告我們已為王丹請到律師，對方表示願意接受，並要我們盡快辦理有關手續。十八日清晨，我們便去第三律師事務所辦理聘請手續。我們正在同趙律師交談間，該所的一位領導人走過來，冷冷地說：剛剛接上級通

歲月蒼蒼

知，王丹已經有了律師，令趙律師不要再接王丹一案。事情甚出意外，趙律師也感愕然，不知其中緣由。我們瞭解到，已經為王丹聘請的律師是第一律師事務所的康健。趙律師說他認識康健，當即用電話聯繫，沒有找到她。據說，所有已被聘請的律師，都集中住到秦城去了。

十八日中午，康健來電話，說要見我。在博物館我接待了她。初次見面話不投機。她一見我便說，昨天她同王丹見了面，原來他還是個孩子。說王丹對她存有戒心，還說王丹幼稚、自負，對自己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等。好像是來告狀的，不是來商議如何為他辯護的。我要她為王丹作無罪辯護，她斷然拒絕，只表示可以作輕罪辯護。臨走時我對她說：王丹還年輕，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請她多多關照。她沒有表示反對。

律師業已開始工作，距開庭的時間就不會太久了。一月二十日，我們以王丹父母的名義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檢察院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寫信，說明聘請律師的前前後後。法院已經同意接受的律師又突然中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極不嚴肅，也嚴重侵犯了王丹和家屬的權利。我們要求下一步對王丹的審理要依法辦事、要慎重。要求給家屬一份起訴書副本。這封信自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歲月蒼蒼

二十二日，我們親自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質問律師突然變更一事。我一直認為，依法辦案是一件很嚴肅的事，不應該出現這類事情。接待室的負責人和王丹一案合議組的二位成員接待了我們，就此事作了解釋。

出庭旁聽

二十二日我們離開中級法院前，向接待我們的人遞交了寫給審判長的一封信，要求在王丹開庭審理時，作為家長，也應孩子的要求，屆時出庭旁聽。同時，他們通知我們，次日早晨八時，審判長要約我們談話。

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八點，我們如約準時來到中級人民法院，已有三人站在大門口迎候。由一位女工作人員引導，我們來到大樓內的一間房內，抬眼看見寫着「審判長席」的牌子立在一櫃子上，方知這是一間小審判廳。來這樣的地方，有生來還是第一次，不覺心中一怔，還沒來得及思索，只聽見走進來的兩個人說：今天開庭。我聽此話很驚訝。為什麼不說開庭而說談話，頓覺受騙。王丹父親騰地站起來，氣憤地說：「開庭就是開庭，為什麼通知我們是來談話？堂堂政府為什麼騙人！」對方說：「法院就是法院，不要說政府，政府的。」我則要去打電話向單位請假，他們不

歲月蒼蒼

允。雙方正在爭執，審判長針凱板着一副法官特有的面孔來到我們面前，說：「按規定，開庭不一定讓家屬旁聽！」我說：「那你們也應該通知家屬。」他說：「我們一般就把開庭的布告貼在布告欄內就算通知家屬了。」接着他又說：「我們是鑒於王丹本人的要求和你們的願望，所以今天讓你們來旁聽！」說罷，匆匆離去。公開開庭的案件，家屬旁聽是應有的權利，如今，我們出庭旁聽倒是他們所恩賜。我問：「是用大法庭還是中法庭？」回答說：「大法庭正在修理，用中法庭。」修理是假，怕旁聽的人多是真。我們問他幾點鐘開庭，他們不予回答。

等候了約半小時，那位女工作人員帶領我們上樓，進入一間大房間，這就是法庭。法庭內已經坐滿了人。我們兩人在衆目睽睽之下，來到坐席的前排，指定他父親坐前一排，我坐在他後邊的一排，那位女陪同人員和我坐在一起，以便「照顧」。我們尚未坐定，只見王丹從側門裏被兩個法警押上審判席。一刹那，我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他爸爸輕輕喊了一聲「小丹！」，父子倆的目光碰在一起。我定睛一看，審判長和二位審判員坐在審判檯的後面，國徽高懸在牆間，公訴人和律師分坐兩旁，錄像機架在檯前待命。

審判開始。審判長令王丹報告姓名、籍貫、出生年月

歲月蒼蒼

日、家庭住址，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和說明，然後進行法庭調查，就起訴書所列罪狀，逐條出具證言，由被告人認可或否認，沒見證人出庭。王丹作了長達四十分鐘的自我辯護，不卑不亢，條條有理，鏗鏘有力，拳拳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我由衷地為有這樣一個兒子感到自豪。旁聽席上的聽眾，只要他還有良知，誰能會認為被告席上站着的這個年僅二十一歲的大學生是一名罪犯！坐在我身邊的兩個人，一個像是老師，一個像是學生，在竊竊私議，喜形於色，不斷地向被告席上投以贊許的目光。

康健律師進行辯護。她通篇辯護詞的主導思想是：一，應該放在當時那種大背景下對王丹的行為進行考察；二，王丹年幼，受騙；三，所控罪行多為參與，沒有主謀；四，一貫表現尚好。她只作了輕罪辯護。最後，律師和公訴人就利用日記作定罪材料展開論爭，她不同意將王丹日記中的話作為罪證。

趁雙方爭論的空暇，王丹回頭在旁聽席上尋找我，因為進入法庭時他只見到爸爸，沒有看到媽媽。母子目光相遇，我趕快向他點頭示意，表示對他的贊許。

審判歷時三小時，十一時半結束。我起身穿上外衣就要隨人群離去，被那位女陪同叫住，說審判長要見我們。我們

歲月蒼蒼

只好跟隨她又回到那間小法庭。等候期間，女陪同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第一，起訴書中的用詞，如「肆無忌憚」等，同文化大革命時沒有兩樣；第二，我的孩子被政府列為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名大學生的榜首，他究竟犯有多大的罪，我始終不知，心中無數，今天在法庭上，通過調查和陳述，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原來起訴書中所列種種，有些只不過是年輕人言行過激而已。言行不當只是教育問題，不能訴諸法律；第三，今天聽王丹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有條有理，看來孩子被關押一年半，還沒有被關傻。她聽後趕緊接着說：「哪裏會傻啊！看他的思路多清楚啊！」

說話間，送來兩盒午飯，我倆無心動筷。在她的再三勸說下，我們兩人合用了一盒。飯後換班，陪同我們的是王丹案的一位審判員。我不知道哪裏來的那麼大的興致和勇氣，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利用一切機會，為受難的學生辯白。我向他講述了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學生運動的歷史。中國的青年學生，不避槍彈，不畏牢獄。他們代表人民的呼聲。無意推翻當時的政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要求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是要求蔣介石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

歲月蒼蒼

是要求政府反對腐敗，推進改革。歷次學生運動都是愛國的。他也表示同意，只是王丹的事太多，別人都只有兩三條，王丹卻有五六條。我反駁說：定罪不能依據條條多少，殺人的話，一條就可以定罪。

大約下午一時，審判長進來說：「你們不是要求見王丹嗎？打算說些什麼話？」突如其來，我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我們是提出過要見孩子，只是想等到判決下來後，怕他承受不住，見見他，給他以安慰，沒想到今天就見他。不一會，孩子被帶到我們面前，本來，在房屋中間給他準備了一把椅子，他爸爸一把把他拉到我身邊，挨着我坐下。看着孩子那蒼白的臉和手，想到法庭上他那虛弱的聲音，真像是大病一場剛剛出院的病人。此時真想立刻把孩子帶回家去。十幾分鐘後，無情的法警把兒子帶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再無法控制，淚水奪眶而出。審判長把我們送到大門口，握手告別！

開庭之後

天，陰沉沉，霧���矓！我精神恍惚，步履維艱，回到家中，等待判決。

連日來，爲兒子奔波，已心力交瘁，預感將會生一場大

歲月蒼蒼

病，真不知道能不能經受得住即將到來的嚴酷現實的打擊。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打開短波收音機，忽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告，王丹等人已於今日下午開庭宣判，王丹被判刑四年！事情來得這麼快，甚出意外。難道調查會議只用兩天，令人懷疑。判刑四年，不論如何，總算有了盼頭。孩子還要度過兩個春秋的鐵窗生涯。此時，我別無所求，只求他的精神和身體能夠經受得住這種磨難。

國內外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始終密切關注着王丹一案的審理和終結。

就在王丹一案開庭審理的當日（一月二十三日），幾位在美國加州留學的北京大學校友寫信給我。信中寫道：「我們是您值得驕傲的兒子——王丹的同學和朋友，在北大期間，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和愉快。我們非常關心王丹的處境。」他們要我多多保重。一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學十幾位同學聯名寫信來，講述他們曾派代表於王丹開庭當日來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要求出庭旁聽被拒絕，不得已，又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去申訴，亦無結果。信中寫道：「他不僅是您的兒子，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兒子，歷史將會對此作出結論。」一月二十七日，台灣高雄一位二十四歲的姑娘小西來信，她得知王丹被判刑，特地來信慰問，真摯無邪。從此之

歲月蒼蒼

後，我們成了朋友，母女相稱，書信往還，給了我許多安慰。早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在瑞士留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署名「北大校友」，給我們寄來一張賀年卡，卡片上寫着：「您的兒子王丹是我們北大的驕傲。王丹遭受冤獄之苦以及他的入獄，對你們全家身心的打擊，是我們全民族的恥辱。願你們與王丹在大牆外團聚的日子早日到來，願王丹在出獄後能夠重新呼吸到自由之風。」我相信，還會有類似的來信沒有送到我的手中。藉該書出版的機會，向各位素不相識的朋友對王丹及我們全家的關懷和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謝！

在大陸，在我生活的周圍，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對王丹及我們一家的同情，見面時向我道一聲「多多保重」，千言萬語都含其中。人間自有真情在。人們的理解和同情，給予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

大年初二闖秦城

一年一度的春節將至，依照一九九〇年的經驗，這一年的春節前後肯定還會安排一次見面。爲了保險起見，二月六日，我還是給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蘇仲祥寫了一封短信，要求在這萬家團聚的節日裏，允許我們同王丹見一面。信發出之

歲月蒼蒼

後一直沒有回音，我心中十分不安。已經判決了，爲什麼還不能見面。二月十三日，農曆除夕，王丹的父親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處去詢問。回答是，二審判決沒有下來，不能會見。他們與蘇仲祥局長聯繫，他讓我們給王丹寫封短信，也可送一點食品。下午，他父親即將信和食品送到半步橋公安局七處的接待室，要求轉交王丹。食品拒不接受，理由是怕吃壞了肚子。快快而歸。

除夕之夜，爆竹連天，煙花繚繞。舊桃換新符，萬家歡聚。思念兒子，百感交集。我們決定去闖一闖秦城監獄。

二月十五日，大年初二。我們兩人頂着滿天寒星，乘早班公共汽車，前往北郊長途汽車站，準備乘坐開往秦城的長途汽車。八時半開車，乘客擠的水洩不通，我們幸好來得早，總算有個坐位。按照舊習俗，年初二開始走親戚，滿車的人都是探親訪友的，喜氣洋洋。唯獨我們兩人，滿懷淒苦，探望被監禁的愛子。車子向東北方向行駛，我凝望窗外，茫茫的原野，覆蓋着一層薄薄的白雪。此時的心境，也像這蒼蒼的大地，無邊無際。車到終點，朝北有一條寬寬的柏油馬路，在這村野間很顯眼。馬路盡頭隱隱約約有一座大門。根據胡風夫人梅志的描寫，可以斷定那就是秦城監獄。事有湊巧，和我們同時下車的還有一位軍人，只見他徑直沿

歲月蒼蒼

着這條柏油路向北走去，我們緊緊跟在他後面。

走到馬路盡頭，抬頭看到「警戒線」三個大字，後邊便是高高的圍牆和像碉堡一樣的瞭望台。我們沒有介紹信，也沒有獲得有關方面的允許，能不能越過警戒線呢？我們停步稍稍猶豫了一下，決定還是闖進去。既然來此，也做好了遇有不測的思想準備。沒有受到阻攔，來到大門前，傳達室不予接待。我們說明來由，要求見董所長，表示不見不回。值班人員看我們態度堅決，便用電話聯繫，董所長同意接見。

我們站在大門外等候，眼前就是中國著名的秦城監獄。它背靠燕山山脈，面臨一望無際的平原。這座外表並不起眼的監獄，關押過幾代政治犯，濃縮了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政治風雲。如今在此關押的「犯人」，大都是在鄧小平重新執政後長大的「娃娃」，把「頑童」視為異己，不能不說是對歷史的嘲弄。

我們在寒風中足足站了四十五分鐘。董所長滿面笑容地走出來，頗有歉意地向我們解釋說，正在吃早飯（一日兩餐），迎我們到大門內的接待室。我們訴說了春節求見未果的過程，是出於不得已，才來到秦城。他說：飯前我正在陪王丹看春節晚會的電視。他向我們介紹了王丹的情況。我們要求見孩子一面，他表示為難。王丹不服判決上訴後，二審

歲月蒼蒼

判決還沒有下來，現歸法院管，他無權決定。我們表示，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強求，只要求他將我們帶來的衣物和食品轉交給他。他滿口答應。

此來，我們還有一個意思，秦城關押的學生相繼判刑後，外面傳言將會發往新疆服刑，我們不太相信，但也感到不安。我們想趁此機會試探一下，他一口否認，說王丹等人肯定在北京服刑，有關方面正在為他們尋找一個較好的地方。

董所長送我們到大門外。告別後，我們沿着柏油路南行，在一座小橋邊遇到一輛回頭車，十分慶幸，否則，不知要等到何時。到家已是下午一時。

第一次探監

春節過後，我們苦苦等待，不知今後兩年的時光，孩子將在哪裏度過，終日提心吊膽。

二月二十日，收到丹兒一信，說他心情很好，並寬慰我們，說：「春天來了，樹發芽，草發青，你們也該舒展一下眉頭啦。」二十六日是他的二十二歲生日，這是他在獄中度過的第二個生日，我們寄去了生日賀卡，祝他又長大一歲。誰能料想，兒子還沒有涉足社會，便進入了監獄。人生的旅

歲月蒼蒼

途剛剛開始，便遭受煉獄之苦。非常想念孩子！三月二十日，收到丹兒來信，說二審已經下來，維持原判。這本在意料之中。

四月十一日晚，春雨綿綿。收到丹兒的信，告之本月初已被發至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隨信還寄來一份二監關於探監的通知和規定，通知本月十二日探視，規定不許帶食品等。明日一早就得動身，什麼也沒有準備，如何乘車前往也不得而知，焦急萬分。當此之際，一位同事獲悉後，當即把她家中的被褥拿來，另一位同事則去找我們博物館的一位副館長（我們都同住一座樓），希望他能派一輛公車，以解我們之難。館長滿口答應，司機慨然從命，說這個忙應該幫。此後，他還為我們一家前往二監出過幾次車，我們非常感激。

十二日清晨，我們一家三口便上路了。昨日一場春雨過後，郊外一片清冷。第二監獄座落在北京東部的朝陽區，牆外便是耕地，一座工廠與它相對，尚不覺荒涼。獄方管理人員在接待室接待了我們，向我們介紹了二監的情況。及對探視家屬的要求。我們將所帶被褥和書籍一一點交給他們。我們被帶到二樓接見室等候。這是一個四米見方的小房間，前後兩個門，中間有一道高高的用水泥構築的台子。上樓之

歲月蒼蒼

前，看管人員用探測器對我們三人逐一進行搜查。突然，探測器嗚嗚作響，經檢查，原來是他姐姐來之前，在衣袋裏偷偷裝了幾塊巧克力，準備見面時給弟弟吃。因用錫紙包裝，故而被測了出來。

兩個多月不見，孩子不知怎麼樣了？聽到熟悉的腳步聲和咳嗽聲，我的心怦怦直跳。小小的接見室，中間用一道水泥台子隔開，兒子坐在台子裏面，我們坐在外面，相見不能相近。看着對面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只見他面色如土，說話氣喘吁吁，情緒也不如從前，我只以為是新換了一個環境，尚未適應。誰知他同其他四人一來二監便被分別送進了禁閉室，單獨監禁。當時，王丹並沒有告訴我這一切。按照規定，探視時間只有三十分鐘，這次因屬首次，延長了十分鐘，以示優待。這一天，只安排了我們一家探視。

從此，我們一家便開始了探監生涯。二十三個月，每月一次，艱難奔波。

寒春苦夏

這一年的五月，我出公差去湖南，十二日前，便匆匆趕回，等待獄方通知，探視日已過，仍不見通知來，我心急如焚。一個星期之後，接二監信，責問我們為什麼不於十二日

歲月蒼蒼

前來探視。原來是一場誤會。我以為每月都以通知為憑，不知每月都於十二日探視。後來知道，王丹不見我們前來，不知家中出了什麼事，也非常着急，要給獄方寫血書。

儘管獄方規定探視不允許帶食品，這次我們還是帶去了兩袋奶粉和一袋巧克力，拒絕接受，理由是「出了問題誰負責？」所送書籍，檢查也很嚴格。外文書籍一律不許送（以後放寬了），就是中文書，也嚴格得令人發笑。有一本《英美報刊讀法》就被無理退回，大概因為有英、美兩字。

這次因探視室進水，破例允許我們在大牆裏面的一座樓房內會面。空蕩的房間，只有幾個小板凳。我很敏感，從我坐牢的經驗，這是給犯人坐的。我看了看沒有就坐。他們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便趕快令人抬來了桌子和高凳。看到孩子精神雖然比第一次見面時好一些，但臉色依然蠟黃。他告訴我，他已經收到了北京大學校方開除他學籍的通知。他報告此事時，看來平靜，但可以看出，孩子的內心是痛苦的。我瞭解兒子，他對北大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為了考取北大，挑燈苦讀和被北大錄取的消息傳來時歡呼雀躍的情景，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三十分鐘很快過去了，我目送兒子的背影漸漸遠去。初夏的陽光灑滿大地，他卻無權享受，又回到那陰暗的牢房

歲月蒼蒼

裏：至此，他對我們隻字未提他在禁閉室的痛苦煎熬。

六月十二日探視，我因回家侍奉老母，未能前往。回京後聽他父親說，孩子的臉色一次不如一次，咽喉反覆潰瘍。情急之下，他給監獄長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給王丹治病。也可能這封信起了作用，七月初，王丹來信，說獄方已帶他去看病，被留住了五天醫院。經檢查，咽部有一個硬塊。得信，我很緊張。七月十二日探視時，在我的再三追問下，他才輕描淡寫地描述了他那不足四平方米的斗室。除了一張牀，一個馬桶，一個洗手池外，無容身之地。這一年的夏天，北京炎熱異常。他說他的住處蚊子很多，要我們下次送些蚊香來。我問他，送來一頂蚊帳不更好嗎？他連連搖頭，我不解地望着他，陪在旁邊的警察解釋說，放不下蚊帳。我頓時明白了，斗室之內再支一頂蚊帳，不把人熱死，也得悶死。只能任憑蚊蟲肆虐。我沒給他送蚊香，怕孩子睡覺後，一但着了火，鐵門厚牆，後果不堪設想。給了他一條大被單，聊以抵擋。有一次，收拾從獄中帶回來的書籍，見他在一本書上寫着：爭取自由的代價是孤獨！

被單獨關押已經三個月，天理不容！咽部長期患痛，身處這麼惡劣的環境，即便是小病，也有惡化的可能。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們兩人奔走呼號，他父親去北京市勞改局，要

歲月蒼蒼

求改善王丹的待遇；我再次給公安局長蘇仲祥寫信，說明王丹目前的處境和病情，要求他予以關注，使孩子早日結束被關禁閉的生活。

由於王丹在獄中的鬥爭和家屬在外邊的奔走，八月中旬，王丹搬進了大屋，和三個刑事犯同室而居，結束了那非人的長期單獨關押的煎熬。大約是九月份，大《參考消息》刊載一則消息，報道王丹等人改善待遇，轉入大牢房！真不知有何顏面張揚。

春去夏來，我們一家在漫漫的探監路上奔走，肩揹大包小包，或乘公共汽車，或坐人力平板三輪車，有時步行一段路。在寒風中鵠立，在烈日下趕路。路邊的麥苗青了又黃，黃了又青，月復一月，年復一年。

接孩子出獄

苦難終於到了盡頭，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王丹獲得了自由。

王丹坐牢期間，釋放他的傳聞，隨着國際風雲的變幻，幾起幾落。我也幾度企盼，幾度失望。國內外的朋友和海外記者，時常找我們證實王丹被釋放的傳聞。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的一天，王丹的幾個朋友到我家來，說是據可靠消息，王

歲月蒼蒼

丹即將被釋放。十一月二十五日，幾位記者先後往我所住宿舍樓的傳達室打電話，對我說：「今天要放包遵信和你的兒子，請證實一下。」第二天便獲悉包遵信已被釋放。何時放王丹，我們翹首以待。

十二月十六日，我們一家去探視，我有意試探他，對他說：「外邊時常有傳言，說你已被釋放，也有朋友信以為真，到家裏來看你！」他不動聲色，說他自己已向當局表示，絕不接受有條件的假釋。兒子的這句話令我欣慰。講心裏話，作為母親，何嘗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早日結束這牢籠般的生活。但從理性上講，我深怕孩子熬不過這最後的歲月，特別是聽到他們之中已有人被釋放，會接受官方的什麼條件，換取自由，因為孩子還太年輕。今聽他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我鼓勵他再堅持六個月！**用苦難換取無悔。**

一九九三年春節前後，外邊又傳王丹將要被釋放。照理講，對於這種謠傳，當局應當即時予以澄清。可是，任憑謠言起，官方卻默然置之，即不承認，也不否認。迫不得已，我出面澄清事實。二月三日，我通過國外傳媒，聲明王丹仍在獄中，由於他拒不認「罪」，仍被嚴密監禁。

二月十六日，是規定的探視日。我和先生依然是身揣大包小包，因為二月二十六日是兒子的二十四歲生日，故而又

歲月蒼蒼

多帶了些食品。一路大雪紛飛。見面後，他告訴我們，二月九日，有關方面向他吹風，準備對他假釋。理由是他能遵守監規，又是青年學生，父母探視辛苦。聽此消息感到突然，但也沒有大喜過望。四十多個月都過來了，誰還在乎他們提前那一兩個月。

二月十七日上午，我正在開會，突然接到二監羅科長打來的電話，說他下午兩點鐘要到我家去，要我回家等候。我當即往北大打電話，通知王丹的父親，讓他也回家來，因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不是孩子被釋放？不會這麼快！昨天見他時，還沒有明顯的跡象；是生病了，也不會啊！昨天他還好好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心中布滿疑雲。

我們等候到二時半，羅等二人身穿警服來到家中。他說：「我們領導找你們有事談談！」我問：「什麼事？」他說：「到那裏就知道啦！」我又問：「是去二監還是去勞改局？」他說：「去二監！」我心中一動，莫非真的是接孩子出獄，故意試探問：「要不要帶什麼衣服？」他說：「不用啦！」聽此話，我心中又冷了下來。我們隨他們二人下樓來到院中，抬眼一看，一輛警車等在那裏。後來聽鄰居說，那一天下午看見兩個警察帶着我們上了一輛警車，不知又出了什麼事，都為我們捏一把汗。

歲月蒼蒼

我們上路了，我總覺得車子開得太慢。也可能是爲了緩和我們的緊張情緒，羅科長找話同我們閒聊，不像出了什麼大事。車子到二監來到接待室，一落座他便告訴我們：「今天下午要放王丹！」他解釋說：「我也是今天上午才知道這一消息的，領導不讓先告訴你們。」我們聽到這一消息也沒太感震驚，因爲前一天探視時王丹已透露了一點風聲，只是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我們在接待室等候了一個多小時，下午五時左右，外邊傳話說：王丹出來了！我們聞聲走出接待室，在路旁迎候。停車場已停了好幾部小汽車。監獄的大門前已聚集了一些人，攝像機已經架好。我想像他一定是扛着大包小包，狼狽不堪地走出大門。誰知不一會便遠遠看見孩子兩手空空，右手打着「V」字形的手勢，左右由兩個警察陪同，面帶笑容走出了北京市第二監獄威嚴的大門，跨進了自由的世界。

見我們站在路旁，兩名沒有通報姓名的國內記者過來採訪，我表情淡漠，確實，兒子蒙受冤獄，如今獲釋，談不上高興。他問：「你們的孩子出來了，很高興吧？」我們停了一會，才淡淡地說：「高興！」他又轉向我：「作爲母親，你對兒子今後怎麼打算呢？」我答：「希望政府允許他回到北大繼續書。」此時，勞改局的孔處長、李監獄長、獄政

歲月蒼蒼

科王科長一同走過來，對於他們一年來爲王丹花費了心血，我表示感謝。

勞教局出車送我們回家，車子在暮色中駛向城內。我們同兒子一起坐在車中，我心潮起伏，多少往事湧上心頭。回想自一九九一年四月至今，二十三個月，嚴冬酷暑，我來過這裏二十三次，每次我都癡想，能帶孩子一塊回家，該多好啊！如今，真的接孩子回家啦！該不是夢吧！

第四章

春寒料峭



歲月蒼蒼

孩子回到了家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對王丹，對我們全家，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們倆人被警察接走之後，鄰居們很擔心，我的女兒和女婿卻憑着直覺，猜想我們此去，會不會是接弟弟出獄。兩個孩子準備了一桌飯菜，正在焦急地往樓下張望，夜幕下，看見駛來一輛小汽車，停在了我家的樓門口，王丹抱着一把吉他首先下了車。他姐姐一眼看見那把藍色的吉他，飛奔下樓。

我們到家已是晚上六時許，剛剛擺上飯菜，便有一位自稱是美聯社的記者捷足先登。我們問他：「你是怎麼知道王丹被釋放的？」「今天下午你們的新華社發了消息。」他說。我們趕快打開收音機，看看「新聞聯播」節目是否播放這一新聞。沒有播放。後來聽說，在當天的「晚間新聞」中播放了釋放王丹的消息，還出現了我們同他上車的畫面。

各大通訊社、報社、電台的記者、攝影師，聞訊後，一批接一批，潮水般地湧來，採訪、錄像、當場發稿。我十分敬佩他們的敬業精神，也目睹了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像這樣敏感的新聞，若要見報，須經過層層審批，

歲月蒼蒼



王丹出獄當晚在家中接受採訪。(作者提供)

新聞已成舊聞。我注意到，在登門採訪的幾十位記者中，沒有一位自己國家的記者。

王丹要回答一個又一個幾乎是同樣內容的問題，疲憊不堪。家中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外國和港台記者，我們都不知所措。晚十一時之後，乘一個間隙，我趕緊寫了一個字條貼在大門上，說王丹已到別處休息，請改日再來；同時，讓他躲到樓道裏，休息片刻。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敲門。看到他們

歲月蒼蒼

急急地登上樓來，見不到王丹那種失望的表情，我的心又軟了，只好又把孩子叫回來。

我們都忙於接待記者，還沒有來得及通知親友。夜深，記者散去後，我們剛剛就寢，突然被呼！呼！！的敲門聲驚醒，原來是馬少方。馬少方也是遭政府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之一，和王丹一同關在秦城監獄。他從外國電台廣播中得知王丹獲釋的消息，立刻奔來，此時正是次日凌晨一時。黎明前，又來了他北大的兩位同學。消息不脛而走，同學、朋友，特別是秦城的難友，一批接一批前來探望。

孩子回到闊別三年零七個月的家。一切都來的這麼突然，毫無準備，甚至連爲他換洗的衣服都沒預備。幸好，有位細心的朋友，在外界盛傳王丹將被釋放的時候，送來了一件毛衣，兩件襯衫，還有一件羽絨服。第二天，兒子脫下在獄中的衣服，換上了新衣。拋去了寒冬，迎來了春天。

早春二月，寒氣襲人。看着孩子重獲自由後的那番興奮和那張蒼白的臉，我心中不禁升起幾縷酸楚。自由是美好的。孩子爲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他用三年又七個月的鐵窗生涯換來的這份自由，誰又能保證維持多久呢？此刻，他正沉浸在和家人的團聚及同朋友重逢的歡樂中，或許還沒有意識到這些。作爲母親，作爲一個經歷過四

歲月蒼蒼



一九九三年二月，王丹獲釋後接受記者採訪。（路透社）

十多年來政治風雲的知識分子，卻想的更多。我原已結滿冰霜的心，並沒有因為兒子的歸來而完全融化。

二月二十五日，王丹寫了一封題為《出獄有感——致所有關心我的國內外朋友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表示：「近四年的監禁，更增強了我為中國人民的民主化事業奮鬥的決

歲月蒼蒼

心。」他向世人公開宣告，他將在中國大陸，作一個「法律範圍內的公開的反對派」。他清醒地知道，這樣做將會冒很大風險。擺在他面前的，將是一條荆棘叢生的路。但他堅信，為中國的民主化事業獻身，是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的。

我雖然讚賞兒子在近四年的監獄生活中，沒有磨滅自己為爭取中國的自由和民主獻身的意志和勇氣。但卻不同意他這樣公開地宣稱自己要做「反對派」的做法。他還太年輕，從學校直接走進監獄，完全沒有涉足社會，缺乏應世的經驗，單憑着一顆年輕人赤誠的心和滿腔的熱情，天真地看待當今社會，根本不瞭解政治的無情和鬥爭的殘酷。他認為，自己的所做所為，都將遵守現今的法律，一切言行都將是公開的。這樣，應該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他還不懂得，當今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人治的社會，不講法治，又談何「法律範圍」。一九九六年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對王丹再次判刑，便是最好的印證。

始料未及

二月十九日，兒子出獄後的第三天，我的一個堂弟在北京大學勺園為王丹接風，我們全家一同前往。這是王丹回家

歲月蒼蒼

後第一次出家門，又是去北大，他自然很高興。我們一路西行。奇怪，在我們車後，緊緊跟着一輛小汽車和一輛摩托車。小丹認出是便衣，便扒在車後排的坐位上，隔着玻璃，指手劃腳，衝着他們作鬼臉。這是我有生第一次領略共產黨國家的便衣跟蹤。

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兒子遭通緝入獄之後，我再也沒去過北大。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在此期間，曾有幾位老同學邀請我到北大去玩玩，我始終沒有成行。不是不想去北大，而是怕觸景生情，怕看到生氣勃勃的大學生，想到鐵窗下的兒子，感情難以承受。他父親在北大任教，有一天，在校園裏看到一個學生很像王丹，他情不自禁地追上去，失聲大喊：「小丹！小丹!!」沒有回應，方如夢初醒。

轉眼間，三年多的時間過去了，北大校園在那場風雨過後，早已恢復了平靜。

初春的校園，還沒有絲毫的綠意。

飯後，我們漫步在校園中。王丹在當年舉辦民主沙龍的地方——賽萬提斯像前駐足沉思。這裏一片寂靜，往日的熱烈已成過去。他在這裏攝影留念。兒子一個人站在銅像前，顯得格外孤單。此刻，他的內心肯定也不平靜。昔日的戰

歲月蒼蒼

友，像一群雛燕，在那一場無情的暴風雨後，天各一方。

我們來到新圖書館門前的空地上，他正在同小外甥戲耍，我則在一排椅子上坐下，抬頭四望，猛然發現在距我們十幾米遠的四周，佈滿了身穿藍色制服的校衛隊，三三兩兩站在那裏，正注視着我們。這顯然是衝着王丹來的。在這本無春色的空地上，我頓時感到一片蕭煞。

我們來到南校門內的「三角地」。這裏曾是民主聖地，當年張貼大字報的地方，如今已被紅紅綠綠的廣告佔領。王丹在廣告欄前照了張像。他去位於此地的新華書店買書，我則站在「三角地」的東側等候。正在同北大的一位老師閒聊，忽聽一陣跑步聲，我猛然抬頭張望，只見從馬路對面的燕園派出所出來一隊校警，正跑步奔向「三角地」。很快，小小的一塊「三角地」，便被重重包圍。我不禁吃了一驚！這分明又是衝着王丹來的。

這究竟是爲什麼？對付一個面色蒼白、身體虛弱、手無寸棒的王丹，值得這樣調兵遣將嗎？後來王丹聽說，在他出獄的第二天，二月十八日，北大校方便召集各系負責政治工作的人員開會，佈置王丹一旦來北大，如何防範。豈料，十九日王丹便踏進了北大的校門。他們如此慌張，圍追堵截，大概是始料未及吧！

歲月蒼蒼

究竟怕什麼呢？我們在校園裏行走，同許多學生擦肩而過，始終沒有一個人認出眼前的這個瘦弱書生，就是當年的王丹。王丹也始終沒有向路人發表一言半語，那麼，到底怕什麼？

深深眷戀着北大

王丹始終深深眷戀着北大。

他出獄後不久，便向北京大學校方提出重回北大就讀的要求。校方以北京大學學籍管理條例為依據，予以拒絕。他又要求以社會青年的身份報考北大的研究生。接待他的是校長辦公室的一位女工作人員，她對王丹說：能不能報考，要由研究生院來決定。明知不可能，他非要走到底，探個究竟。聽罷她的話，王丹便轉身騎車來到研究生院，接待人員說：「你能不能考研究生，完全要由校方決定。」

北京大學拒絕王丹復學，原在意料之中。這一年的「兩會」期間，有國外記者就王丹復學事問當時的北大校長吳樹青。他很不坦率，只含混其詞地說：任何人都可以報考北大。這是什麼話？

復學遭拒沒有泯滅王丹對北大的眷戀之情。

我同我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一同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

歲月蒼蒼

畢業後，他留校任教。王丹從很小起，便時常到北大玩耍。美麗如畫的校園，藏書豐厚的圖書館，如林的知名教授，令他十分嚮往，踏着父母的足跡，走進北京大學的課堂，是他崇高的理想。王丹高中畢業時，堅持要報考北京大學。他所就讀的那所中學，是一個普通中學，多年來，沒有人考取過北大。王丹報考北大，在老師看來，太過於狂妄。我們雖然贊同他的志願，能否考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他卻矢志不渝。在臨近高考的三個月中，挑燈夜戰，奮力拚搏，終於如願以償。他拿到高考成績單後跑回家來向我報告時，那副激動的表情，猶如昨日。接到北大錄取通知書後，他倒平靜了許多。那天，下着淅淅瀝瀝的小雨，他騎車直奔北大。當他在熟悉的校園裏徜徉時，或許沒有料到，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對他的一生，將意味着什麼？

北京大學在二十世紀初葉，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向封建專制制度挑戰。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中，北京大學的青年學子，多次掀起民主愛國運動。民主與科學成為北京大學的精神堡壘。

王丹考入北京大學的那個時代，社會環境比較寬鬆，北大師生的思想比較活躍。他來到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學習，被熏陶，便萌發了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他同幾位同學舉辦

歲月蒼蒼

「民主沙龍」，創辦《新五四》刊物，探索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爲此，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失去了苦苦追求得來的北大學業。

一九九〇年初，我們收到北京大學寄來的開除王丹學籍的通知書。這雖在意料之中，但仍被震撼。我真想對着蒼天高呼：爲什麼這樣不公正？後來我去探監時，不忍心向他提及此事，怕傷害孩子。是他告訴我，他已經收到北京大學開除他學籍的通知書。他認爲所開具的理由不能接受，便原封沒動將通知寄回了學校。他說：「我爲國家失去學籍，這是我的光榮。」說此話時他雖然表情平靜，我卻感受到孩子內心的傷痛。不久，他寫了一篇題爲《心是飛向燕園的風箏》的散文，隨信寄給我。讀着飽含着兒子心血和淚水寫成的文字，我不禁潸然淚下。

王丹第二次入獄後，仍關注着北大。北京大學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牽動着他的心。一九九八年四月獲准赴美「就醫」。令他最高興的是，他終於在北大百年校慶時，能夠自由地向母校說幾句祝賀的話。

他曾經表示，即使不能再進北大讀書，將來也要成爲北大的一名榮譽學生。我期待着這一天早日到來。

歲月蒼蒼

「奉命」離京

一九九三年三月初的一天，我所工作的博物館館長找我，問了一些王丹出獄後的情況，表示關心。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王丹時常跟我到博物館來玩，年紀大一些的同事，可以說是看着他長大的。談話最後，他委婉地表示，「兩會」（即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王丹最好到外地去走走，以免記者打擾。這也不失為關心。對於領導的關心，我表示感謝。是不是近期讓王丹到外地去走走，我說：「我還沒有這個計劃。」王丹剛剛出獄才十幾天，身體還有待恢復，我還打算爲他做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

隔了一日，一位副館長找到我家，說：「你要是陪王丹到山東去看姥姥（外祖母），我們館可以出車送你們。」同樣也是表示關心。可是，待到關切地令人感到非同尋常時，引起了我的懷疑。我去找館長，問：「是不是北京市公安局兩位姓劉的『聯絡員』來過我們館？」「聯絡員」是我封的。這兩位原是王丹在秦城時的預審員，王丹出獄後，則由他們兩人同他聯絡。館長說：「來過，是我接待的。」果然不出所料，讓王丹在「兩會」期間離開北京，是公安局的意思，只是他們不想把事情搞僵了，便讓我所在的單位領導出

歲月蒼蒼

面，通過我去說服王丹。其用心何其良苦。

說心裏話，我不想讓孩子此時離開北京，一是出獄方十幾天，他忙於接待朋友和記者，還沒有來得及靜下來休息休息；二是他一個人到外地去，安全也是問題。一九八九年遭通緝逃亡在外的情景，至今我還心有餘悸。回家我同王丹商量，他的意思是等有關當局正式出面再說。

「兩會」召開在即。三月九日，館長再次找我，問王丹離京一事定下來沒有？此時，正直王丹姐夫要到海南去辦事，王丹也動了心。有人陪他一同外去，我也放心，這倒是一個機會。但是，費用太大，未敢貿然決定讓他隨姐夫一同前往。

館長再三催促，知上面決心已定，我也不忍心讓館長過於為難，便說：「王丹有意隨他姐夫去海南，但費用太大，未敢考慮。」他聽後如釋重負，趕忙表示：費用沒問題，博物館可以出，問我要兩千元還是三千元？一個毛孩子，出去玩玩，哪有讓博物館出錢的道理。我未置可否，只說回去商量。三月十日，我從博物館領取三千元現金。經手辦理此事的一位副館長讓我在一張字條上簽字，我當即表示：「是誰讓王丹離開北京的，這筆錢應該由誰來出，他們如果不出，我以後償還。」他忙說：「這個好說，好說，你看，這張條子上寫的是『取走』，不是『借走』。」我還真沒看條子上

歲月蒼蒼

是怎樣寫的。

我不明白爲什麼？這又何苦呢？王丹出獄後，接待過百餘位記者採訪，要說的話也都說了，再見記者，他還能說什麼呢？又怕他說什麼呢？

去訂飛機票又出了問題。訂票處看了王丹的身份證，不予辦理。理由是王丹的名字已列入海關扣留人員名單。我們估計，可能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對二十一名大學生的通緝令發出後，公安機關發給機場、車站、海港的予以扣留的名單。顯然，王丹被釋放後，公安機關還沒有通知他們。經交涉，方購得機票。

三月十三日，在「兩會」召開的前兩天，王丹「奉命」離開北京，起程赴海南。



一九九三年三月王丹「奉命」離京，前往海南，後去廣西。此為南寧機場。
(明報資料室)

歲月蒼蒼

佛山被扣

王丹到海南，從海南又去了廣西北海。在那裏，他會見了老朋友，結交了更多的新朋友，玩的很開心。唯一令他不快的是，所到之處，公安部門都對他嚴密監控，派「便衣」緊緊跟蹤。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王丹從廣州來電話，說他同他姐夫將乘飛機於當晚九時到北京。時隔不久，他姐夫又來電話，說他同王丹在佛山機場正要登機時，被佛山機場派出所扣留。接此消息，家人都非常着急。害怕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爲什麼被扣，扣留多久全然不知。我們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

我立刻打電話，尋找那兩位姓劉的「聯絡員」。晚十時左右，這兩個人風風火火來到我家，神情顯得很意外，說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表示一定要設法同廣東方面盡快取得聯繫。我要求他們趕快把王丹找回來。我擔心王丹遭到無理扣押後，又要絕食抗爭，使事態擴大，他自己吃苦頭，又連累了姐夫。第二天，兩位「聯絡員」開車到博物館找我，要請我吃中午飯，我婉言謝絕了，要他們有事到家裏來談。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他們顯得很得意的樣子告訴我，他們費

歲月蒼蒼

了很大周折，才同廣東省公安廳取得聯繫，王丹明天就可以回到北京。他們還對我沒有把王丹被扣的消息向傳媒公布表示感謝。

當時「兩會」還沒有結束，記者不斷來家（因當時家中尚未裝電話）詢問王丹回來了沒有？那一天，就在獲知王丹在佛山機場被扣不久，就有一位台灣記者到家來，問王丹什麼時候回來。我完全可以告訴他，王丹被廣東公安部門扣留。消息傳出去，肯定引起輿論關注，在第二天李鵬主持的記者會上很可能有人會提出質問。我沒有如實對他講，只說快回來了。因為王丹剛剛出獄，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求平靜，不想添麻煩。王丹回來埋怨我，不應該封鎖消息，應當及時把消息報出去，以使外界瞭解真相。

據王丹回來講，他們在佛山被扣後，很快被轉移到廣州市廣東省公安廳的一個招待所裏，專門請了一個老媽給他倆做飯，爲了消磨時光，特地爲他們租錄像帶看。公安廳的一位領導找王丹談話，開門見山地告訴他，扣留他是秉承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要求，在「兩會」結束前，不許王丹回北京。這位領導沒有想到，王丹的衣袋裏裝了一個小小的錄音機，談話間，他偷偷地打開了開關，把談話錄了下來。回到北京後，王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質問在廣州被扣留一事。他們

歲月蒼蒼

百般推諉，王丹當場把錄音放給他們聽，他們一笑了之。

生日的坎坷

我們夫妻二人，因為工作忙碌，生活艱辛。幾十年風風雨雨，彼此都沒有過過生日。自然，也很少為孩子過生日。王丹卻很看重自己的生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就在他出獄後的第九天，迎來了他的二十四歲生日。這一天，他的幾位同學和朋友在家裏為他慶賀了一番。生日蛋糕上印着「六四」兩個鮮紅的大字，上邊六個，下邊四個花朵環繞四周，顯示朋友們的一番匠心。

提起生日，不禁使我想起，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在公安部轉發的北京市公安局對二十一名大學生的通緝令上，在王丹的名下，公然寫着二十四歲，而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王丹被釋放的那一天，在法院的一份文件上，又寫着二十三歲。二十四歲的王丹，坐了三年又七個月的牢，居然又回到二十三歲。莫非是時光倒流！同樣是政府的文件，同樣是關乎一個人人生的大事，卻是如此令人費解。

一九九四年二月，王丹出獄已經一年，業已恢復了公民權利。他同幾位朋友商議，打算在二月二十六日他二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天，舉行一次生日聚會。他們想通過這一活動來

歲月蒼蒼

表明，即使在政治上同政府有某些不同的見解，即使政府把他們視為「異己」，他們也有正常生活的權利。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熱愛生活，也應當被生活所熱愛。他們想向世人顯示，他們生活得也很好，搞生日聚會，出外郊遊，邀朋友聚談。他們要堂堂正正地生活。事實證明，他們所面臨的生活，卻是十分嚴峻。

王丹計劃同朋友搞生日聚會，沒有告訴我，可能是怕我阻撓，也怕我擔心。直到二月二十四日，公安人員登門「造訪」，我方感到氣氛緊張。先是被稱之為「聯絡員」的兩位姓劉的人員來我家，同王丹沒談多久便告辭而去，看來，話不投機。事後王丹告訴我，他們兩位是以「朋友」的身份，勸他取消這次生日聚會。因為「兩會」召開在即，在這種敏感時期，聚集這麼多敏感的人物，萬一出了什麼事，王丹擔當不起。王丹沒有答應。不歡而散。臨走時，他們丟給王丹一句話：「一處（即北京市公安局一處）的人還會來找你。」我聽此話，也感到幾分緊張，力勸他在家中請幾位朋友聚一聚就算啦，何必招惹事非呢！他執意不聽。王丹認為，作為一個公民，邀請朋友相聚，是他的權利，政府無權干涉。當天晚上他沒有回家，來電話說他要在西郊的一位朋友家住幾天，要我不要擔心，保證隨時同我保持電話聯繫。

歲月蒼蒼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怕在他生日前夕，公安局人員把他關押起來，以使聚會告吹，所以提前躲了出去。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許，市公安局一處的張處長等兩人登門「拜訪」，王丹不在家，便對我說：「如果王丹在家裏舉辦生日活動，請誰都可以；如果在公共場所舉辦，我們將會採取措施。」話說得十分嚴厲。他們要求我把公安局的意思轉告王丹，並希望我能說服他。我懇切地向他們表示：我原也想讓他在家中舉辦，只是住房太小，實在擁擠，沒有聚會的空間。他們走後，我便同王丹通電話，轉告市公安局一處的意思。大約中午十一時，一處的人員又來我家，說他們電話傳呼王丹，沒有回話，來看看他回來了沒有。語氣也較早晨緩和了一些。我答應設法找他回來。他們走後，我再次同王丹通電話，要求他趕快回家。中午，王丹在躲藏的地方給一處去電話，表示可以協商。下午一時，在家中，王丹同一處張處長等人員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雙方都作了一定的讓步，氣氛緩和了下來。公安局同意舉行生日聚會的時間、地點不變，王丹則答應撤回由公安局提出的、認為最敏感的人士魏京生、劉曉波等的邀請。雙方終於達成了一致。

歲月蒼蒼

歡笑伴着陰影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王丹二十五歲生日聚會在北京西郊的一個名叫湖光舞廳如期舉行。家人也應邀前往。我們去一是爲他助興，二是不放心，怕會出什麼亂子。我們去時，天色已晚，暮色蒼茫中，我看到在通往湖光舞廳的大路旁，每隔三、五米便有一個「閒人」站在寒風中，一看便知道是便衣警察。氣氛很不尋常。後來聽說，這一天在舞廳周圍，有二、三百名「便衣」看守，大大多於來賓。舞廳的大門前，赫然貼着一張大布告，用中、英兩種文字寫着：「秉有關方面之意，本次聚會謝絕記者採訪。多謝合作。九四、二、廿六。」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張布告是王丹同有關當局相互妥協的結果。

我們來到大廳，晚會已經開始。台前擺滿了鮮花。兩個大花籃格外引人注目，是舞廳旁一家花店老闆，聽說是王丹的生日聚會，特意派人送來的。舞廳的另一邊，堆放着朋友們送來的各式各樣的小禮品。歌聲、笑聲，氣氛熱烈，但卻有幾分拘謹。原來，入口處擺着一張方桌，與衆不同，我再一看，桌旁坐着我認識的四個人，他們分別是市公安局一處和七處的人員。他們爲王丹送了蛋糕和鮮花。我走過去同他

歲月蒼蒼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經與北京市公安局一處交涉，王丹獲准在北京西郊的「湖光舞廳」為自己舉辦生日聚會，以慶祝自己二十五歲生日。（明報資料室）

們一一打招呼。

王丹見我們到來很高興，把我們請到早已準備好的座位上，抱起不滿三歲的小外甥，到人群中去了。到會的有王丹中學和大學的同學，但大部分還是他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的朋友和在秦城監獄共度苦難的難友，共一百餘人。這是在「六·四」那場腥風血雨之後，在北京的持不同政見人士最大的一次聚會。

歲月蒼蒼

看着那一張張洋溢着青春和熱情的笑臉，看着兒子被衆多的朋友圍在中間，盡情歡跳的情景，我禁不住熱淚縱橫。這是多麼好的一群青年啊！他們中的許多人，爲了祖國的民主和富強，在四年前的那場愛國運動之後，遭受過追捕、拘押和牢獄之苦；他們的同伴有的還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如今，這一株株稚嫩的幼苗，在經歷了種種的風雨坎坷之後，都已長大成材，應該成爲國家的棟樑。我們的國家應該爲有這樣一群有理想、有熱情、有才幹的青年感到驕傲和自豪。他們才真正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令人感到痛心的是，這些年輕人，卻不能被自己國家的政府所接納。他們中的大多數，處於失學、失業的困境中，過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王丹二十五歲生日在風風雨雨中度過了。這是一次令他終生難忘的生日。正如一篇報道中所寫的：

王丹二十五歲生日，過得幾乎同世界上所有的二十五歲青年都不同——沒有多少人這樣成熟，這樣冒險，這樣有技巧。

王丹對這次生日聚會也比較滿意。在他看來，聚會能夠按預定計劃如期舉行，就是勝利；同時，他認爲這次生日聚會的舉辦，也是持不同政見人士同當局相互溝通的一次嘗試。他們期望溝通，不希望對抗。

歲月蒼蒼

可是，這場生日的風雨過後，並未見朗朗晴空。不久就聽說，王丹的這次生日聚會，很快便上了公安部門的「敵情通報」。還聽說，在此後不久的一次江澤民的講話中，列舉了當前的四大敵情，王丹的生日聚會列為首條。

鮮花和蛋糕（公安局所送）的背後，隱藏着刀光劍影。善良的朋友們，你們能夠想象得到嗎？

樹欲靜而風不止

王丹期望同政府溝通、不搞對抗的善良願望，並沒有換來生活的平靜。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兒子告訴我，他想同兩位朋友到河南少林寺去玩玩，放鬆一下籌辦生日聚會的緊張情緒。我見有伴同行，也就沒有在意。三月四日凌晨，叩門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開門一看，見是王丹，只見他滿臉倦容，踉踉蹌蹌站在門外。我吃了一驚，忙問：

「怎麼這麼快就回來啦！」

「根本就離開北京！」他憤憤地說。

原來，在他們乘坐的火車開車前幾分鐘，兩個公安人員突然竄到王丹的坐位前，二話沒說，一左一右，像提小雞一樣，把他架出了車廂。兩位同伴見此情景，機警地立即跳下

歲月蒼蒼

了火車。就在他們的腳跟剛剛踏在站台上的一瞬間，火車隨着一聲長鳴，緩緩地開行，拋下這三個在寒風中感到氣憤和困惑的年輕人。這時，正是三月二日夜十一時。他們三人隨即被公安人員帶到北京火車站派出所，關在一間髒兮兮的房間裏。順手拋給他們三個盒飯。十五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人理睬。自第十六個小時起，王丹憤而宣布絕食、絕水。九個小時後，也就是被拘禁二十四小時後，市公安局一處來人，向他們宣布：這是一次誤會，你們可以回家了。沒有說一聲道歉，也沒有說一句安慰的話。這時，正是三月三日夜十一時許。

春光明媚的北京郊外，誘惑着年輕人。王丹和朋友們相約，到西郊香山去遊玩。這一活動計劃不知怎麼被公安局知道了，他們找到王丹，要求取消這一活動。王丹沒有答應。他堅持認為，持不同政見人士也有同一般人一樣生活的權利。就在他們相約郊遊的那一天早上，我們剛吃完早飯，王丹正準備出發，警察登門，出示傳喚單，把他帶到派出所，春遊被迫取消。有兩位沒有得到消息的朋友，如期來到約定地點，被等候在那裏的公安人員抓獲，不久，遣送回原籍。

當局對持不同政見人士的控制越來越嚴。一九九四年「六·四」前夕，王丹主動離開北京，到山東姥姥家去住幾

歲月蒼蒼

天。說來也巧，這一年的「六·四」前，幾乎所有官方認為敏感的人士，不約而同，相繼離開北京。這一舉動引起了公安機關的猜疑。他們懼怕這些人在外地搞什麼活動。王丹偏偏又在回荷澤的途中下車，在濟南玩了兩天。北京市公安局發現王丹沒有如期到達荷澤家中，很是緊張，派人到家來找我。我向他們保證，王丹不會在外邊鬧事，請他們放心。他們仍然憂心忡忡。

王丹每次離家外出，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到外地，都同我保持密切的電話聯繫，他深深懂得，「兒行千里母擔憂」這句古語，更何況他時時處在公安機關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不久，王丹來電話，我告訴他，公安局對他很不放心，要求他趕快回到姥姥家去，不要在外邊逗留。同時，我也匆忙趕回老家，用公安人員的話說，有我陪王丹，他們就放心。

「六·四」過後，我同兒子、侄子準備回北京。王丹提議我們途經泰安時，下車到泰山一遊。我從到北京讀大學起，四十年來，來往經過泰安數十次，卻從沒下車一遊。兒子想了卻我這一心願，我也想有他們兩人陪同，機會難得，便同意了。不料，「便衣」一路騷擾。火車上緊相隨；下車出站時，早有人迎候，毫不隱蔽，舉起攝像機便拍，不知留此存照做何用；住下後，半夜深更敲門「查戶口」；上山下

歲月蒼蒼

山，前呼後擁。我只感覺身後有一群蒼蠅，使人遊興索然。

由跟蹤到恫嚇

一九九四年「六·四」之後，公安機關對王丹的監控更加嚴密，也更加嚴厲。平時，總有八、九個人，兩輛轎車，一輛摩托車，駐守在我家樓下的傳達室裏，進行每天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控。王丹只要一出家門，「便衣」機動車、摩托車一齊出動，緊跟其後，煞是威風。對於這種非法的跟蹤行爲，王丹多次提抗議，還控告到法院，均視若罔聞。無奈之下，他宣布絕食四十八小時，用生命抗爭。我很着急，通知公安局來人。來人無話可說，只表示回去以後向上級反映。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便衣」們不但沒撤，反而由盯梢變成了貼身跟蹤。這顯然已經不是監視，而是公然的威脅、恫嚇。

在這年八月的一天，孩子買了三張北京音樂廳的票，他要陪同我和他父親，去聽五十年代我們大學時代熟悉的蘇聯歌曲的演唱會。開演前，我們三人高高興興地從西單向六部口走去。我走在他們兩人的後面。行進中，一輛轎車跟在身後，一輛摩托車在身旁「護衛」，與我們同行。兩個便衣警察緊緊跟在我身後。磨肩擦踵。兩個「便衣」衣冠不整，腳

歲月蒼蒼

穿拖鞋，高聲談笑，旁若無人。我忍無可忍，轉身朝着他倆訓斥了一頓：他們稍稍收斂，停在距我們較遠的地方。摩托車仍緊緊與我們同行，發出刺耳的轟鳴。我滿腔怒火，欣賞音樂的情緒已蕩然無存：王丹也很生氣。我們只好退票，快快而歸。

在初被「便衣」跟踪時，王丹表示了容忍，盡可能避免同當局發生直接衝突。他也有時也同「便衣」耍逗。一天，他在家閒着沒事，想溜一溜警察，便同表弟蹬上自行車，在我家附近交錯縱橫的小胡同裏穿行，同他們捉迷藏。還有一次，他揹個大包，裝出要遠行的樣子，「便衣」見狀，開動各類交通工具，緊跟其後。王丹走到胡同口買了一根冰棍，慢慢悠悠往家走。小轎車只得調頭急轉。跟踪日漸升級，他爲此事常常向我訴苦。我也很擔憂，怕有朝一日孩子不堪忍受時，精神會崩潰。儘管如此，我還是勸他，能容忍時且容忍，以免滋生事端。事實證明，樹欲靜而風不止。

王丹在被跟蹤的日子裏，曾同「便衣」發生過幾次磨擦。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七日。這一天早晨，他告訴我，他要到北京圖書館去看書，下午才能回來，要我放心。我前一天出差回來，正在家休息。兒子走後約一個小時，便神情慌張跑回家來，進門就說：「『便衣』要

歲月蒼蒼

打死我！」原來，他正在閱覽室看書，兩個「便衣」突然闖進來，向王丹尋釁，大聲辱罵。王丹也不示弱，當着眾多的讀者，回敬他們是「狗特務」。「便衣」威脅說：「你一出門，我們就打死你！」為避免意外，王丹從圖書館的後門跑回家來。待到中午我們託人去取他的書包時，只見幾個「便衣」還呆呆地守候在圖書館的大門口。

事件發生後，我們很氣憤，也很擔憂。消息傳出後，外界很關注。國內的幾位朋友聯名上書當局，要求保障王丹的人身安全。王丹向當局表示抗議。當晚，公安一處的人員來我家，聽取王丹的敘述。我也以母親的身份，強烈要求政府停止這種非法的監控跟蹤活動，表達了對孩子生命安全的擔憂。來人只是說，王丹這兩天先不要出門，他們盡快向上級反映。

一個星期過去了，仍沒有答覆。王丹一氣之下，決定離家出走。十二月十四凌晨，趁警察不注意，他冒着凜烈的寒風，騎車消失在茫茫夜幕中。目送着孩子的背影，百感交集。一個年輕人，無一槍一卒，僅僅因為公開發表同政府不同的政治見解，便被如此跟蹤、恫嚇，以致被迫離家出走。究竟怕什麼？

王丹不堪忍受，發表一封《為準備入獄致海內外朋友告

歲月蒼蒼

別書》。他歷數了幾個月以來，當局對他肆無忌憚地非法跟蹤、恫嚇行爲，氣憤地寫道：「當局對我採取的做法，已經超出了基本的限度，直接地剝奪了我的最基本的人權。如果我繼續置之不理，就是助紂爲虐。我知道，在中國目前狀況下，我所採取的一系列正義行動，必將引起當局的忌恨。但我不會用個人的尊嚴與自由，去換取政府的寬容。我寧肯失去全部自由，也不能用沉默給外界一個對中國人權的歪曲印象，爲此，我準備入獄。」

一年以後，王丹再次被關押，後又被判以重刑，失去了全部自由。中國政府以自己的行爲證明了這一切。這一行爲喚醒世人，也使後人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人民的權利毫無保障的時代。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王丹獲提前釋放，從北京監獄返回家中並接受記者採訪。旁為王丹母親、王丹姐姐及外甥小天（美聯社）。

第五章

兩地悠悠



歲月蒼蒼

難忘五月二十一

一九九五年春天，來去匆匆。

一九九四年起，儘管公安部門對王丹及其他持不同政見人士嚴加監控，但這只能控制他們的行蹤，卻無法遏制他們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的理念。一種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他們時刻關注國家的進步、民族的命運。這一年二、三月間，王丹和另外兩人分別領銜發表了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於保障人權、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及遏制腐敗的呼籲和倡議。對此，當局沒有採取行動。

五月十五日，又發表了由著名科學家王淦昌先生領銜，由許良英先生起草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共有四十五位老年、中年和青年知識分子簽名，我和王丹都簽了名。我非常贊同呼籲書中所寫的「寬容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前提」、呼籲書強烈「希望全社會培育尊重他人的寬容精神，倡導以理性、公正態度處理各種矛盾和衝突，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見解，避免激化矛盾的極端情緒、切忌暴力行爲」。

不久，劉曉波又起草了一份題為《汲取六·四血的教訓，加強法制建設》的呼籲書，有幾十人簽名，王丹也在其

歲月蒼蒼

中。這份呼籲書尚未來得及發表，劉曉波便被公安機關抓走。

聽到曉波被捕的消息，我心中一驚，即告誡王丹要多加小心，不可麻痹大意。他似乎不以爲然，但卻做好了入獄的思想準備。「六·四」六週年在即，去年他主動離開北京，今年，他決定留在家中，等待風雨來臨。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令我終生難忘。

這一天，是個星期天，天空陰雲密布。下午五時許，我正在廚房準備晚飯。王丹匆匆忙忙跑到廚房，喊道：「媽！警察來啦！」他是正通過窗戶往樓下眺望時，發現警察正向我們的樓內奔來。我急忙從廚房跑出來，還沒有走到門口，敲門聲已經響起。王丹上前開門，只見三個身着警服的警察。他們一言沒發，伸手向王丹出示了傳喚單。王丹看也沒看，拒絕在傳喚單上簽字。就這樣，來人沒有向家人作任何解釋，三個警察便押着王丹下樓去了。我依窗目送兒子遠去。他身穿一套灰色的運動休閒服，手裏拿着兩本書，從從容容走在警察的前面。望着孩子的背影，只感茫然，沒有多想。誰能料想到，此一去渺無歸期。從此，他和我們全家，重又陷入了苦難。

王丹被派出所傳喚已有多次，這一次，氣氛和從前卻有

歲月蒼蒼

些不同。以往每次來兩個警察，也還比較客氣，這一次來人神色嚴厲。更令人不安的是，竟然在院門外停了一輛警車。我家距派出所只有五分鐘的路程，傳喚王丹從來沒有來過警車。我看着警車載着孩子向派出所方向駛去！是不是去派出所，還是疑慮重重。十幾分鐘後，我撥通了派出所的電話，經證實，王丹確實在我家住地的派出所。

此前，已經聽說公安局抓去了幾個人，王丹此去能不能像以往一樣，如期歸來，我總覺得凶多吉少。

晚飯做好了，誰也沒有心思吃。六時三十分，我給派出所去電話，詢問王丹的晚飯如何解決？對方回答：「到時候買一點吃就可以啦，你放心，餓不着他！」我們正要吃飯，一位民警來電話，說：「家裏可以送飯！」接着，他又補充一句：「王丹說不要。」聽此話，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立刻意識到，他可能要絕食！肯定是派出所買飯他不吃，才來電話讓家人去送。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給他送了一大碗雞蛋炒飯。

家再次被抄

五月二十一日晚九時，我們兩人正在商議，過一會到派出所再去看一看孩子，看看送去的飯吃了沒有？順便再給他

歲月蒼蒼

送杯牛奶去。他父親正待要動身，忽聽門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我還沒來得及思索，便聽到「咚！咚咚！！」的敲門聲。王丹父親起身去開門，一群身穿警服和穿便衣的人蜂擁而入。足足有十幾人。來者不善，我立刻意識到，是來抄家的。始料未及。

此時，我正坐在王丹住室的沙發上。幾個警察來到室內，為首者穿一件咖啡色便衣，大約五十餘歲，看來像是一個領導幹部。其勢洶洶。見人進來我沒有起身。他衝着我闖頭就問：「你是不是王丹的母親？」我心裏想，哪有來人不自報家門，反而質問主人的，便沒理睬他。他轉頭又問王丹的父親：「你是不是王丹的父親？」王丹父親站起來，上前一步，衝着來人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旁邊的一個年輕人見勢不對，趕快向我們宣讀了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簽署的搜查證。大意是說要對王丹居住的四單元五〇一室進行查抄，什麼原因沒有說明。他們要求我們在搜查證上簽字。我們質問他們：「五〇一室是我們全家的住室，我們犯了什麼法？」拒絕簽字，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僵持幾分鐘，他們以「妨礙公務」相威脅。我們不想再同這伙不講理的傢伙糾纏，便躲過攝像機的鏡頭簽了字。為首者惡狠狠地說：「簽字就簽吧！為什麼還要鬼鬼崇崇的！」

歲月卷卷

警察們分別在王丹居室和他姐姐的居室內查抄。對王丹的上千本書刊，一本一本翻查，書桌的抽屜被撬開，其中物品，一件也不放過，那位爲首者，抄起相機，抽出膠捲就要曝光，我連忙阻止，說明膠捲是我的，是昨天我們老同學聚會時所攝，有些四十多年沒見過面，留下此照不容易，你們不能報廢。他方才勉強停止。但膠捲還是抄走了。一年之後，方把這捲膠捲還我。每當我看着這批發黃的照片，便想起那場劫難。在門廳的書架上，有一批港台出版的雜誌。我說：「這是我搜集的歷史資料，準備將來作研究用，你們不能抄走！」他們邊往袋子裏裝邊說：「你以後要用，到圖書館查去！」

我一再向來人說明，五〇一室有我們三家居住，除王丹的房間，別的房間不能查抄，他們不但不聽，爲首者還下命令，將他姐姐居住的那個小房間，再查抄一遍。我一邊看着他們像犁田一般搜查，一邊對他們講，一九八九年第一次來抄家時，只來了五、六個警察，只在王丹放書桌的房間裏查，其他兩個房間，他們問也沒問。爲首者說：「我們是依法辦事！」我冷笑一聲說：「哼！你們還有法！一九八九年七月，你們第一天抓了我的兒子，第二天就把我抓去，差一點把我關成殘疾，最後給我的結論是『沒事了』，你們依的

歲月蒼蒼

是哪一家的法？」在場的人都聽着，默不作聲。

我看着他們往袋子裏裝錄相帶，便告訴他們，很多不是王丹的，有些是我小外孫的，其中一盤《黑貓警長》是最近他過五周歲生日時朋友送的，他們不予理睬。兩個總共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查抄了兩個多小時，所抄物品應有盡有，大者有電腦、複印機、傳真機，小者有照片、各類證件、銀行存摺、現金，書籍、期刊、手稿、各類紙片更不待言，滿滿裝了五、六大袋，擺在門廳裏，可謂壯觀。見此，我諷刺地問他們：要不要把我家的鍋、碗、瓢、勺都拿走？

我家已是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六個警察在戒嚴士兵的護送下，來到我家，我目睹了那場查抄。沒想到事隔六年，還是那個房間，還是兒子那張書桌，卻再次遭受厄運。這一次，來的突然，無理，其勢洶洶，為首者的蠻橫，查抄的仔細，抄去的物品之多，都遠遠超過第一次。我感到痛心。不是心疼孩子的物品被抄走，而是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感到悲哀。

抗爭

在三個多小時查抄的時間裏，我沒有恐懼，只感到悲哀和鄙夷。查抄人員默默地行動，房間裏靜悄悄。只有我們倆

歲月蒼蒼

人不時地說幾句嘲諷、挖苦和抗議的話。我向他們講，六年前抄家時，只查抄了王丹的一張書桌，六年後抄家，卻要抄我們全家，連五歲的小孩也不放過。歷史如此倒退，你們不感到可悲嗎？

這些話，也許打動了一些人的心。有一位年輕人走過來，趁人不注意，悄悄對我說：「阿姨！你不要着急，王丹也不是小孩子啦！」還有一個人，拿到王丹的身份證，偷偷塞到我手裏。我可以看得出來，有些人查抄時並不經心。

將近夜間十二點鐘時，為首者率領十幾個警察，要抄我居住的房間，雙方爭執達到了高潮。我提出，查抄我們的房間，是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你們要負法律責任；這個房間裏的所有東西，都屬於我們倆人所有，與王丹無關，你們若硬是要抄，抄走的所有物品，都要登在我們兩人的名下。他們不予理睬。我一氣之下，搬了一條櫈子坐在屋門口，堅持不讓他們進去。僵持了十幾分鐘，為首者說：「你寫一份保證，保證這間屋子裏沒有王丹的東西」，我立即答應。心裏想，不管怎樣，你就是不能抄我這個房間。因為我知道，王丹平時有所警惕，他將諸如信件、記錄本之類的東西放在我的書櫃裏。我正要拿紙去寫字條，他卻又變了卦，下令強行搜查。我也很強硬，說：「好！這可是你說的，一切後果由

歲月蒼蒼

你負責！」邊說邊起身讓他們進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十幾個人忽拉一下擁到屋裏，齊刷刷地站在那裏，沒有一個人動手，相互觀望着。這種局面僵持了數分鐘。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警察，大概是怕他的領導太難堪，也爲了緩和一下氣氛，便出來圓場，對我說：「你把所有的櫃子、抽屜的門都打開，你說有王丹的東西，我們就查，你說沒有，我們就關上。」

我緊緊地立在我的書櫃前，王丹的父親將其他的櫃門、抽屜都打開。不料，位於門口的一個衣櫃的門被打開時，從裏面掉出一捲紙，這正是王丹的衣櫃，裏面有些什麼東西，我也不清楚。他們發現有王丹的東西，便仔細查抄。突然，一個小伙子走過來，塞到我手裏一個紙包，大聲地問我：「這是不是你的東西？」我立刻悟出他的意思，毫沒猶豫，回答：「是！」。事後我一看，原來是幾張人民幣。小伙子的這一舉動令我感動。他不僅僅是保護這幾張人民幣，而是表達了善良和正義。這個房間在我們的抗爭下，只象徵性的查抄一番，一無所獲。

整個查抄進行了三個多小時，全部人馬離開我家時，已經是二十二日凌晨。

我「送」他們到樓梯口，大聲喊：「你們根據什麼法

歲月蒼蒼

律，查抄我們全家！」他們聞聲，更加快了腳步，落荒而逃。夜闌人靜，譴責聲在樓道裏迴盪。我要讓全世界人都知道，還有這樣不講道理政府。

一夜沒有入睡，坐在兒子的居室裏，眼前一片淒涼。看到兩度被公安局撬過的書桌，悲憤異常。仰望蒼天，孩子何罪！遭此劫難。這難道就是我們向政府呼喚寬容的回報。

轉移前後

我們牽掛着被關押在派出所的孩子。二十二日一清早便給他送去一杯牛奶，中午，又送去一碗雞蛋麵條。待到再送晚飯時，民警將中午送去的麵條原封未動退給了我們。早晨的牛奶喝了沒有無法證實。王丹已經絕食！我本就沉重的心，好像已經墮入了深淵。相隔咫尺，但卻無法看見孩子。當晚，我給他送去一張字條，勸他無論如何要進食，保重身體，不能自己先躺下。同他們講理，一定要挺起胸膛去講。可是為時已晚。

與此同時，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發表了王丹事先寫給他們的絕食聲明，請在他一旦被捕時代為發表。我聽着孩子的聲明，百感交集。他出於一腔愛國熱忱，為了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迫不得已，又

歲月蒼蒼

要以生命抗爭 把一批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視爲敵人，予以壓制、打擊、以至拘捕 爲什麼中國歷史的車輪竟如此緩慢？想當初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也是熱血青年，爲了中國的民主和自由，拋頭顱、灑熱血，奮鬥了幾十年。他們若地下有知，又當作何想？

二十三日早飯後，我給派出所去電話，詢問王丹情況，所長說：「王丹已經不在我們這裏了，他已經於昨天晚上轉移走了！」好像一陣冷風襲來。「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不通知我們？」我緊緊追問。「轉移到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有關方面只讓我告訴你們在家等候通知。」

孩子不知被轉移到什麼地方，事態有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我們怎麼能坐在家裏靜等呢？二十三日下午，我同王丹父親一同來到位於東交民巷的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處。這是第一次「造訪」，不料，從此我們便同該信訪處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信訪處，我們辦完了登記手續，等候了兩個多小時，直到下午五時三十分臨近下班時，方出來兩人接待我們。我們問：王丹究竟犯了什麼罪？現在關押在何處？他的健康狀況怎樣，是不是還在絕食？接待人員的回答閃爍其詞，只說王丹目前在北京市公安局，身體狀況良好，但卻沒有否認絕

歲月蒼蒼

食。當我們再三追問王丹到底犯了什麼罪時，對方脫口說：「他不是搞了兩個簽名嗎？」我們還就抄家一事提出口頭申訴。我們提出：王丹被派出所傳喚剛剛三個小時，便對我們如此大規模地抄家，有沒有法律依據？你們對王丹的審查，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為什麼抄去他的現金及學習、生活用品？查抄王丹，殃及全家，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爲。我們要求有關部門調查此事。

接待人員反覆對我們講，不要把什麼事情都捅出去（指將消息傳給人權組織和海外媒體），中國的事情要由中國自己來解決，否則，會把事情搞複雜化和擴大化。我再三要求見見孩子，他們不允許。我當即表示，一天不讓見孩子，我們就天天到信訪處來。他們表示，我們的要求，他們馬上向上邊匯報。

同一天下午，我們又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說明王丹已由新街口派出所轉往別處，又鑒於王丹絕食已是第三天，作爲父母，焦急萬分，我們有權瞭解孩子現在何處及健康狀況，請予以回答。

二十四日凌晨三時許，電話鈴聲把我們驚醒。對方說他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對我說：「你們不是要瞭解王丹的情況嗎？我們一會就去你家。」公安局的人深夜登門，令人格

歲月蒼蒼

外惶惶不安。不一會，來了三個人，剛剛落坐，一個人便拿出一張紙向我們宣讀，大意是：一，王丹因涉嫌擾亂社會秩序，要對他進行審查；二，家屬可以由他們給帶去些衣物及生活用品；三，家屬要配合，怎樣配合，心照不宣。一人宣讀，一人記錄，然後，讓我在記錄稿上簽字，要求寫上「以上聽明白了」。我說：「我不明白，只能寫『聽清楚了』」。他們無可奈何。我問王丹的身體怎樣？來人說：「一切正常。」我緊追一句：「是不是包括吃飯？」他不置可否。大概怕我再行追問，三人便起身準備告辭，並鄭重地對我們說：「我們只負責傳達。」意思是無權解釋。我看他們出言小心謹慎，也就沒再多問。他們都是執行人員，一句話說不好，可能會砸了飯碗，不便多所為難。

公安局人員深夜登門，使我連續幾個夜晚都惶惶然。此後，我曾多次在睡夢中被鈴聲驚醒，原來卻是幻覺。

威脅恫嚇無奈何

兒子被轉移，是否仍在絕食，得不到證實，四天來，我寢食不安，恍恍惚惚。五月二十五日，我再次給北京市公安局寫信，要求向家屬說明王丹目前的健康狀況，並允許我見見孩子。信寫好後，我冒着漫天風沙，拖着疲憊的雙腿，再

歲月蒼蒼

次來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處，接待過我們的那兩位工作人員接待了我。我關頭就問：「王丹是不是還在絕食？」一位姓王的人員含含混混地回答說，據說已經開始進食，我要求予以證明，他未置可否。我又問：「目前對王丹的審查是什麼性質的審查？」回答：「審查就是審查。」迴避了實質性的問題。我再次就抄家一事要求進行調查。

不知是我頻繁地前往信訪處還是寫給北京市公安局的那封信觸怒了他們。二十五日這一天，我剛剛從信訪處回到博物館的辦公室，公安局的人便追到博物館來。大約上午十一時，黨委辦公室主任要我到他那裏去一趟。「談談孩子的事」。我一見等候在那裏的兩個公安人員，其中一個就是二十一日晚抄家時的爲首者，一臉兇相。見是他，我立刻升起一腔怒火。我剛剛坐定，他便拿出一張紙，指着我問：「王凌雲！你寫的信中說，『王丹絕食至今已第五天』，根據是什麼？」聲色俱厲。我說：「王丹離家後的前兩天，我們送的飯被退回就是根據！」我的聲音比他還高，我又對他講：王丹被轉移以後，我們幾次到公安局，一再追問，王丹是不是還在絕食，始終得不到肯定的回答，要求見見孩子，也屢遭拒絕。我們無法證實，當然可以推測。

多少年來，同公安部門打交道，我始終本着不卑不亢的

歲月蒼蒼

原則。我始終認為，儘管你是專政機關，有着無尚的權威，但就王丹一事，道義在王丹和我們一邊。無論是威脅恫嚇，還是牢獄階下，我都心地坦然。從人格上講，我比他們高。同時，我還本着另外一個原則，就是同公安人員接觸時，對方若是客客氣氣，以禮相待，我也會客客氣氣，不去更多地為難他們。假若你不客氣，我也會以牙還牙。今天既然你來者不善，盛氣凌人，我也必須在道義上、氣勢上壓過你。

他指着信紙威脅道：「你說『王丹絕食已經第五天』這句話，應該負法律責任！」我冷笑一聲，說：「應該負什麼樣的法律責任，請你拿出條文來！」他拿出一張清單給我看，原來是王丹五月二十四日三餐的食譜。我看後交給他，不以為然，指出：這個食譜只能說明你們給王丹送去了這些飯菜，怎麼樣證明王丹已經吃了呢？退一步講，就算王丹已經進食，前兩天我們一再追問此事，為什麼不予回答？他無言以對。

話鋒一轉，他又說：「王丹的問題已經複雜化和擴大化了。你和你的家人都要負責任！」顯然是在恫嚇。我明白，他指的是我們將王丹被捕和絕食的消息向外界作了披露。應負什麼責任？我讓他拿出法律依據來。「現在不拿，等以後再拿，我們隨時都可以依法制裁你！」他又補充一句：「我

歲月蒼蒼

們有涉外法。」面對這似無賴的威脅，我只感到鄙夷，又覺好笑，他顯然是在爲自己壯膽。我問他：「我一沒有洩露國家機密，二沒有製造謊言，你怎麼樣制裁我？」他不說話，我告誡他，說：「你不要動不動就以要負法律責任來嚇唬人。你們那裏我也不是沒蹲過（指一九八九年我被關押）！」

威脅恫嚇沒有取勝，他轉而又說：「你不要受人利用，別人讓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我只報之以冷笑。他不甘罷休，訕訕地說：「你不要天天到我們信訪處來，妨礙我們的工作！」我本不想再同他爭辯，一聽此話，氣就不打一處來。那種地方誰願意去！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王丹逃亡在外，一看到警察，我的心就顫抖。就是他們，正在追捕我的兒子。後來，我又被送進看守所，種種景象，歷歷在目。從此後，只要一看到穿警服的，我總有一種莫名的感覺，似乎他們時時都在牽動着我們一家人的命運。我很氣憤地同他爭辯：「市公安局信訪處接待來訪人員，是他們的本職工作，我是北京市的公民，他們有責任接待我！」我向他表示：王丹的問題一天不解決，我會一天不停地到信訪處去。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舌槍唇劍，他的囂張氣燄一掃無餘。他也頗感沒趣，只好說：「你要是再去信訪處，我們也得接

歲月蒼蒼

待。」

回到辦公室，冷靜下來，心中有一種說不清的滋味。幾天來的憤與怒，今日得以渲洩，可謂一吐為快。但是，自己這般年紀，讓他們這般指責、恫嚇，想當年，真成為階下囚時，也沒遭此對待。爲了這個兒子，今後還不知會遭受什麼災禍。

絕食牽動着人們的心

王丹絕食抗議政府的無理逮捕，牽動着很多人的心。傳媒播發了王丹委託「中國人權」發表的「絕食宣言」後，海內外的許多朋友時常打電話來，詢問王丹的情況。北京師範大學劉遼教授寫信給我們，對王丹絕食深感憂慮，要我們轉告他，不論在任何環境下，都要鍛煉身體，增強體質，許良英先生幾乎天天來電話，詢問王丹的消息，他很擔心，假若繼續絕食，他們會強迫進食，果真如此，孩子將會承受很大痛苦。王丹的朋友，多數年輕氣盛，多次向我表示，要到公安局門前去靜坐。我總是力勸他們，要冷靜對待。

五月二十六日，香港的一位朋友來電話，說有記者從香港往北京市公安局打電話，詢問王丹絕食情況，公安局沒有否認。孩子究竟恢復進食沒有，仍然疑雲一團。當日，我再

歲月蒼蒼

次給公安局寫信，這次是寫給局長的，要求就王丹是否仍在絕食予以證實，讓王丹寫個字條出來，或者是在公安局向我出示的那張食譜上簽個字。這樣，家人放心，朋友放心；對外界種種傳言亦可澄清。我的態度是誠懇的。自然，這封信也同前幾封信一樣，泥牛入海。

在王丹絕食的日子裏，香港同胞傾注了很大的愛心。香港的記者朋友，每天都來電話，密切關注王丹的命運。香港一千多名基督教徒集會，為王丹祈禱，祝願他身體健康。我們深受感動。

正是這些來自各方的朋友的同情和鼓勵，使我們度過了那段惶惶不安的日子。

王丹絕食，政府也沒有坐守旁觀。六月初，大陸政府在香港的輿論陣地——《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揭露」王丹絕食是一場「鬧劇」。六月九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集在京的外國各大通訊社、報社、電台的記者，舉行新聞發布會，說明王丹涉嫌擾亂社會秩序，正在審查，還給他們放了關於王丹生活情況的三分鐘的錄像帶。據看過錄像帶的記者向我描述，畫面顯示是在一個大房間裏，有一張牀，一張大桌子，王丹坐在桌子旁吃飯，桌上擺滿了飯菜，但卻不見筷子移動。旁白：問：「王丹，你吃的什麼飯？」答：

歲月蒼蒼

「什麼都有，雞、鴨、魚、肉！」嗓音很尖，不像他本人的聲音，像是配音。只有這一個畫面，旁白很長，說明王丹自五月二十四日起就開始進食。記者們懷疑，畫面是偷拍的。畫面沒有標明王丹吃這桌「雞鴨魚肉」的時間。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王丹如官方所說，已於二十四日進食，在當時國際輿論反映強烈、家長緊緊追問的情況下，不放這一錄像，卻在十八天之後方予公布呢？新聞發布會，發布的是新聞還是舊聞？政府心中很清楚。

爭取讀書權

家人惦念着王丹絕食後的身體健康，更惦念他再次被捕，在精神上能否承受得住這突然襲來的災禍。我瞭解兒子，假若身旁有書讀，他會免去許多精神痛苦。在他看來，生活不論怎樣艱苦，他都不在乎，但不可一日沒有書讀。

六月初，他獲准給家人寫來一張字條，以免我們掛念。他抱怨沒有書讀，不能看報。生活的枯燥，可想而知，只能以「暫時休息一下眼睛」來聊以自慰，寬慰家人。

我給他寫了一個回條，託警察帶去。希望他「好好吃飯，生活起居要有規律」，「身體健康是我們全家和親戚、朋友最大的願望」。我還特別叮囑他：

歲月蒼蒼

「我們都主張寬容，希望你在那裏也能以這種精神同有關方面相處，盡可能地不使矛盾激化，使事情朝着和緩的方向進行。」

事實證明，我們這種善良的願望和政府當局的嚴酷，是多麼不協調。

要為兒子爭取讀書權。六月六日，我再次給北京市公安局寫信，要求允許我們給王丹送幾本書去。信發出後沒有回音。十四日，我們又委託我們居住地的派出所代為催問，仍沒有回音。

六月二十一日，是兒子被捕一周月，思念孩子的心情，不能自己。我打點了幾本書和衣物，準備去闖闖。這一天下午，我和我先生兩人再次踏進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處的大門。接待我們的是那位抄家時的為首者和一位年輕人。經過五月二十五日我倆在博物館的那次交鋒，這次見面，他客氣多了。

那一天，我心情很不好，話語也沉重。我開門見山說明來意：「我們等了一個月啦！至今還不見王丹回家。我們也不知道你們還打算把他關多久。我們寫信給公安局，要求允許我們給孩子送幾本書，至今不見答覆，今天貿然把書送來了！」

歲月蒼蒼

他仍然是舊調重彈，不回答我的問題，只說王丹情況一切正常，他很注意鍛練身體。對於他的問題，我們也在抓緊調查，有的問題查清楚了，有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他希望家長予以配合。他再次責怪我們，說是我們把王丹的事情搞得擴大化和複雜化了。我表示，這種說法我們不能接受。他說：「不接受可以駁回。」我又拋給他一句：「要說是事情已經擴大化和複雜化了，那也是你們政府造成的。」他立刻反駁道：「你說是我們政府造成的，我們也不能接受。」我無意同地爭辯，只求他將我們給王丹的書籍、衣物，盡快轉交給王丹，並讓王丹給我們開一收條來。他都一一答應。後來才知道，這些東西二十天之後才交給了王丹，自然，也沒給我們收條。

五十多天孩子沒有書報看，其精神之苦令人心痛。在這五十多天的日子裏，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伴他度過了這沙漠般的生活。後來他告訴我，這本書他讀了十八遍。該書是他五月二十一日那天從家被警察押走時，隨手拿來帶在身邊的。

孩子有書報看，我的心略微踏實了一點，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思念兒子的心情與日俱增。七月十日，我們再次給公安局寫信，要求准許我們定時給王丹送書、通信。信發

歲月蒼蒼

出後，不見回音。直到八月九日晚，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姓楊的人員來電話，說有事要找我，讓我次日上午九時在家等候。沒有說明事由。

究竟出了什麼事？我忐忑不安。諸多的磨難教會我，遇事要多從壞處着想，是要把王丹送往外地，還是有更壞的消息。家中只有我一個人，先生和女兒均出差在外。我給女婿去電話，讓他次日在辦公室，不要外出，一但有事，隨時通知他。一夜難眠，苦苦煎熬。第二天，是北京入夏以來少有的悶熱天氣，燥熱難耐，真是度時如年。

上午九時許，終於等來了公安人員。是禍也躲不過。我準備面對惡運。來了三個人，待他們坐定後，告訴我，王丹可以看書了，交給我一張王丹開列的索書單。原來如此！我久久懸着的一顆心一下子落了地。爲什麼前一日在電話中不說明呢？因爲事先沒有準備，匆忙中只找到了幾本他索要的書。

來人還表示，王丹以後再要書，由他們到家來取，就不勞我們往信訪處去送了。臨走還丟給我一句話，這件事就不要告訴別人啦！我說，「這很難，因爲關心王丹的人很多。」

允許王丹看書，家人能夠定期給王丹送書送報，令人稍

歲月蒼蒼

感欣慰：公安人員登門為王丹取書、取報，一反過去千呼萬喚不予理睬的常態。這一跡象，給外人一種幻想，大家猜想，是不是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後就放人。我則認為，此時，世婦會召開在即，政府也不過做做姿態，未敢領情。誰知事情比我想像的更糟糕。後來，我從整理王丹送還的書中，在一本書的騎縫中，他寫下了幾則日記，從日記中可知，八月九日，也就是公安局人員給我來電話的那一天，王丹向當局提交聲明，要求允許家人送書籍和衣物，否則，於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絕食。八月十日，公安局便通知王丹，已經同家人聯繫，很快會將書送來。翌日，王丹便收到了書籍和衣物。

任何權利都不能依靠恩賜。本來屬於王丹讀書看報的權利，也得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爭取。

悠悠兩地思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送來王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時間一晃三個月了，現在允許我寫封信。

我想你們是會為我着急的，這個也不必。根據我的分析，本來我想讓家裏再送些厚衣服來的，現在看來就不必送

歲月蒼蒼

了。任何過程都是有期限的，目前加之於我的對待也不會例外。

寫這封信，是因為已經三個月了，怕你們着急，所以報個平安。再耐心等待一等，我想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還是那句話：事情總的來看是比較樂觀的。當然，各種思想準備也應該有。

我匆匆寫了回信，託來人帶走。我告訴他：

你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今日送來。看了信，我們也稍微放了點心，但願情況能如你估計的那樣！自從能給你送書，我們心裏也覺得踏實多了。趁此機會好好讀些書。

我們身體也都還好，各人工作都較忙。當然，工作之餘，最大的心思就是你的處境，前途，時時牽掛。

小天天幼兒園放假，我們輪流在家看他。前幾天他忽然問：舅舅到哪裏去了？怎麼還不回來？我今天做夢舅舅回來了！但願這是好徵兆。

後來，我從王丹的日記中方知道，官方允許他寫這封信，並不是爲了讓他向家中「報個平安」，而是讓他向外界傳遞一個「快要放人」的信息。他將信寫好交給當局，不合其意，又讓他重寫這封信，特意讓他寫明「不必送厚衣服了」，以突出「快要放人」了。

歲月蒼蒼

一九九五年九月末，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結束。壓在我心頭的一片烏雲隨之飄去。大家都認為政府應該放人了，再關下去確實沒什麼道理。不知是當局有意欺騙，還是中途改變了主意，放人一事，渺無消息。

十月十二日，公安局送來王丹十月三日的信，寫道：

上回信中提及「不必送厚衣服」一語，現在看來未能實現。此事情況複雜，一言難盡。我極為生氣而又無可奈何，不說也罷。但從整體情況來看，我仍然持謹慎的樂觀態度。

寫信給你們，是想告訴你們，現在經我爭取，有些問題上的待遇有所改善，從現在開始，可以每半個月與你們通一次信，這就是第一封，請你們及時回信，通信內容的限制條件不必太苛刻。

關於我的前景，我還是那句話，不必太着急，……何況這種事情對我、對你們來說都不是太意外的事，早就應該有心理準備，我是求仁得仁，心裏很坦然。你們也應該理解我，支持我。支持我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們要想開一些，想遠一些。我的問題遲早得解決，這裏面內部、外部因素都會起作用，家人的努力也會如此。還是應本着法制的原則，有理、有利、有節地爭取向好的方向發展。

我在這裏一直認真讀書。過去許先生（許良英先生——

歲月蒼蒼

作者)批評我讀書不求甚解，太快，現在環境教會了我什麼是仔細讀書，這也算是一個收穫吧，許先生若知道了也會欣慰的。近三年來，我的心態仍有浮躁的老毛病，藉此機會沉一沉也是好事。很多問題我也需要反思。

我回信告訴他：

世婦會後，我和家人天天盼你歸來，認為再不放人，確實沒什麼理由。各方面的朋友也來電話詢問，他們也是這樣認為的。看到你的信，方知事情並非外人所料。看來，目前這種焦灼、等待、無奈的日子還要延續下去。這種日子對我們來說雖然不是第一次，但我總覺得這是不應該再有的日子。

從來信中知你能夠坦然、理智地對待目前的處境，能夠靜下來讀些書，只要光陰不虛度，我們也就放心了。全家和朋友們最關心的是你的健康，一定要鍛煉好身體。

我們多次口頭和書面要求探視，至今沒有得到任何答覆，我們還會繼續爭取。作為家長，能做的工作，我們都還會繼續做。效果如何，你也可以想像。我深深感到，就是爭取自己的一點點權利，也是一個很苦的過程。沒人理睬，不予答覆。

不論前途如何，目前能夠通「信」，儘管這種「信」既

歲月蒼蒼

不能郵寄，也無寫信人的地址，只能通過公安局傳遞，交流思想、感情的自由度很小。但是，我們通過每月一次（說是半個月可寫一信，來回傳遞，耗費時日）的「書信」往還，互問寒暖，相互勉勵，在字裏行間寄托思念。

從兒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情緒是穩定的，思想是向上的。但是，從他寄出的幾首詩中，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有時感到孤寂。

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一首詩中寫道：

寒月一鳶橫，孤心兩地思。

土風吹不散，屢屢入新詩。

他有時也為自己的處境感到冤屈。

京郊二度作南冠，抱膝冷吟意闌珊。

林公「苟利」何時語，曾帥「學術」幾代傳。

揮灑尺寸騰雲霧，輾轉心胸起蓬帆。

忍將春秋成弓箭，射落星雨話方圓。

孩子身居斗室，遠離親人和朋友，滿腹情懷無處傾訴，只有把憤懣、思念、沉重、無奈和對理想的追求，傾注在短短「書信」的字裏行間和詩句中。

歲月蒼蒼

相互慰勉

一九九五年，是幾十年難逢的雙中秋節。在這萬家團圓的節日裏，在皎潔的月光下，我思念着不知身處何方的兒子。我們這個家，以往由於我倆工作繁忙和孩子們住校讀書，中秋節不能團圓是常事。但此刻的心情卻同往年不同，心中湧起幾分淒涼。我在信中說：

今年是多年難逢的雙中秋節，沒想到兩個中秋節我們家的月亮都不圓！這只能留下歷史的遺憾！

王丹在回信中，多方勸慰：

難得的雙中秋節沒有在家裏過，的確是「歷史的遺憾」。不過，歷史上留下了數不清的遺憾，歲月流逝，回過頭看也很淡然。生活中有這樣那樣的起伏與苦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大家都是「知天命，盡人事」而已；何況我的處境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多「比下」心裏會好受一些，陰鬱的日子也有它的好處，在這種日子裏，寒冷的固然會更寒冷，而溫暖的也會使人倍感溫暖。千萬不要怨天尤人，自己折磨自己。樂觀的期待與爭取方是真正的勇氣。勸慰的話不必多說，我希望引家人的堅強為驕傲。

我們最擔心的是他的健康。從來信中得知，他生活中絕

歲月蒼蒼

大多數時間被囚禁在室內，每天只有一個小時的「放風」時間，有一段時間，只能在一間較大一點的有陽光的房子裏「放風」。王丹向家中要衛生香，說他的臥室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子。雖然日夜開着電風扇，也無法驅趕掉房中的臭味。

看到這番話，我很生氣，也很擔憂。如今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在這文明的時代，竟然還讓人住沒有窗戶的房子，難道又倒退到原始的「半坡時代」（西安半坡村原始部落群居住遺地）！這不是有意的摧殘，還能怎麼解釋呢？！

後來我又知道，在王丹的囚室裏，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兩個武警「陪伴」着他，夜間燈火通明。顯然是想在精神上摧垮他。

王丹的精神不會被摧垮，這一點我們並不擔心。他有理想，有追求，他的內心世界是坦然的。在他看來：

不管冬天多麼漫長，畢竟會變換成春天，在這四季更迭中，還是姐說得對，保持一顆平常心很重要。在我看來，生活無非有兩種：更好的生活和現實的生活，無論哪一種都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四處奔波是生活，獨處困頓也是生活；四世同堂是生活，各奔東西也是生活；自由是生活，不自由也是一種生活。沒有理由說哪一種生活會毫無意義。所以我

歲月蒼蒼

把我的現實也當作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來體驗。我的信條是：當然應該無畏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同時也要坦然地接受現實的生活。我現在失去自由，當然是壞事，但只要我充分利用它，也會有所收穫，這又是好事。好壞相抵，剩下的就是不好不壞的內心平靜，這一點比什麼都寶貴。

身處如此逆境，兒子能夠淡然以對。他努力營造自己內心的自由世界。讀書，思索，可使他的思想自由馳騁，就是一張小小的風景畫片，也能成爲他「精神自由」的媒介。他把一張《黃果樹瀑布》的彩照貼在牆上，每天讀書累了看一看，「每每心曠神怡，內心世界也清朗明淨了許多」。

讀書，是王丹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他的最大樂趣，獲准可以送書後，我們陸續送去了許多書，在他看來，「書中另有一個世界」，他認爲自己是學生出身，「理應保持本色，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爲理想的角色定位，這就需要多讀書。」他把一九九六年定爲「王丹讀書年」。

我怕他貪於讀書，忽略身體鍛煉，時常提醒他注意保護眼睛，以身體健康爲第一，來日方長，讀書的時間還多着呢，不在乎目前的一朝一夕。我也告誡他，讀書要求精，不要求快，每讀一本，都力求有所收穫。

在那段時間裏，唯一令他不安的是，時時惦念着我，擔

歲月蒼蒼

心我的忍耐力。勸我達觀些，保重身體，使他免於「後院起火的境況」。他每封信，都不厭其煩地說些勸慰的話，勸我們要堅強：「社會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咱們也沒有理由說非得厄運都落在別人的頭上」。「你們的堅強和努力，本身就是為社會進步作貢獻」。他建議我讀一讀《漢書·范滂傳》，「看看范滂的母親是如何看待逆境與厄運的。我希望媽能作現代的范母」。

法律何在

王丹被秘密轉移後，我們向公安局再三追問王丹究竟犯了什麼罪，辦案人員脫口而出：「他不是兩個呼籲書上簽名嗎！」

公民上書，古已有之。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先生北上天津，上書直隸總督李鴻章，要求清朝廷施行改革；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在北京發動一千多名來京應試的舉人，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均未遭囚禁。當今向人民許諾了法制與民主的政府，竟然視公民上書為犯罪，繩之以法，想來令人痛心。

我們多次信訪，欲瞭解對王丹的「審查」是依據的什麼法律程序？是什麼性質的審查？得到的回答是：審查就是審

歲月蒼蒼

查。從此，「審查」便綿綿無期，家人天天在等待、焦灼、無奈中度日。

我們想到了法律。我們想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王丹和家人的權利。爲此，我們奔走！我們呼號！

我們來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處上訪，狀告北京市公安局，對王丹「審查」歷時十個月仍無結果；迄今公安部門沒有向家屬交待對王丹履行的是哪一種法律程序？我們要求司法部門盡快給予答覆。據說，北京市公安局對王丹執行的是「監視居住」（未通知家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監視居住由當地派出所執行。當事人住在家中，有相當的自由。而對王丹進行秘密囚禁，連家屬也不知人在何處；更有甚者，他已失去全部自由，我們要求司法部門調查公安局的違法行爲。

一九九六年六月，王丹被囚禁已一年又一個月，仍無結果，家屬和關心他的朋友們都很着急。我們想到了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給薛駒主任寫信，希望他從法律的角度過問一下王丹被囚禁一事。信中寫道：

迄今，王丹被單獨囚禁已一年零一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多次向北京市公安局詢問：王丹究竟犯了什麼罪？究竟是按哪一種法律程序辦的？至今沒有得到答覆。我們也

歲月蒼蒼

多次問過，目前對王丹進行的審查，是什麼性質的審查。市公安局的口頭答覆是：「審查就是審查」。……作為執法機關的公安部門，不按照法律程序辦事，長期把人單獨囚禁，根據的是哪一條法律？我們多次要求正常探視，都以「審查期間不能探視」為由予以拒絕。……希望您能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督促有關部門，糾正違法行爲，並依照法律，盡快解決王丹問題，恢復他的自由。

我們寫信給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提出類似的要求。

呼喚法律，均無回應。我們仍在等待中倍受煎熬。

時間越久，越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政府的沉默，預示着吉少凶多。

王丹信中不經意的一句話或一個字，都會令我怦然心動。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的信中，末尾寫着「遙祝平安」，查遍過去所有的來信，都沒有「遙」字，是不是孩子已經被送往外地，十分心急。不久，一位朋友告訴我，據可靠消息，王丹被判三年勞動教養，已經送往黑龍江雙河農場。聯想到來信中的「遙祝」，更使我不安。

七月流火，心情焦躁，總覺得氣氛不妙。不久前，市公安局一處將以往所有送給王丹物品的清單一並送回；七月份整整一個月，公安「便衣」在我家監視；久久沒接兒子來

歲月蒼蒼

信；風傳王丹即將被判刑。凡此種種，令人坐臥不安。

我寫信給中共北京市政法委書記，要求就王丹是否已去東北勞改予以證實。未予回答。我又找到市公安局，詢問是否確有此事。他們肯定沒有此事。我稍稍放了點心。

八月二十八日，王丹在信中要求我年內不要再出差，「不要搞得臨時匆匆忙忙」。他表示，他倒要睜眼看看，他的問題怎麼解決，並「決心在以後的人生路程的一段時間內，利用機會，變壞事為好事」。

不管你情願與否，王丹和家人必須做好迎接暴風雨的心理準備。

我們都在拭目以待。

第六章

秋風蕭蕭



歲月蒼蒼

匆匆回京

一九九六年八月，風聲雨聲，聲聲震動着作母親的心。

九月初，我因公出差。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去內蒙古的旅程。工作之餘，時時惦念着北京的兒子。

在內蒙古參觀訪問時，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難忘。我們一行前往位於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途經東勝時，下車參觀鄂爾多斯博物館。博物館的兩位工作人員聽說來人中有王丹的媽媽，特地來看望我，熱情地詢問王丹的情況。我十分感動：「你們也知道王丹！」她們說：「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鬧學潮時，我們天天看電視，王丹同李鵬對話的情景，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六·四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這裏是內蒙古邊遠的一角，七年過去了，「六·四」依然在她們心中留下陰影。

九月二十二日我回到北京，按照兒子的請求，年內不再打算外出，因為他認為他的問題不可能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懸案」，以免臨時匆匆忙忙。但我卻身不由己。家中來電話，告以老母親病重，催我速速回家。我未來得及休息，急忙為王丹打點衣物、書籍，稍作安頓，便匆匆返里。

老母親左臂摔傷，見我到來，老淚縱橫。舉目四望，家

歲月蒼蒼

中一片淒涼。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大部份心血都傾注在兒子身上，陪他坐牢，爲他奔走，心力交瘁，盡到了作母親的心。但是，在八十多歲老父、老母身邊，卻沒有盡到作女兒的心。見此情景，我橫下一條心，留在父母身前，以慰老人。

由於我的到來和精心照料，母親的病情和精神都很快好轉。我的心情也輕鬆了許多。丹兒的事情暫時置之度外。

不料，正當我一心一意侍奉老人時，十月五日，北京家中來電話，說近兩天海外記者紛紛來電話，聽說王丹已被北京市的司法機關起訴，詢問家人是否知道此事。讓我盡快回北京，應付一切。

十七個月來，每時每刻都在苦苦期待，心情十分複雜，期待兒子歸來，但又害怕期待來的是兇險的結局。如今，不願意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雖然是媒體的傳言，但也不會空穴來風。

果真災禍降臨，也只有接受它，安然處之。最終還是應了王丹的話，「臨時搞得匆匆忙忙」。我決定立刻買車票回北京。

十月初，已近深秋。這一天，秋雨綿綿。我的心緒也像這場秋雨一樣，綿綿不盡，淒苦異常。父母還算通情達理，

歲月蒼蒼

催促我盡快回去。

可憐病中的老母親，外孫被秘密關押的事，不能不告訴她，又不能以實情相告。只對她講：小丹在政府那裏，不能回家，吃、住都還不差。這次叫我回去，可能就是交涉放他回家的事。王丹被起訴，可能即將判刑入獄的事，無論如何不能對她講，傷害老人的心。她只有這麼一個外孫。一九九四年，為躲避「六·四」敏感時期，王丹主動離京，前往姥姥家。姥姥對他關愛備至。從此以後，直至去世，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寶貝外孫。母親在彌留之際，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北京來信了沒有？」心中仍然惦念着外孫。

十月六日，冒着霏霏秋雨，我乘坐長途汽車，踏上回北京之路，身後留下一片對父母親的歉疚。

一路心緒飄忽，等待着我的，將是又一場苦難。

迎接風雨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晨到達北京。家中一整天電話鈴聲響個不停，向我們傳遞着各種信息。有人說，七日這一天，北京市法院要送文件來。等了一天，沒見動靜。

回到家千頭萬緒。首先想到的是身陷囚室的兒子。他知道暴風雨即將來臨嗎？他能從容面對這嚴酷的現實嗎？想到

歲月蒼蒼

冬天即將來臨，如果真的被起訴，不知何時才能再給他送衣服。

我顧不得一路風塵，稍事休息，便匆匆打點衣物，依照原來送物的渠道給他送去。我特地給他送了一件大紅毛衣。紅色，象徵着光明和正義。一旦走上法庭，我願兒子穿着這件鮮艷似火的毛衣，紅光四射；同時，我給他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告訴他，冬天即將來臨，不論出現什麼不測，都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想到的第二件事就是請律師。王丹被秘密囚禁一年之後，有朋友提醒我們要做最壞的準備，先找一找律師，免得到時候為難。只因為我東奔西走，工作繁忙；同時，對政府多少還存有一點幻想，總覺得還不至於判刑。所以，一直沒有同律師事務所聯繫。如今，即然政府已經撕下了承諾法制與民主的假面具，請律師已事不宜遲。十月八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經朋友介紹，我們準備去拜訪一位法律界的老前輩。我們明白，王丹一案是政治案件，為這樣的案件作辯護，沒有一點勇氣是不敢承擔的。因此，請律師有相當大的難度。

約好晚上我們去那位老前輩家。不料，那天下午我發現樓下的公安「便衣」突然加多。為了試探他們是否跟蹤我，

歲月蒼蒼

便佯裝去買東西。我一出動，果然，汽車、摩托車和步行「便衣」緊緊相隨。我帶着一隊「便衣」不便登門，只好由我先生和朋友一同前往。那位老先生十分熱情，對王丹的處境也極為關注。他表示，若不是擔任一定的政府職務，願意親自為王丹辯護。他推薦北京大學法律系的一位教授。楊教授慨然應允，說：「王丹是北大學生，我義不容辭。」帶回來的這一消息令我欣慰。

正當我們一家惶惶不安時，忽然傳來劉曉波被捕的消息。我回到北京那一天，曉波來電話，詢問王丹被起訴事。他是一九九五年五月早王丹幾天被捕的，秘密囚禁八個月之後，大約於一九九六年春節前後被釋放。十月八日即傳來他再次被捕的消息，同時被抄了家。九日早晨，路透社一位記者告訴我，劉曉波已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我簡直不敢相信，懷疑自己聽錯了。決定一個人命運的大事，竟然如此草草了之。判決之速，恐怕開創法律史之先河。

隨後又聽說，早些時候，原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李海，以「洩露國家機密罪」開庭審理，至今沒有宣判。他於一九九五年五月晚王丹幾天被捕後秘密關押。

又聽說，原北京大學學生郭海峰再次被捕，已判刑七年。

歲月蒼蒼

一連串的消息，猶如滾滾寒流，不斷襲來，令人不寒而慄。我預感到，更大的風暴將會降臨我們這個家庭。

咄咄逼人

十月十日，我們都沒有上班。上午九時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來電話，要求我務於當日上午十時到法院去一趟。時間緊迫，沒有多想。放下電話，我便同我先生匆匆出門，前往位於北京西郊八寶山地區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來到東門，那人已在門口等候。我們隨他來到大樓內的一間房內，一位姓王的人員接待了我們。

坐定後，他開門見山對我們說：「王丹委託你們爲他請律師。」聽此話，知道王丹的案子已經轉到法院。顯然，兒子已被正式逮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正式逮捕後，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其家屬，說明因什麼罪被捕，現羈押在何處。一種被欺騙的感覺油然而升，我非常生氣，打斷他的話質問：「王丹被逮捕爲什麼不通知家屬？如今案子已經轉到法院，我們還被蒙在鼓裏。這樣做是違法的！」那位姓王的人員聽完我的話，愣了一會，說：「那是公安局的事，我們今天只談請律師。」

法院要求我們務必於十一日上午請到律師。我們非常着

歲月蒼蒼

急，我氣憤地說：「我們今日才知道王丹被捕，事先沒有準備。你們也知道，像王丹這樣的案子，請律師難度很大。」他漫不經心地說：「大街上的律師有的是。」聽此言，已知無理可講，便問他：「如果我們明天上午請不到律師怎麼辦？」他稍稍寬容了一點，限我們在十一日下午五時下班前，請到或請不到，都要通知他們。

他又拿出一個紙條，對我說：「王丹委託你作他的辯護人，你同意嗎？」我毫無猶豫，便表示同意。我不是學法律的，辯護人是怎麼回事，應該怎樣辯護，一無所知。但有一點我卻很明白，只要是爲了我的兒子，縱是刀山火海也得闖。

走出法院大門，四顧茫茫。請律師雖事先有所準備，但卻沒料到事情來的這麼快，又這麼急。楊律師雖答應接此案，還沒來得及見一面，萬一他手頭有沒辦完的案子或出差在外，如何是好。再另請律師萬萬來不及。恍恍惚惚回到家中。

到家不到五分鐘，適逢路透社記者來電話，詢問有無進展。我將法院限我們在一天之內請到律師一事以實相告。消息很快傳了出去。大家感到愕然，法院竟讓人家一天之內請到律師，真是匪夷所思。顯然，是有意刁難。記者們不斷電

歲月蒼蒼

話詢問請到律師沒有，朋友們也通過各種渠道相助。大家都爲我們懸着一顆心。

有位記者問我：「如果明天請不到律師，你們怎麼辦？」我毅然決然表示：「如果請不到律師，我就走上法庭，爲兒子辯護！」說這番話，並不是一時激憤，而是別無選擇。當晚，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廣播，報道王丹家屬爲其請律師，有一句話：「王丹的母親王凌雲表示，如果明天請不到律師，她將上法庭爲兒子辯護。」言詞悲壯，聽着播音員沉重的語調，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如今寫來，還令人感到悲愴。

我無意做事，無心進餐，呆坐家中。一九九一年，我爲王丹請律師，在寒夜中奔波，深夜站在人民大學律師事務所領導人的家門前，苦苦懇求被拒之門外的情景，一幕幕在腦海中閃動。

電話鈴聲將我從那段痛苦的回憶中驚醒，是我先生打來的。從法院回來後，他立即趕往北大，設法同楊律師聯繫。一直等到晚上很晚，才見到律師，律師答應立刻接王丹一案。放下電話，我懸着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

十一日上午，我們來到北京大學，同楊律師辦理了委託手續，並通知了法院。我準備交訴訟費，楊律師說，他已同

歲月蒼蒼

天元律師事務所商定，對我們免收訴訟費。爲王丹辯護，已擔風險，今又免收費用，我們深受感動。

下午一時，我們同律師一同來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接待我們的人員讓我辦理辯護人手續。我在王丹寫的委託書上簽字。看着孩子的筆跡，心頭湧起一種難以言狀的苦滋味。接待人員平和地向我介紹關於辯護人的有關規定：可以會見被告人，可以了解案情，但不能查閱被告人的檔案材料。他還大略地向我介紹了王丹的所謂案情，然後交給我一份北京市檢察院分院對王丹的起訴書。

接過起訴書，我們便告退，急急離開法院，手中的起訴書，格外沉重。邁出大門，我急忙打開起訴書，「陰謀顛覆政府」幾個大字赫然橫在眼前，我只感覺身體晃動，腦子裏一片空白。我明白，對政治犯而言，這是最高最重的定罪，刑期要在十年以上。

仰望蒼天，欲哭無淚。

欲加之罪

俗話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通讀這份起訴書，可謂欲加之罪，確患無詞。因而，它就顯得更加荒唐，更加虛弱。

歲月蒼蒼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的起訴書，對王丹的指控分三大部分。

王丹被指控「陰謀顛覆政府罪」的第一部份是：「煽動動亂，為推翻國家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製造輿論」，所列舉的全部所謂「犯罪事實」僅僅是在境外發表的三十餘篇文章，而他們認為足以「煽動動亂」和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製造輿論」的也僅僅是從三十餘篇文章中摘錄出來的四句話，即：「四項基本原則」像個紙馬，一戳就倒；在當今的大陸，當局對人民實行新聞封鎖；言論自由成為憲法上的一紙空文；「迷惘的一代」領導人領導的「迷惘的黨」。這四句話分別被上綱為「攻擊」、「污蔑」和「誹謗」。

王丹被指控的第二部份是：「與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實施了陰謀顛覆政府的犯罪行為」。關於這一行為的「犯罪事實」，起訴書鄭重其是地列舉了如下事實：出任王軍濤在美國成立的中國研究所理事；同胡平「研究所謂鬥爭策略，策劃要在中國建設一支反對派的力量」；接受在美國的「大洛杉磯民主中國陣線」的自學計劃；向「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沈彤申請經費。僅此而已。人們不禁要問，出任理事，參加函授，同胡平遠隔重洋的對話，是怎麼樣「實施陰謀顛覆」政府的。為了羅織罪名，把沒有成為事實的也列為「犯

歲月蒼蒼

罪事實」，王丹爲了出版《八九民運百人談》一書，曾經向沈彤申請經費，未果。

王丹被指控的第三部份是：「積極網羅國內反動勢力，爲陰謀顛覆政府做組織準備」。起訴書所列舉的「犯罪事實」有：起草呼籲書，同魏京生「預謀將國內的非法組織聯合起來」，設立互助捐款。

起訴書認爲，「以上事實，有物證、書證、證人證言及刑事科學技術鑒定結論等證據在案證實，事實清楚、充分，足以認定」。所列事實有物證、證人證言及科學技術鑒定，這都自不待言，因爲王丹的所言所行都是公開的，自然「事實清楚」，但卻不能認定爲「犯罪事實」，這一點，檢察院應該是清楚的，「足以認定」的武斷結論，只不過是「氣壯如牛」而已。

讀着這份起訴書，越看越像三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時兩派對陣時的大字報，無限上綱，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甚至無中生有，「帽子」和結論聳人聽聞，接受柏克萊大學函授，竟是同境外敵對組織相勾結，不知這所大學的校長作何感想！純屬人道主義的互助捐款，竟是網羅反動勢力。羅織罪名到如此程度，令人震驚。

在氣憤之餘，我也感到寬慰。原來，他們其勢洶洶，

歲月蒼蒼

「審查」了十七個月，也不過如此。孩子的所言所行，都光明磊落。我心裏反倒踏實了許多。

我將起訴書的簡要內容轉告許良英先生，聽後，他氣憤地說：比我想像的還荒唐。

嘔心瀝血寫辯詞

拿到起訴書後，我便着手撰寫辯護詞。

有人問我，你沒學過法律，怎麼敢於接受辯護人的工作？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我是王丹的母親。母親呵護孩子，這是天職。

但是，我畢竟沒有學過法律，法律常識也很淺薄。怎樣運用法律為兒子辯護，對我來說，的確很困難。我找來幾本法律書籍，但時間緊迫，不容我仔細閱讀，慢慢領會。我向律師請教。他教我反覆閱讀起訴書，針對其所列舉的「犯罪事實」，盡可能的搜集足以辯駁的證據，然後對照法律條文，逐一進行辯護。我利用一切機會，同王丹的朋友交談，聽取他們的意見。

起訴書指控王丹「為陰謀顛覆政府」製造輿論。為了全面瞭解王丹的言論和政治觀點，我必須查閱王丹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在境外發表的三十餘篇文章。而他的這些文章，甚至

歲月蒼蒼

手稿，全部被公安機關抄走。我只好到散落在朋友們的手中去搜集。朋友們都熱情相助。王丹的文章多數送給許良英先生請他指教。我到他府上說明來意，他立即放下手頭的工作，四處搜尋，爲我提供了多篇文章。有位朋友聽說我在尋找王丹的文章，主動送上門來。危難之際，一絲友情都會變成力量。當然，也有個別往日的朋友將我家人拒之門外。有陽光就會有陰影，這不奇怪。

通讀王丹的文章，一個愛國青年拳拳報國之情躍然紙上。那樣坦誠，那麼執着。他在多篇文章中再三申明：「民主運動不是造反」，「民主運動不是反政府運動」，「維護人權不是顛覆政權」。他主張爭取民主運動應該是公開的、和平的、理性的，要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他明白無誤地表明，反對任何暴力行爲和秘密的地下組織。他在給全國人大的呼籲書中說，他的「行爲不是指向政府，而是針對具體問題」，其「最終目的是保持社會穩定，推進民主進程」。

王丹的所有言論，都是表達他的政治見解，都是按照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都沒有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政府的意思。

起訴書指控王丹「同境外的敵對勢力相勾結，實施了陰謀顛覆政府的犯罪行爲」和「積極網羅國內的反動勢力，爲

歲月蒼蒼



王丹接受記者採訪。(法新社)

陰謀顛覆政府做組織準備」，所列舉的「犯罪事實」，簡直不值一駁。我有一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起訴書高懸着一頂又一頂駭人聽聞的「大帽子」，卻拿不出一個有力的證據。

幾位當事人不顧政治高壓，寫來證明材料。王軍濤證明王丹在擔任他的研究所理事期間，沒有為該所做過任何事情，並要求出庭作證；一位受王丹及朋友們的「互助捐款」幫助過的政治犯家屬，證明幾百元捐款是幫助她的孩子讀

歲月蒼蒼

書，而非政治犯本人。對於這些證據，司法機關卻拒不考慮。

讀着王丹的文章，手捧着這少有但卻份量沉重的幾份證明，對照起訴書的指控，十分痛心。爲孩子痛心，也爲國家痛心。徹夜難眠。用心血和淚水寫成的這短短幾頁辯護詞，這凝聚着正義和良心的幾份證明，能把被顛倒了的黑白顛倒過來嗎？面對着如此強大的專政機器，我感到茫然。但我堅信，歷史是公正的，終會還王丹以清白。

母子相見

十月十四日上午，法院來電話，要我到法院去一趟，說是要找我談一談有關辯護的事。我如約來到法院，接待我的人員很和氣。問我對王丹的案情還有什麼問題，對起訴書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提到起訴書，就像提及一個無賴，氣憤、鄙夷、無奈，一齊湧上心頭，無法平靜。就起訴書對王丹的指控，一一進行駁斥，一口氣講了很長時間，好像面對的就是審判官。

他通知我：依據有關法律規定，親屬擔任辯護人，可以會見被告人，決定今天下午兩點鐘讓你到半步橋看守所會見王丹。

歲月蒼蒼

從法院歸來已近中午，匆匆吃完午飯，直奔位於北京西南部的半步橋看守所。來到西門外等候。高牆、鐵門、森嚴的警衛，這裏太熟悉了。五年前，在這裏我留下多少沉重的足跡。萬萬沒有料到，五年之後，我又來到這座大牆之外。

秋風吹着落葉，我坐在路旁的石階上，思緒萬千。我不能忘記，一九九〇年的寒冬臘月，第一次來到這裏會見孩子的情景。那一天，天空陰沉沉，我的心情更加陰鬱。就在這座高牆之內，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兒子。我們同孩子相對而坐，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本來就瘦弱的他，更加消瘦，那蒼白的面孔和像紙一樣慘白的雙手，深深印在我的心裏。在這一年的五月和十月，我又在這裏見過他。如今，再次在這裏同離家十七個月的兒子相見，不知他又是什麼樣子。

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走來，打斷了我痛楚的回憶。我隨他走進大鐵門，來到一間小小的辦公室。他再三向我交待：這次你是以辯護人的身分會見王丹，只談同辯護有關的事，案情以外的話不要多講。兩點十五分，王丹被帶進接待室。他臉色蒼白，戴着手銬，我一下子被驚呆了。王丹被戴手銬，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時感情上難以接受。大概他們看出了我的情緒，法院兩位工作人員趕忙向我解釋，說平時並不給王丹戴手銬，只是這裏是辦公地區，犯人離開看守所必

歲月蒼蒼

須戴手銬。王丹也安慰我，說戴一會手銬沒關係。

我同兒子在一張桌子兩邊相對而坐，彼此都不平靜。

自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王丹離家，我日夜企盼，盼望兒子早日回到我的身邊。不料今日我卻以辯護人的身分在看守所同孩子相見。我們有許多話要說。幾天來的怨與憤，真想在兒子面前宣洩，但卻不能。我努力克制自己，只告訴他，接到起訴書後，我很生氣。王丹勸我不要生氣，說：「看了起訴書之後，您更不要生氣了。我早就說過，我就是坐在家裏什麼事也不做，他們要整我也是一樣整。既然這樣，還有什麼氣可生呢！」

我對他講：「我打算把工作辭掉，天天爲你告狀。先告公安局，再告檢察院，一級一級往上告。」這雖是氣話，但我確有這樣的想法。王丹平靜地笑了笑，說：「媽！我勸您有告狀這功夫，還不如到公園去散散步。」看來，對這個政府，王丹看的比我透。

王丹很動情地對我說，他曾經對人說過，他是一個最孝順的兒子，也是一個最不孝的兒子。他要我無論如何都要好好活下去，這樣，他不論坐多少年的牢，心裏都會感到踏實。

我們說了許多互相安慰的話。一個小時很快過去了。看

歲月蒼蒼

着兒子離去的背影，心中一陣辛酸，不知身後還有多麼沉重的苦難在等待着他。

等待開庭的日子

王丹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被「正式」逮捕（王丹沒簽字，公安局亦未依法通知家屬），七日，北京市檢察院分院便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十日，法院通知家屬請律師，十一日，我同律師到法院辦理相關手續，當日，楊律師便開始查閱王丹的檔案材料，十二、十三兩日為雙休日，十四日，楊律師和我分別會見王丹，當日下午，北京市司法局召楊律師前去匯報辯護事宜。安排可謂緊鑼密鼓。各方人士都估計，不出三日必會開庭。豈料，一等就是半個月。

在等待開庭的日子裏，王丹的命運牽動着海內外許多人的心。

家人在惶惶不安中度日，朋友們在焦急地等待，幾個國家的司法界人士致函中國政府，要求出庭旁聽；最忙碌的還是海外媒體的記者，特別是香港的記者，我家的電話終日不斷，都怕錯過這個機會。

現將我在等待開庭的日子裏的幾頁日記抄錄於此，以作

歲月蒼蒼

見證。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陰

繼續撰寫辯護詞。得知×××昨晚八時被當地派出所帶走，至今未歸，心頭又像壓了一塊石頭，頓感氣氛緊張。記者紛紛來電話，詢問開庭日期。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陰

×××來電話，聽說我要做王丹的辯護人，正在撰寫辯護詞，特地向我提供兩點意見：一、胡平是一個多角度的人物，王丹同他交往，是崇拜他的自由主義，同民聯沒有必然的聯繫（指起訴書指控王丹「同前民聯主席胡平勾結」）；二、王丹有意做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去年簽名，有的呼籲書他就沒有簽名，說明王丹是想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十月十七日 星期四 小雨

陰沉的天氣，心情更爲抑鬱。德國電台一位記者來電話，說他們一大早就跑到八寶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口，等候開庭。美國有人來電話，說美法律界的幾位知名人士正在打算組成陪審團，申請來中國參加王丹一案的審理工作。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早起開窗，室外晴朗，少有的一片深秋景色。至今開庭仍無消息，想必箇中必有緣由。去上班，「便衣」跟蹤。

歲月蒼蒼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陰

何日開庭，孩子的命運如何，終日懸着一顆心，坐臥不安，寢食不寧。晚聽「美國之音」廣播，知香港各界舉行五百餘人的遊行，要求釋放王丹，香港同胞對王丹的關心和支持，令人感動。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據法新社報道，德國外長金克爾來華訪問，提到王丹一案，中國政府表示，王丹是一個普通罪犯。報道說，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預示着任何一個政府說情都沒有用。隨後，香港《東方日報》記者來電話，說香港人在傳，可能因法院抗訴，所以不開庭了。我說，在大陸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法律尚沒有獨立。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

下午去法院，通知我們下星期三，即十月三十日上午九時開庭。歸來適逢一位記者電話詢問開庭有無消息，便將開庭日期相告。至此，開庭日期總算明朗化了。有記者傳來消息，說美國、法國、加拿大、智利等國的法官已經組成代表團，要求到中國出庭旁聽王丹一案的審判。

稍稍平靜的心境又被打破。

歲月蒼蒼

開庭之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必須在開庭前三天將開庭日期通知律師及被告人。我作為王丹一案的辯護人，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接到通知。

王丹委託親屬作辯護，我想他並不是期望能打贏這場官司，而是吸取一九九一年第一次被審判時的教訓。那一次，家屬被排斥在外，以至於由政府一方指定律師。如今，我擔任辯護人，參與這場訴訟活動，便可爭取到一些法律許可的權利，諸如會見被告人、瞭解案情、提前獲知開庭日期等。這也是他趨於成熟、冷靜面對現實的表現。

法院向我宣布，對王丹一案的開庭審理是公開的，所以也向親屬開放。我當即向他提交了四個親屬出庭旁聽的名單，除王丹的父親和姐姐外，還有他的姐夫和表弟。結果，只允許他父親和姐姐出庭旁聽。

我將以母親和辯護人的雙重身分出現在法庭上，能不能保持理智和冷靜，是法院最不放心的。他們反覆向我說明：你的主要職責是辯護，一定不要出現過激言詞，不論出現什麼情況，都要保持冷靜。我從他的言談話語中領悟到，是怕我屆時大鬧法庭，以至出現不測。我表示：我會遵守法庭的

歲月蒼蒼

有關規定，這點你們可以放心，但是，一，公訴人首先應當理智，他若是言詞過激或出言不遜，我很難保持冷靜，要是出現什麼不測，責任不在於我；二，審判長必須公正，假若偏袒公訴人一方，我也難以理智。

公訴人言詞過激，審判長偏袒一方，都在意料之中，爲什麼單單要求我冷靜！這很不公平，我感到屈辱。本着同公、檢、法機關打交道，始終都要不卑不亢的原則，我冷冷地回敬了他，言詞強硬，不容置辯。

開庭的前一日，最爲忙碌的還是各家媒體。他們苦苦等待了十幾天，明天就要開庭，誰都怕錯過這個機會。記者來電話，詢問我出庭辯護準備好了沒有。他們也很想提前知道辯護詞的內容。英國廣播公司兩次來電話，問我明天出庭時穿什麼衣服，以便屆時確認，想拍家人幾個鏡頭。二十九日傍晚，英國 BBC 電台一位姓江的小伙子，從倫敦對我電話採訪。談話結束後，他很激動，哭着對我說：「明天王丹就要出庭受審了，我很難過。」我無言以對，放下電話，止不住淚水橫流。

香港同胞獲悉王丹將於三十日出庭受審，連續兩天舉行遊行，要求釋放王丹。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王丹一介書生，無一槍一卒，如何能夠顛覆擁有數百萬軍隊的政府。

歲月蒼蒼



一九九六年十月，香港「支聯會」發起的「要求釋放王丹」大遊行在風雨中進行。（明報資料室）

歲月蒼蒼

海內外的朋友們，密切關注着王丹的命運。在開庭的前兩天，紛紛來電話，安慰我，鼓勵我。「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多次來電話，極為關注。北京的一位朋友在電話中特地叮囑我，出庭辯護時，要衣着整齊，態度泰然。要給政府看看，一位堅強的母親是什麼樣！還送給我陳毅的兩句詩：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人們的關心、同情和支持，給我們全家很大的安慰和力量。

一九九五年五月，王丹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秘密囚禁後，陳香梅女士在北京的一番話，我始終不能忘懷。她稱讚王丹是一個有骨氣的青年，說：王丹自願留在國內，滿腔熱情地希望同政府一道，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假若連這樣一個年輕人都容不下，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大意如此）！如今，當她得知王丹將被判以重刑後，不知作何感想。

我也想了很多。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多少仁人志士，爲了反對專制，追求自由、民主，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當今，在聲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裏，志士仁人追求民主、自由，仍然要付出青春年華，甚至生命。我感嘆，中國兩千年封建專制的歷史太沉重，以至前進的車輪如此緩慢。

歲月蒼蒼

我心力交瘁，開庭的前一天晚上，終於病倒了。

蕭瑟秋風今又是

多日的奔走、煎熬，體力終於難以支持。開庭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感覺周身寒冷，體溫表顯示攝氏三十八度六。最怕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昏昏然中，我彷彿看到，在法庭上因為我的缺席，兒子那副失望、痛苦的神情。我最清楚，有我坐在辯護席上，對他在精神上有多麼重要。一個信念在我腦海中盤旋：絕對不能倒下。

在高燒中苦苦掙扎，祈求上天保佑。可能是我們這一家人的苦難感動了上蒼，後半夜，高燒慢慢退去。第二天，我強打精神起牀，沒吃早飯，便同先生和女兒匆匆上路，前往法院。

我們剛剛走出院門，猛然間，從停在大門對面的一輛汽車裏跳出一位金髮女郎，接着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攝影師，此人我們見過面，知道是美國 CNN 廣播公司的。他們迅速攝下了我們一家三人走出家門的鏡頭。公安人員猝不及防。我們走不多遠，便遇上一群香港的記者，他們在胡同裏等候已久。我們在記者朋友和公安人員的簇擁下緩緩前行。香港諸多記者隨我們乘電車，轉地鐵，一路來到八寶山地鐵站。

歲月蒼蒼



王丹的父母和姐姐（右一）在前往聽審途中（一九九六年十月）。
（明報資料室）

沒有受到阻攔，他們很得意。

記者問得最多的是此去法院有什麼感覺？王丹一旦被判刑，你們打算怎麼辦？我們對記者說，王丹沒有罪，一旦被判刑，我們將為他上訴；我們還表示，我們準備迎接苦難，承受苦難。

十月的深秋，北風搖着落葉，這一天格外寒冷。踏着無邊的落葉，淒苦的心情更覺蒼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也是這樣一個深秋，兒子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了一年又五個月之

歲月蒼蒼

後，我們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發來的逮捕通知單，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爲此判刑四年。王丹等一批學生，因發動愛國學生運動而被判刑，人數之多，刑期之重，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也屬罕見。王丹在服刑三年零七個月後獲假釋，求學無門，工作無處，只好在家自學。僅僅因爲在境外發表文章和上書全國人大，呼籲維護人權，保障民主，便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再次接受審判。無疑，這將又是一樁大冤案。

我懷着沉重的心情，拖着病體，再一次走向法庭。

我們走出八寶山地鐵站出口，便有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在那裏等候。我們還沒來得及思考，便被迅速地接進一輛汽車內，衆多記者被擋在身後。後來聽說，他們只允許等候在地鐵站出口，不能越雷池一步。

從地鐵站到法院，相距不過三百米，竟然備車，想得何其周全。車迅速地從法院旁門開進法院內的一間招待所，兩位女工作人員守候在旁，寸步不離。我後悔當初不該隨他們上車，以至落入他們手中。從她們兩人的談話中我意識到，我們一家三人能否準時到來，對能否順利開庭至關重要。

我坐在車中雖然一晃而過，窗外的一片蕭瑟氣氛還是能夠感覺到。只見全副武裝的軍警，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路旁的小樹林也拉上了繩索。如臨大敵。

第七章

正氣凜然



歲月蒼蒼

申請迴避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我稱這一天是黑色的日子。

上午八時五十分，我們一家三人在兩位「陪同人員」的監護下，來到審判大廳。整個大廳寂靜異常，不像往日人來人往。看來今天只有王丹獨此一家。通往法庭的入口處戒備森嚴，我們經過此處時，都被用報警儀器周身搜索。來到二一二三號法庭，來賓已經坐滿，高高的審判台下，左右兩側的桌子上分別立着「辯護人席」和「公訴人席」兩個牌子。楊律師和公訴人已經入座。場內鴉雀無聲。

我徑直走上辯護人席，楊律師很客氣，執意要將首席坐位讓給我。公訴人席上坐着一男一女。我們咫尺相對，對方怒目而視。我一看便知來者不善。他們就是原告！我想起那份荒唐的起訴書，禁不住向對方投去一束鄙夷的目光。

環顧左右，只見旁聽席上只有二十四個座位。右邊三排十二個座席，前邊樹着一個「記者席」的大牌子。我特別注意到，十二位記者中，既沒有港台記者，更沒有外國記者；左邊三排十二個座席，兩位家屬及兩位「陪同」佔去四個，另有一個空位子，所謂各界代表，只有七人。既沒有王丹的親戚，也沒有王丹的朋友。這就是所謂的公開審判。

歲月蒼蒼

我坐在辯護人席上，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是憤慨，是戰鬥，還是驕傲，可謂百感交集。

九時整，書記員宣布開庭，全體起立，恭迎審判長、審判員入席。審判長率領兩名審判員在肅穆中走上審判席。他們身穿藍色法官制服，頭戴嵌有國徽的大沿帽，煞是威嚴。法官的形象應該是公正，這裏卻只有威嚴。審判長宣布王丹一案的合議庭組成人員及公訴人、辯護人名單。然後，高聲呼喊：帶被告人王丹！

兩個法警押着王丹應聲走來。我只見孩子昂首輕步，從容不迫，來到被告席上。這是我第二次親眼看着兒子走上法庭，接受審判。同樣是愛國有罪，同樣是冤案，六年之內，竟發生在同一個年僅二十餘歲的青年身上，難道歷史竟會如此健忘。痛楚的思緒被審判長的話音打斷。

審判長：「王丹，你有申請迴避的權利！」

王丹很快作出反映。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一張紙，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的有關規定，即審判人員本人與本案有利害關係的或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係，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當事人有權要求他們迴避。王丹提出：「依據這一法律規定，鑒於起訴書指控我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則本案受害人為中國政府；而北京市

歲月蒼蒼

中級人民法院屬於政府機構，該院工作人員皆係政府工作人員，因此，我認爲，由被害人或與被害人有隸屬關係的人充當審判人員，是有礙於法律的公正性和獨立辦案的原則的。由政府下屬機構來裁決涉及政府的案子，存在着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因素。因此，我申請屬於政府工作人員的審判人員迴避本案，由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審理，以維護法律的公正性。」

審判長不知是沒有聽清還是反映不敏，接着問了一句：「你要求誰迴避？」王丹一字一句地大聲說：「我要求公訴人，審判長，審判員全部迴避！」擲地有聲。審判長一怔。寂靜的法庭更加寂靜，一時間，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審判長和審判員稍稍交換了一下眼色，宣布：「經研究，我們認爲我們不屬政府工作人員，你的申請予以駁回。」她的聲音低沉，話語蒼白無力，全然失去了法官的威嚴。

王丹在道義上和心理上佔了上風。

法庭調查

審判長宣布進行法庭調查。

首先，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然後由審判長根據起訴書的指控，逐一向王丹出示所謂的書證、物證和證言。由王丹

歲月蒼蒼

——確認是否屬實。

法官不厭其煩地向王丹出示王丹發表的一篇又一篇文章的複印件，作為「顛覆政府」的所謂「物證」，律師忍無可忍，問王丹：「你寫這些文章的目的是為了顛覆政府嗎？」一語道破，觸動了公訴人的痛處。他立即提出抗議，認為律師有誘供嫌疑，蠻橫地要求審判長制止律師的發言。審判長認為，依據法律，律師可以發問。法庭調查繼續進行。

起訴書第三部份中的一段寫道：

被告人王丹於一九九四年五月至一九九五年五月間撰文散布：政府「把全國拉向了最終抉擇的關口」，「現在的中國猶如處在一座火山口上，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叫囂「現在已經到了把我們嘴裏說的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去的時候了」。

這一「罪狀」真可謂聳人聽聞，罪責嚴重。對這一罪狀進行調查時，法院出示的證據竟然是一封私人信件。這是王丹寫給朋友祝賀新年的一封信，他承認，這封信曾經寄給過五、六位朋友。

我問王丹：「這封信你發表過沒有？」他肯定地回答：「沒有發表過。」

這封信王丹無意發表，也沒有公開。公訴人對這一危言

歲月蒼蒼

聳聽的「罪狀」所提供的證據，卻是一封私人信件。文章和信件是有根本區別的，這一點，法官們應該明白。我不禁想起四十年前的胡風冤案，就是根據胡風的大量信件，羅織罪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牽連兩千多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大冤案。有幸的是，胡風冤案於八十年代得以平反。誰能料到，九十年代這樣的悲劇再次重演。

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法庭所出示的「證據」，大部分是文章的複印件，少部分是私人信件和王丹往日朋友的證言。這麼大的案件，始終沒有一個證人出庭。他們所謂的「顛覆政府」的「鐵證」，原來就是這薄薄的幾頁紙和無力的幾句話。沒有出示一槍一彈，更沒有拉出一兵一馬。

說起「顛覆政府」，我想起一個笑話，是王丹在錦州服刑時講給我們聽的，這裏不妨加一個小插曲。在開庭的當天（或許是前一天），當局向王丹出示傳喚他出庭的傳喚單，上邊寫的是王丹以「陰謀欺負政府罪」出庭。王丹看後哈哈大笑，說：「欺負政府」我認了，但「顛覆政府」我不承認。

法庭調查結束後，公訴人宣讀支持公訴的發言稿。發言稿仍然重複起訴書的陳詞濫調。發言強調指出：王丹的行爲已經構成「顛覆政府罪」，而且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發言還

歲月蒼蒼

煞有介事地分析了王丹「犯罪」的特點：一是利用每年的「六·四」搞活動，二是把突破口選擇在言論自由上，三是標榜維護人權，推進民主運動，這有很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言者一本正經，聽者忍俊不禁！這哪裏是莊嚴的法庭！簡直是三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我不明白，各位法律專家在《刑事訴訟法》中為什麼要訂一條支持公訴的發言。如此演雙簧似的支持發言，真不知意義何在。

自我辯護

王丹在法庭上進行了長達四十多分鐘的自我辯護。他認為，起訴書對他的指控，存在着「嚴重的事實不清，證據不確，定性不符的問題」，就八個方面的問題為自己進行了有力的辯護。

關於所謂言論問題，起訴書中所引用的言論，分別摘自他在境外發表的三十餘篇政治性的文章中，上綱為「煽動動亂，為推翻國家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製造輿論」的高度。王丹認為，這些言論「明顯屬於斷章取義」。他寫這些文章都是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並沒有提出讓人們「應該如何」，同「煽動動亂」完全是兩碼事；起訴書指控王丹「誣蔑」

歲月蒼蒼

「在今天的大陸，當局對人民實行新聞封鎖」、「言論自由成爲憲法上的一紙空文」。他認爲，這是如何界定「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我始終認爲沒有完全獨立的民辦報刊就談不上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據此我才認爲在今天的中國確實有新聞封鎖和言論自由成爲一紙空文的問題，這是基於與當局不同的觀點而得出的結論。」儘管這些看法同政府不同，但卻不是蓄意製造謊言，同「誣蔑」風馬牛不相及。王丹指出：「我認爲我的上述言論僅僅是政治觀點不同的問題，政府應充分保障公民的思想表達自由。」檢察院就王丹的言論卻無限上綱。王丹指出：「這種製造文字獄的做法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一九九五年，王丹同幾位朋友先後向政府發出《關於平反『六·四』的呼籲》、《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的建議》及《汲取血的教訓，推動民主與法制進程》等呼籲書。所有這些，涉及的都是人權問題或對政府的某一項政治決策提出自己的意見。王丹認爲，公民聯名向國家權力機關上書，這種形式本身並不違法。公民有公開表達自己的批評和意見的權利，這種權利本應受到憲法的保護，而起訴書卻認爲是一種「陰謀顛覆政府」的犯罪行爲，他很痛心地提醒政府，不應當忘記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教訓。

歲月蒼蒼

起訴書指控王丹同魏京生「預謀將國內的非法組織聯合起來」。王丹要求檢察院就這一問題拿出足夠的證據來。他質問公訴人：「你們說我與魏京生預謀將國內的非法組織聯合起來，那麼好，請你告訴我，你們所說的非法組織是什麼？它的名稱是什麼？它的成員有哪些？我與哪個非法組織或其他成員有聯繫？」「如果國內真有這樣的非法組織存在，以至於足以將其聯合起來，為什麼有關機關沒有將其取締，以至於我們居然還有時機去預謀聯合他們？」他指出，檢察院一方如果不能自圓其說，那便是無中生有，有意加害於他。

王丹還就出任王軍濤的中國研究所理事、所謂與「前民聯主席」胡平相勾結、「自學計劃」、互助捐款等問題，一一作了說明和辯護。

王丹最後指出：自他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被所謂「監視居住」以來，無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預審、偵察，還是北京市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都是先設立罪名，然後尋找證據。對他的起訴和指控，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還能談得上公正和客觀嗎？

在法庭上，王丹還控告北京市公安局在處理他的案件中的種種違法行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

歲月蒼蒼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而對於他，既不準確，也不及時。他說：「我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被監視居住後，對我的提審只進行到七月十一日，自那一天到今年十月三日，長達四百六十六天的時間從未提審過我，也從未與我提及案情。這麼長的時間對案情不聞不問，這分明是無理拖延。」

王丹還對公安局對他執行「監視居住」中的種種違法行為進行揭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關於監視居住有明確的規定，即由當地公安派出所執行或者由被告人的所在單位執行。北京市公安局公然無視法律，對他的監視居住既不由他所在的新街口派出所執行，也不委託他戶口所在地的街道居委會執行，而是市公安局一處、十三處、七處等單位聯合武警北京二總隊十五中隊執行。每天隨時有兩名武警在屋內看守，他不得出屋門，每天只有一個小時的放風時間，這完全是羈押行為。對於公安局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我曾六次被迫以絕食的方式抗議，但公安機關寧肯用灌食等粗暴方式也拒不對違法行為自行糾正」。

據王丹在法庭上介紹，法院要求他在法庭上不能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王丹通篇辯護只是就起訴書對他的指控，擺

歲月蒼蒼

事實，講道理，語言平和。儘管如此，他的發言還是多次被審判長打斷。

王丹爲自己辯護，鏗鏘有力，正義凜然。對於檢察院的指控，堅決不予承認，對起訴書表示強烈抗議。他向着威嚴的審判席宣告：「如果以這樣一份漏洞百出的材料來給我定罪判刑，無疑又製造一個天大的冤案。在人類文明即將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在中國一演再演。我呼籲政府不要再給歷史留下一道道傷口。」

為王丹辯護

經過法庭調查，聽了公訴人支持公訴的發言，又聽了王丹的自我辯護後，律師和我分別爲王丹進行了辯護。就起訴書所認定的「犯罪事實」，我們從法律和事實兩方面，逐條進行了辯駁。

第一，就王丹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以來所發表的文章，起訴書概括爲「攻擊」、「誣蔑」、「誹謗」和「煽動動亂，爲推翻國家政權製造輿論」。辯護人認爲，根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顛覆政府罪有其特定的涵義，即它是指陰謀顛覆人民政府，篡奪國家政權的行爲。由此可見，推翻國家政權，

歲月蒼蒼

篡奪國家政權，竊取國家領導權，都是屬於顛覆政府的犯罪行爲。而起訴書中對王丹在三十餘篇文章中「攻擊」、「誣蔑」、「誹謗」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在刑法中並沒有規定爲犯罪。因此，起訴書將這些行爲指控爲顛覆政府罪，是缺乏法律根據的。

辯護人還指出，製造輿論與實施顛覆的行爲，是兩個不容混淆的概念，將兩者混爲一談，是不正確的。以製造輿論爲根據，指控王丹顛覆政府，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因此，不能構成陰謀顛覆政府罪。

第二，起訴書指控王丹與境外的敵對勢力相勾結，實施了陰謀顛覆政府的犯罪行爲，認定這一罪狀的事實有三個：

一是指控王丹「出任王軍濤在美國成立的旨在陰謀顛覆中國政府的中國研究所的理事」。「出任理事」不能構成犯罪，問題是他在擔任理事期間，爲該研究所做了哪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事實，起訴書沒有拿出足夠的證明材料，所依據的只是從海外報紙上複印下來的一張名單。況且，據王丹講，他只是掛名。我在法庭上宣讀了王軍濤出具的證明材料（經法院審查，只許宣讀其中的一部份）。他證明王丹只是名譽理事，沒有爲該所做任何事情。我們認爲，起訴書的這一認定是牽強附會的。

歲月蒼蒼

第二個事實是指控王丹與境外的反動組織中國民聯原主席胡平相勾結，並與胡平研究鬥爭策略。王丹同胡平交往時，胡平已不代表民聯，起訴書仍用「原主席」，企圖將王丹同反動組織聯繫起來，其用意明眼人一看便知。王丹同胡平在四十分鐘的越洋電話中，研究了什麼樣的鬥爭策略，起訴書沒有拿出證據來。至於「建設一支反對派的力量」，只是屬於王丹的個人見解。他在對話中強調：他將「着力於社會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他個人「保持來自反對派的角色」，這裏沒有任何一點推翻當權派的意思。起訴書將此定為犯罪，是違背犯罪構成原理的。

第三個事實是指控王丹參與「自學計劃」和向沈彤申請經費，這些都同顛覆政府沒有絲毫關係。

第三，起訴書指控王丹積極網羅國內的反動勢力，為陰謀顛覆政府做組織準備。認定這一罪狀的事實是參與起草呼籲書，並在境外發表及同魏京生預謀將國內的非法組織聯合起來和互助捐款。所有這些，都同顛覆政府風馬牛不相及。

我最後說：「作為母親，我瞭解自己的孩子。他以一個年輕人的熱情，關心國家，推進民主，主觀上沒有顛覆政府的任何意向；作為辯護人，我認定我的兒子是無罪的。」我希望合議庭「能夠真正地獨立執法，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

歲月蒼蒼

為準繩，最後作出公正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

法庭辯論

無論是王丹的自我辯護，還是我們兩位辯護人的辯護，都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雄辯地說明，起訴書對王丹的指控，不能構成陰謀顛覆政府罪。王丹是無罪的。

辯護結束後，審判長宣布開始法庭辯論：整個審判過程，最精采的一幕便是這場辯論。

公訴人首先發言，針對辯護人的辯護，逐一予以反駁。聲稱：被告人王丹不具備陰謀顛覆政府罪不能成立。接着，他又重複起訴書中的那些爛言。我們要求他一一拿出證據來。他無證據可拿，便根據事實進行推理，無限上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理擾三分。所用語言，令人咋舌，同「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的語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公訴人說：王丹寫文章煽動動亂，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

王丹質問他：我的文章都是在海外發表，假若煽動動亂，也是煽動海外的動亂，你有什麼根據說我的文章危害了中國社會的安全？在國內在何時在何地因我的文章煽動了動亂？

歲月蒼蒼

公訴人理屈詞窮，紅着臉強辯，說：寫文章就是煽動！情急之下，把「動亂」二字也忘掉了。

起訴書的第三部分引用了王丹給朋友信中的一句話：「現在已經到了把我們嘴裏說的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去的時候了」。乍一聽，王丹真是向着政府「磨刀霍霍」了。王丹說，這句話完全是斷章取義，他是在向朋友寫信提出民主運動應該怎麼樣進行，徵求大家意見時說這番話的。民主運動怎麼能等同於顛覆政府的行動呢！

公訴人明知沒理，卻聲嘶力竭地大喊：搞民主運動也是以反革命為目的。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在當權者看來，搞民主運動就是反革命。否則，就難以理解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府為什麼將軍隊和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

在辯論過程中，王丹、楊律師和我為一方，公訴人為一方，雙方展開緊張的辯論。我們三人窮追不捨，王丹更是唇槍舌劍，就起訴書對他的指控，一一進行質問，像連珠炮一樣，射向公訴人，搞得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十分難堪，以至口出胡言。審判長多次制止王丹的發言，而對公訴人，發言不論多麼長，言詞不論如何過激、無理，從不被打斷。

正當辯論進行得熱火朝天時，審判長突然宣布辯論結束。我看一看錶，不足二十分鐘。令人遺憾的是，這場辯

歲月蒼蒼

論，我當庭無暇記錄，又不准許錄音，許多精采之處難以寫出。不過，我相信，終有一日，這段歷史會昭示於世的。

其心昭昭

王丹對自己的所做所為，作了最後的陳述，言詞坦蕩，昭昭之心，蒼天可鑒。

起訴書指控王丹自一九九三年二月被假釋出獄後「仍不思悔改」。對此，王丹坦言，他在出獄後不久，發表了一份《致海外各界關心我的朋友們的公開信》，在表明他的政治信念永不改變的同時，也表示他的言行將遵守中國現行的法律。這說明他的願望和立場都是真誠的。兩年來，王丹小心翼翼，言行謹慎，力求使自己的行為不超越現行的法律。不料，在這樣的努力和謹慎之下，仍然被說成是「進行了一系列危害國家安全，陰謀顛覆政府的犯罪活動，社會危害性很大」。

王丹在陳述中表示：「我不想粉飾自己，我承認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確實有一些觀點不夠成熟，有些事情做得也有不周全之處。但人非完人，孰能無過。」他說，造成以上情況，除主觀因素外，還有其不可抗拒的外來因素。

自一九九四年下半年開始，公安部門加緊對他監控。只

歲月蒼蒼

要一出家門，就會有六七個「便衣」分乘各種交通工具，對他進行跟蹤。最後發展到跟蹤的人在北京圖書館這樣的文明場所，對他進行不堪入耳的辱罵。王丹極為氣憤，便先後向世界發表三份呼籲書。言詞激憤。所有這些，公安機關也要負相當的責任。

王丹承認，出獄兩年多來，發表了三十餘篇政治性論文，接受過數百次採訪，發表了大量政治性言論。起訴書第一部分所列舉的所謂「犯罪事實」，只是他言論中的「滄海一粟」。

一九九三年，儘管他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極為不滿，但是，爲了國家的利益，他仍然在海外發表文章，支持中國申辦二〇〇〇年奧運會；一九九四年，美國國會中部分議員極力主張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樣也是爲了國家的利益，王丹在接受採訪時，多次表示，美國不應該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對於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從不隱諱自己的看法，也提出過批評。但對於改革開放和正確的方針、政策，他都是公開表示支持和擁護的。這些在他發表的多篇文章中隨處可見。

王丹在陳述中強調說：「兩年多以來，我曾在不同的場

歲月蒼蒼

合，包括與朋友的對話中，提出反對街頭政治，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漸進有序地進行，反對搞地下活動等政治觀點。」在《王丹胡平對話錄》一文中，王丹明確地表明他「不組黨，不入閣」的立場。

起訴書避而不談這些事實，而一味地妄加罪名。王丹要求合議庭在審理他的案件時，要全面地衡量他的言行，不能以偏概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認定反革命罪，必須具備的要件之一是動機。王丹堅決否認自己有被起訴書所認定的「陰謀顛覆政府罪」。因為，他認為他的言行根本不具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動機。

王丹從家庭和個人經歷，否認有推翻現政府的動機。他說：「我是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具備足夠的理智。在目前共產黨和政府掌握着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情況下，尤其是在像八九民運那樣聲勢浩大的運動都不能見容於政府的前提下，我以一個書生之力，無錢無權，無槍無人馬，卻居然要顛覆整個政府，這能令天下人相信嗎？」

況且，在他假釋出獄以後，一直在公安機關的嚴密控制之下，家中電話，他本人及家人的通信，都有種種不尋常之處。公安機關對他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瞭如指掌。在如此

歲月蒼蒼

高的透明度之下，起訴書仍然指控他「陰謀」如何如何，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王丹坦然地向法庭承認，他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就中國的民主政治和人權問題，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其真實動機有二：

一、是「為國家富強和民族興旺竭盡一己之力」，這是他的個人理想，也是投身八九民運以來及在假釋以後仍不改初衷的首要動機。

二、是「呼籲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設和改善人權狀況」。

王丹在陳述中不無痛心地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不戴有色眼鏡地去看這些言論，只可能看到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和對民主改革的熱望。難以相信還會有人從中看出要推翻政府的内容來。」

王丹呼籲政府應該「寬容地對待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坦誠地宣告：「六年後的今天，我又一次站在這裏接受法庭的審判，我的內心是坦然的。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認為我在這幾年來的言行是問心無愧的。不論面對怎樣的命運，我都可以發自內心地說，我的所做所為，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無愧於自己的良心。」

最後，王丹向法庭發表自己的感慨。他說：「我關注的

歲月蒼蒼

並不是我將被判多少年的刑，我更關注的是此次審判的歷史意義。我認為，無論是法庭、公訴人、辯護人，還是作為被告人的我；無論是在場的人，還是不在場，凡與本案有密切關聯的政府與持不同政見群體，今天我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言行書寫歷史。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之後，當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憑着自己的良心寫下了真實的一筆。』』

宣判

審判長宣布休庭半小時。此時正是上午十二時十五分。

我們一家三人同律師被安排在一個大房間內休息。我看到許多人出出進進，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為法庭旁聽席明明只有二十四個坐位。律師告訴我，旁邊還有一個大房間，許多人在這裏看實況轉播。我想，肯定不乏司法界的要人。剛剛坐定，我偶一抬頭，看到兒子身披一件棉軍大衣，在兩個法警的押解下，從門口一晃而過。我想走出去再看一眼孩子，剛一起身，一位工作人員走過來，呼的一聲關上了我們的房門。

一扇大門隔斷了我的視線，但卻隔不斷母子骨肉之情。

楊律師見我呆呆地坐在那裏，再三勸慰我說：對王丹不

歲月蒼蒼

論宣判多少年，你都要一定承受得住。在等待宣判的時刻，我腦海中一片空白，心像鉛一樣沉重，錶針也像凝固了一樣。

半個小時過後，人們又回到法庭。待大家坐定後，審判長和兩位審判員走來，沒有落座。她宣布：帶被告人王丹！王丹被兩個法警押着走來。我看着神情平靜的孩子，像一棵挺拔的青松，站立在被告席上，等待宣判。大凡是人的尊嚴愈是遭受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識就愈是堅強。我的心像刀絞。兒子愈是堅強，我愈是心疼。

審判長口頭宣讀判決書。

判決書聽來沒有任何新意，只是重複起訴書的內容，無非是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聽來更覺荒唐。她在列舉了王丹一系列「罪狀」後，宣布：被告人王丹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實施了一系列旨在陰謀顛覆我國政府的犯罪行動，其行為已構成陰謀顛覆政府罪，且係反革命累犯，應以法懲處。

聽着這一大堆聳人聽聞的「罪名」，出自法官之口，我深感不安。不知究竟要對她面前的這個瘦弱的青年要下多麼狠的毒手，也不知將會有多麼沉重的災難降臨我們這個家庭。

審判長還宣布：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指控被告人王丹

歲月蒼蒼

犯陰謀顛覆政府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人王丹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不能成立，故不予採納。多麼武斷，多麼蠻橫。此後鉛印出來的這份工工整整的判決書，簡直是對中國法律的天大褻瀆。歷史留下這樣的一筆，不能不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大恥辱。真不知這位堂堂法官的良心何在？人格又幾何！

王丹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刑期自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起，至二〇〇七年十月二日止。聽到判決，不論刑期多麼漫長，命運多麼嚴酷，高高懸着的一顆心總算落了地。

宣布閉庭已是下午一時。後來聽說，當天下午一時零七分，中國的新華社便對外宣布了王丹的判決。宣布之迅速令人瞠目。幾分鐘的時間，編寫、翻譯、發稿，效率如此之高，可謂少見。令人不解的是，王丹被判刑始終沒有向自己的人民公布。

相見

在開庭的前兩天，我向法院提出，宣判之後，我們家人希望能見見王丹。對方表示，按照法律規定，終審之前，被告人不能同家人見面。這個我明白，但是，孩子面對這麼沉

歲月蒼蒼

重的厄運，縱使再堅強，精神上也會遭受打擊。出於親情，我堅持要求家人能見一見他。他們答應研究以後再作答覆。

十月三十日這一天，趁休庭的時間，我找到那位姓王的審判員，再次提出家人要見王丹的要求，而他父親和姐姐已經一年多沒有見他了。答覆說：有關領導正在研究。

閉庭後，王法官通知我們三人留下。約二十分鐘後，我們在法院兩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乘坐法院的專車，前往半步橋看守所去見王丹。出人意料的是，在我們的前面，竟有兩輛警車開路，後邊也有車相隨，形成一個小小的車隊。警笛長鳴，招搖過市。對王丹的家人亦如此戒備，不知怕什麼。

車子開到高牆內，我們在車內等候。

這裏我來過多次。兒子在秦城監獄關押時，我們母子曾三次在這高牆之內相見。**歲月悠悠**。六年之後，我又兩次在這裏見孩子。令我刻骨銘心的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的會見。在一間小小的房間內，見到戴着手銬，面色蒼白的孩子。我們母子在相別十七個月之後，竟以辯護人和被告人的身分見面。那番心情難以用文字來描述，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難以平復的創傷。如今寫來，還禁不住淚水橫流。今天，在兒子被宣布判決一個小時之後，我同家人又來到這裏。命運對我們一家如此多舛，僅僅是因為孩子愛國。愛國有罪!?

歲月蒼蒼

我們被帶到看守所的一間嶄新的、漂亮的接待室。王丹在看守所所長的陪同下來到我們面前，神態輕鬆自若。他是個很懂事的孩子，有足夠的理智控制自己，有多少冤屈，多少憤懣，都會埋在心底，在家人團聚的短暫時刻，不會寫在臉上，為的是安慰我們，不願再為家人雪上添霜。

他的到來使室內的氣氛活躍了許多。他愈是談笑風聲，我愈是難過。眼前的孩子，由於已經秘密拘押了十七個月，特別是近一個月看守所的生活，顯得很虛弱，臉色慘白。他還要度過十一年的鐵窗生涯，在那漫長的四千多個日日夜夜中，將要忍受多少人間苦難，多少美好的生活被剝奪。這到底是命運的撥弄還是天地不仁！

我強忍着淚水，叮囑他今後不論發配到哪裏，不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要自己照顧好自己。我鼓勵他要有信心，只要地球還在運轉，斗轉星移，苦難歲月再漫長，也終會有盡頭。我還告訴他，昨晚一夜高燒，今天不但能出庭為他辯護，精神還格外的好。王丹說：「這是天意！」是啊！蒼天都有靈，有些人為何是木石！

我們彼此都努力使談話的氣氛輕鬆些。他姐姐問他，在法庭休庭時，為什麼見他披了一件軍大衣？他告訴我們，早晨六時半便從半步橋看守所出發，出動了十一輛警車，從城

歲月蒼蒼

南的半步橋到城西的八寶山，沿途崗哨林立，戒備森嚴。王丹躊躇滿志，談了他未來的學習計劃。好像是即將前往一個新的崗位，而不是去服重刑。兒女情長，人人有之。他很動情地囑咐我們兩人，要好好保重身體，安心地等待他歸來；他還拜託姐姐，照顧好爸爸、媽媽，替他盡孝。

半個小時的時間很快過去了。不論怎麼樣，法院破例特許我們一家相見，看守所又安排這樣的場所，應該感謝他們，使我們彼此都減少一些牽掛；同時，也可以看出，法院也好，看守所也罷，在他們的權限範圍內，他們盡量做點他們能做的事情。人非木石。

欲蓋彌彰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王丹案合議庭審判長蔡玥，在法庭判決的當天下午，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一篇談話。這篇談話，次日便以《一次公開和公正的審判》為題，在香港的《文匯報》和《大公報》上發表。談話特別強調「審判是公開的，公正的和合法的」。

法院審理案件，公開、公正和合法是司法的基本準則。審理王丹一案，為什麼急不可待地要向世人宣稱「公開」、「公正」和合法呢？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慌亂之中他

歲月蒼蒼

們大概忘記了「欲蓋彌彰」這句古語。

明明是森嚴壁壘，審判長卻說：「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對王丹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她沒有講是怎樣向社會公開的，向王丹的親戚、朋友發放了多少張旁聽券，允許多少國內外司法界人士及海外記者進入法庭。巧言掩蓋不了事實。

開庭前，法院曾向我宣布，王丹案的審理是公開的。我問他怎麼樣公開？他說：公開就是在開庭前，在法院門口的公告欄內張貼公告；同時，向家屬開放。我理解，張貼公告，其用意無非是向社會公布開庭日期，告知關心此案的各界人士，屆時前來旁聽。

王丹案開庭審理的前一天下午尚未見公告，三十日早晨，法院門外的馬路旁已經軍警林立，過往行人都要盤查，如此森嚴，有誰敢來旁聽，又有誰能進得來！所謂對家屬開放，只准許王丹的父親和姐姐出庭旁聽，就連他姐夫都不予批准，親戚更不待言。

新華社在對外的報道中聲稱：「各界群眾新聞記者及王丹的親屬等數十人參加了旁聽。」這短短二十三個字的一句報道，可以看出，是記者精心編造的。在「數十人」三字上大作文章，確實達到了混淆視聽的目的。他們很清楚，出庭旁聽的總共二十三人，除去兩位「陪同」家屬的法院工作人

歲月蒼蒼

員，僅僅二十一人。二十一人中，即沒有王丹的親戚，也沒有王丹的朋友，更沒有海外記者，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司法工作者要求旁聽王丹案的審理，早已被拒之國門之外。分明是壁壘森嚴，卻要奢談「公開」！其真實用意豈不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明明是武斷、橫蠻，審判長卻強調這次審判是「公正的」和「合法的」。也就是說，對王丹的判決，是有充足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香港要求釋放王丹的大遊行請願人士在香港新華社門前搭起一座「秦城監獄」，以抗議中國政府重判王丹。（明報資料室）

歲月蒼蒼

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的。對此，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王丹本人、律師和辯護人進行了充分的、有力的辯駁。對此，她十分清楚。但她卻對新華社記者講：「休庭後，合議庭依照事實和法律對案件進行了評議，隨後進行了口頭宣判。」是啊，從休庭、評議到宣判，程序完備，無可挑剔。然而，用了多長時間進行評議，這關鍵性的一句話，卻被審判長輕輕抹去了。她很明白，公訴人是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對王丹提起公訴的，王丹本人及兩位辯護人對此案進行了無罪辯護。結論大相徑庭。在法庭辯論中，王丹及辯護人多次要求公訴人提供足夠的證據，公訴人胡擾蠻纏。王丹要求提供新的人證。對此，合議庭理應在查明事實之後，根據有關法律，進行公正的判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這樣一個重大案件，在休庭三十分鐘之後，便匆匆宣布判決。明明是演了一場鬧劇，卻奢談什麼「公正」和「合法」！

王丹說得好：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憑着自己的良心寫下了真實的一筆。

其實，審判長蔡珮完全沒有必要這樣急急地在當天就對外發表這樣一篇皇皇大論。正如王丹所說，公訴人，法官，辯護人和他本人，都為這段歷史寫下了真實的一筆。她應當

歲月蒼蒼

相信人民，相信歷史，是不是憑着自己的良心，歷史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舉世嘩然

王丹被判重刑，舉世嘩然。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東帝汶奧塔、南非圖圖大主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五百多名國際知名人士和組織，在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李鵬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無條件釋放王丹，信中說：「王丹的所做所為，都是公開、和平、合法地倡導人權，我們要求中國政府本着公正和人道的精神，尊重自己對保障人權的承諾，維護法律尊嚴，無條件立即釋放王丹。」

中國人權、人權觀察等人權組織及民運團體，紛紛發表談話，強烈抗議中國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對王丹判以重刑，是「赤裸裸的迫害」。呼籲國際社會「積極行動起來，救援王丹」。

王丹被判以重刑，也使許多國家的政府感到震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表示，言論自由是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承認的權利，他呼籲「中國當局赦免這位勇敢的人物」，美國加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波洛西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對王丹

歲月蒼蒼

判刑；英國政府對王丹被判以重刑表示：「我們對王丹接受的重刑感到驚愕。」……他們「促請中國政府表現其仁慈，早些釋放王丹」；法國政府要求推翻判決結果，其外交部發言人說：「法國對中國不理會歐洲人的感受和關注感到失望。法國加入要求重審此案及修改判決結果的聲音。」捷克總統哈維爾發表聲明，對王丹再次被判刑「深表不滿」；即將訪問中國的瑞典首相佩爾松發表談話，認為中國政府判決王丹「應受責難，它顯示中國的人權政策正在倒退」。

香港同胞和新聞界，密切關注着王丹的命運，同我們家人心連着心。他們為救援王丹，奔走呼號，遊行抗議。王丹被檢察機關起訴以後，香港各界人士多次舉行示威遊行。十月三十日，王丹被判刑的當天，數百名各界人士在港支聯的組織下，遊行示威，要求釋放王丹。就在判刑當天，幾位立法局議員，憤而前往北京抗議，被阻止在海關之外。香港同胞申張正義，支持大陸追求民主的熱情，令我們全家感動。

王丹因言獲罪，深深傷害了海外中國留學生的心。他們同王丹一樣，都有一顆拳拳報國之心。中國政府對王丹判以重刑，使數十萬名有心報國的海外學子，憂心忡忡。他們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面對中國經濟起飛的前景，很多人準備學成回國服務。然而，作為知識分子，海

歲月蒼蒼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香港二千多名市民遊行要求釋放王丹。（明報資料室）

歲月蒼蒼

外的中國學生學者非常關心自己的祖國，在這樣那樣事情上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多數留學生也曾以不同方式獲得國外各種來源的資助完成學業。文革中法律成兒戲，歸國學者多被打成『特務』受到迫害的殷鑒未遠，如今王丹又因言論、國外獎學金獲罪，我們又怎麼不擔憂回國後的安全呢？」信中還指出，對王丹的判決，「已在有心報國的萬千學子中造成了無法估量的離心作用」。他們要求政府「維護憲法的尊嚴，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許多留學生和民運人士，在世界各地舉行抗議活動。

世界輿論的支持，對營救王丹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無聲勝有聲

王丹再次被判刑，官方對國內人民嚴格實行消息封鎖。對我們的住處，嚴密監控，對我的行動，進行跟蹤。我家上空，烏雲密佈。

儘管如此，國內的許多人士還是從各種渠道，獲悉了王丹被判以重刑的消息。許多有良知、主持正義的人士，不顧政府的高壓，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重判王丹的憤懣和對王丹及我們一家的同情。

王丹被判刑的當天，幾位朋友、老同學、同事，先後打

歲月蒼蒼

來電話，要我保重身體，千萬不能倒下，「因為孩子還需要你」。王丹往日的幾位朋友，衝破大門口警察的重重封鎖，登門慰問。此後，我還收到幾封沒有地址、不具姓名的來信，表達他們對政府重判王丹的憤慨和承諾民主與法制的失望。也表達了對王丹堅持民主理念的敬意。有一位寧夏的先生，通過美國之音的廣播，轉致對我們家人的問候。

最令我刻骨銘心的，是兩位老知識分子的錚錚傲骨。

王丹被判刑的第二天，十月三十一日，北京師範大學劉遼教授致函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判處王丹重刑，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在信中首先介紹自己的身份和職務，顯示這位教授的磊落和坦蕩。在此，將信全文刊出，昭示於世，也表示我的敬意。

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

我叫劉遼，現年六十八歲，係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學教授，中國引力和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理事長，國際廣義相對論和引力委員會中國委員。

得悉貴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愛國學生王丹以十一年之久的重刑，深感不妥，特寫此信向貴院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與王丹接觸不多，但從少數幾次交談中，我認識到他

歲月蒼蒼

是一位人品純真、不謀私利，而對祖國前途執着關心的青年學生。從貴院的起訴書中，我看不到王丹有任何反叛祖國，圖謀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實際行動。關心祖國的未來，在國家憲法容許的範圍內，和平地發表一些與當局不盡相同的政見，以期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使祖國得以盡快地走向富強康樂之道，何罪之有？判以重刑，於理於法，更屬不合。我籲請我國法院重新審議並無罪釋放王丹同學。

古人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建國後，歷史上的「輿論一律」，容不得反對意見，已造成過多少次國策上的失誤，製造過多少冤假錯案，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過慘痛的災難。至今思之，仍令人痛心疾首。今天本應痛定思痛，汲取歷史教訓，對和平表述自己對國是不同意見者，採取鼓勵寬容政策。今天對王丹判以重刑，實說明當局不僅未汲取往日教訓，反而企圖塞天下人口，在國內造成一種鴉雀無聲的局面。如此下去，後果堪憂。竊以為當政諸公所不取。

此致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劉遼

一九九六年十月卅一日

此後，劉遼先生幾次寫信給我們，要我們轉致王丹，希望他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學習，保護身體。

歲月蒼蒼

一直致力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先生，一身正氣。早在這一年的八月，當他聽說王丹將被判刑時，就曾表示，如果給王丹判刑，他要公開爲他辯護，以示抗議。

王丹被判以重刑，他極爲憤慨，不顧當局的阻撓和重重壓力，奮筆寫出《爲王丹辯護》一文，向世人昭示真相。我接到這篇文章後，含着眼淚，一連讀了三遍。這位在六十多年前就身爲共產黨員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回憶在國民黨當政時判處共產黨員的情形，不無痛心地寫道：「就在大張旗鼓宣傳『精神文明』的今天，卻要對這樣一個青年判處比當年岌岌可危的國民黨政權判處共產黨員更重的刑，實在令人費解和深思。可以肯定，這對我國政府不可能是一件光彩的事，也不是一種有自信的表現。」他期待着王丹冤案早一天平反昭雪。

四面八方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透過層層雲霧，向王丹和我們家人表達他們的同情、關懷和支持，一聲問候，幾句安慰的話語，都像和煦的陽光，溫暖着我的心，給我以生活的勇氣和對未來的信心。

歲月蒼蒼

再見王丹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開庭宣判的第三天，法院將判決書的副本送到我家中。手捧判決書，我木然呆坐在沙發上，一陣心酸。就是這薄薄的兩三頁紙，便奪去了兒子十一年最美好的年華。望着窗外的一片深秋，浮想連翩。本世紀的前五十年，多少熱血青年，拋棄學業，遠離父母，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爲此，被追捕、繫獄，許多人獻出了生命。何曾料到，他們爲之奮鬥的「明天」，一代又一代青年，爲了祖國的富強與民主，仍然要遭受牢獄之苦，不少人爲之付出了青春年華，以至生命。這到底爲什麼？

翻開判決書，一個個黑黑的鉛字，印在白紙上，工工整整，法院紅色大印覆蓋其後，煞有其事，實則是「滿紙荒唐言」。氣憤之極，又無可奈何。大有「秀才遇到兵」之感。平靜下來一想，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法官們，畢意不是武夫，王丹究竟有沒有罪，他們應當比別人更清楚。如此爲之，不過是爲「飯碗」而已。這樣一想，反倒對他們有幾分憐憫。

十一月四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派員通知我，說王丹的上訴狀已經交到該院。王丹委託法院轉告，他將繼續委託

歲月蒼蒼

一審的兩位辯護人爲他的二審辯護人。她還特別通知我：二審不開庭，採取提訊的方式，只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方同王丹談話，公訴人和辯護人都不出席，只交書面發言。她要求一個星期之後將辯護詞交到法院。我不解地問，爲什麼不開庭？她說：都是這樣做。

我提出要在二審前見見王丹。她答應回去研究。後來我才知道，作爲辯護人，和初審一樣，都可以會見被告人。

十一月六日上午，北風漫天。我獨自一人再次來到這座看守所大門外。在冷風中鵠立，翹首以待。等到十時許，仍不見法院人來，我到大門旁的傳達室詢問，不予理睬。幸得大門警衛好心允許，進入大門之內，遍尋法院的人不見，我滿腹狐疑，快快返回。

下午二時，我再到看守所大門外，寒風中我坐在路旁石階上等候。法院一位女工作人員出來接我。原來上午他們遲到，我又沒有久候，便錯過了機會。

這次會見，仍然是在那座漂亮的接待室。見到孩子，看他精神還好，只是更加消瘦。他告訴我，近幾天因天氣寒冷，吃不好飯，胃痛時常發作。坐在一旁的看守所所長衝着我說：「你這個孩子很不好管教，動不動就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不給他看病就是不講人道主義。」我冷冷地回敬他一

歲月蒼蒼

句：「政府給他扣了那麼多帽子（指起訴書），他不就給你們扣了一頂帽子嗎？」

王丹告訴我，上訴狀他只草草寫了幾句，詳細情況讓他們去看交給中級人民法院的辯護詞。對上訴改判他根本不抱希望，只求二審快快結束，早日結束看守所的痛苦生活。他哪裏知道，一審開庭，二審裁決，選在哪一天，都是當局精心安排的，有誰會想到他的痛苦！

我告訴他，判刑的消息在國內沒有公布，判決宣布後七分鐘新華社便向海外發了消息。香港及歐美各國反映強烈。當着法院工作人員的面，我對判決書進行了抨擊。我懷疑一審時法院出示的證據，不一定是從住所抄去的，有的不知是從哪裏複印出來的。我很氣憤。王丹卻處之泰然，似乎他對這一切都已看破。

十分鐘裁決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初冬的北京，晴空萬里。和煦的天氣並沒有沖淡我心情的沉重。我的心中依然陰雲一片。這一天，王丹一案要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宣判。根據法院通知，辯護人和家屬均可出席。

十五日早飯後，我們正待出發，我家駐地派出所所長急

歲月蒼蒼

急地蹬上樓來，他一進門就說：「外邊的記者很多，我們的壓力很大，已經叫了一輛出租車等在樓下，等一會你們坐這一輛車到西直門地鐵站。」從我家到地鐵站，只有一站路程，乘出租車確無必要。我明白他們的意思，是為避免我們同記者接觸。我也不想為難派出所，但是，十月三十日一審開庭時乘坐法院「專車」的教訓我不能忘記，便婉言謝絕了所長的好意，不一會，他再次上樓，我們仍然沒有從命。

大約早上七時四十分，我們下樓來到院中，門口已是警察林立。我們在警察的簇擁下來到胡同口，舉眼一望，馬路旁已經密密地樹起一道人牆，堵住了胡同的出口。原來記者都被擋在這裏，不准走近我家門前一步。見我們走來，一位高個子的攝影師舉起攝像機，正要拍攝，被一隻大手擋住了鏡頭。記者們驅之不散。幾十名警察組成兩道人牆，把我們夾在中間，人牆外是一列長長的記者隊伍，齊頭並進，緩緩西行，形成一幅奇異的景觀。

來到西直門地鐵站，入口處早已有五、六個警察嚴加把守，幾十名警察，像歡送貴賓一樣，在站台上列隊目送我們西去。走出地鐵站前往法院，一路還算清靜。行進間，突然從路旁跳出一位金髮女郎，稱是法新社記者，我們邊走邊談。便衣警察沒有阻攔，只是將我們交談的情景攝入了他的

歲月蒼蒼

鏡頭。

經歷了這般情景，我說不出一種什麼感覺，是憤慨、無奈、困惑，還是好笑?!兼而有之。

法院周圍，已經軍警林立，如同上次一樣。路旁的小樹林，又拉上了繩索。差五分鐘九點我們來到法院大門口，早已有人在此等候。徑直來到法庭。還是一審開庭時的那個房間，已坐無虛席。大部分是年輕人，看樣子像是法院的工作人員臨時拉來湊數的。

九時整，宣布開庭。審判長和審判員走進法庭，沒有就座。王丹被帶進法庭。審判長宣讀刑事裁定書。裁定書仍然重複判決書的濫調，強蠻地裁定：「王丹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王丹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不予採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建議駁回王丹的上訴，維持原判的意見正確，應予採納。」沒有允許王丹和辯護人講話，便宣布結束，我看看錶，九時十分。這樣一樁「陰謀顛覆政府」的大案，十分鐘便完成了裁決！

依照法律規定，高一級人民法院的終審裁決，特別是像王丹這樣的大案，況且被告人、辯護人的意見同一審判決大相徑庭，在審理時更應該審慎，查明證據，充分聽取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的意見，然後才能做出公正的裁決。遺

歲月蒼蒼

憾的是，整個終審過程完全是走過場，草率從事。我問一位審判員，對王丹是什麼時候提訊的，他含混答：前幾天。我又追問：哪一天？他不回答：很可能根本就沒有提訊。

憤而靜坐

我拿到刑事裁定書的同時，審判長告訴我們，這是終審，王丹將轉往勞改局等候處理。

十分鐘終審裁定，就這樣草草地判定一個人的命運。悲憤、冤屈、絕望，百感交集。公理何在！正義何在！我不甘心就這樣默默地離開這座大門上嵌有國徽的法院。就是這座法院剝奪了我的兒子，一個愛國青年的自由。我們三人決定，在法院門前靜坐一小時，表達我們的悲憤和抗議。

我們走出法院，坐在法院門口馬路旁的水泥台階上，正是九時二十分。擔任警戒的警察正準備撤離，栓在路邊小樹林的繩索正在被解除。見我們三人坐在路旁，他們始料未及，警察立即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十分緊張。兩個「便衣」拿着錄音機緊緊站在我們身後。不知是誰叫來了審判長，只見她慌慌張張跑過來，問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沒有答理她。她又對我女兒說：我們那裏有醫務室，陪你媽到那裏去休息休息。她們可能真的以為我是生病了。我說：不必了！

歲月蒼蒼

她還在勸說，我生氣了，冷冷地問她：我們坐在這裏妨礙你們的公務嗎？她自覺沒趣，站了一會便走開了。

初冬的北京，已感寒冷。北風吹來，衣不避寒。坐在冰冷的台階上，滿腔悲憤，仰望蒼天，欲哭無淚。

我冷眼觀察眼前的一切，兩邊林立的警察，躲在身後的便衣，馬路對面的院子裏，隱藏着八九輛警車，後來聽王丹說，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在此坐鎮。這一切，原來是對付一個文弱的青年。僅僅十分鐘的宣判，如此調兵遣將，如臨大敵，究竟怕什麼？此刻，又來對付三個孤單的家人。我們在此坐一坐，即不呼喊口號，又沒發表演講，如此衆多的警察和警車，在寒風中苦苦相陪，又是爲什麼？

坐在路旁，看見馬路上駛過一輛又一輛汽車，車內攝像機的鏡頭對着我們，一掠而過。

烏雲遮不住太陽。我們並不孤立。公理和正義在王丹一邊，在我們家人一邊，在千千萬萬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士一邊。

第八章

冬日漫漫



歲月蒼蒼

迎接苦難

王丹將在什麼地方服刑，關係着我們全家人的命運。

一審判決後，我們便寫信給北京市勞改局，說明王丹患有咽喉炎等疾病，就近便於就醫；同時，我們兩人都已年屆花甲，不堪遠途跋涉。希望他們能本着人道主義精神，體諒我們做父母的困難，留王丹在北京服刑。

十一月十五日，二審宣判裁定後，審判長對家屬交待說，王丹將交由勞改局處理。我問她王丹可能會在什麼地方服刑？她肯定地回答：不可能留在北京！這無情地回答，打破了我們祈盼王丹留在北京的夢想。服刑人員一般都是在戶口所在地服刑，爲什麼王丹就不能留在北京？把王丹發配外地，再一次顯示出當局的無理和虛弱。

一個小時的靜坐結束後，我們沒有回家，從法院直奔北京市勞改局，想盡我們的力量，再做最後的爭取，以期能打動他們的心。到達勞改局已近中午，傳達室的接待人員似乎已經知道我們到來（「便衣」緊緊跟隨着我們，其任務之一就是掌握我們的行蹤），一個個鐵青着面孔。我們要求見有關領導，開始不予理睬，後又說都已出差，讓我們改日再來。分明是推託，但又能奈何！

歲月蒼蒼

要送王丹到外地服刑，已成定局，無可挽回。王丹被起訴後，這是向我們擲來的第二次打擊。究竟要送孩子到哪裏去呢？我的腦海裏立刻閃現出茫茫的青海荒原和新疆無邊無際的戈壁沙灘。我向公安局的來人表示：無論把王丹送往何地，即便是遙遠的青海或新疆，我們都會去看他。待到我年老走不動時，我爬也要爬着去看孩子。萬水千山隔不斷母子親情。

判以重刑仍感不足，還要發配外地。爲什麼這樣做？是懲罰！十一年的鐵窗囚籠，對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還不是沉重如山的懲罰嗎？是恐懼！一個瘦弱書生，高牆鐵網，他又怎能奈何！堂堂一個大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同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過不去。光彩嗎？

我經歷這番打擊後，再也支撐不住，第二天便病倒了。

十一月十七日晚，公安局一處的人員來我家，通知我們，王丹已經送往遼寧省錦州監獄；同時轉來一張錦州監獄的家屬會見通知單。我一看，通知單的簽發日期是十一月十六日，便斷定王丹已於十五日離開北京，氣憤地對來人說：「上午開庭終審，下午便把王丹送往外地。他在北京一天都不能多留，容不得同家人見一面，這麼害怕，難道王丹手裏有原子彈！」

歲月蒼蒼

後來方知道，王丹是十一月十八日到達錦州的。十六日簽發的通知單卻寫着：王丹已經投入本監獄。這其中另有文章。

大局已定，無容置疑。我們只能面對現實，迎接命運的挑戰。

首赴錦州

確知兒子未來十一年的漫長歲月將在錦州度過。不論前路有多少艱險，我們將陪同孩子一同走過這漫漫長夜，如同東北大地漫長的冬天。

錦州監獄要求我們務於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到達。我們購得十八日晚上的火車票。

錦州地處關外，氣候寒冷，冬日漫長。孩子衣著單薄，怎能耐得住寒冬。十八日上午，我拖着病體，上街爲他購置冬裝，棉衣、棉褲、棉鞋、棉帽，還有一副厚厚的棉手套。所能禦寒的衣物都備齊了。他姐姐想到他患有咽炎，喉部怕冷，特爲他找來一條大圍巾。好像是送親人遠行，沒去想對於服刑人員，這些東西獄方是否允許交給他。爲他多添一件衣物，似乎就減少我們內心的一份沉重。

十八日晚六時半，我們一家五人前往火車站。王丹六歲

歲月蒼蒼

的小外甥聽說要去看舅舅，非常高興。他已經十七個月沒有見到「王丹舅舅」了。王丹非常喜歡這個聰明可愛的小外甥，時常到幼兒園接他，為他買玩具。小天天他很愛舅舅，總是親切地喊「王丹舅舅」！王丹離家期間，他時常問起舅舅，但卻不知道舅舅為什麼久久不能回家。此次去，我們是告訴他「舅舅在錦州工作，今天帶你坐火車去看看他」。

來到火車站，我們發現身後有六、七個便衣警察跟蹤，頓時感到氣氛緊張，預感到我們此行有可能不能如期歸來，不知會發生什麼意外。我便同女兒商量，要她同孩子取消此行。小天天得知不讓去看舅舅，非常傷心，久久不肯離開候

家人時常把小天天的照片送給舅舅，為他獄中生活增添一份亮光。他在每張照片後面都寫幾句話。這是無聲的交流：「這張最最好！一個沉思中的失頭寶寶，如果永遠不長大該多好！」（王丹）。（作者提供）



歲月蒼蒼

車室。

正當我們等候檢票時，一位香港電視台的女記者機敏地走過來採訪，招來一群旅客圍觀。電視台的攝像機和「便衣」的照像機同時對着我們拍攝。出乎意料的是，警察沒有阻止採訪。當我們排隊向檢票口行進時，「便衣」對着我們公然地大拍其照。我很費解，在火車站這樣的公共場所，我們在人群中即沒有同別人交談也不可能搞什麼秘密活動，那麼，留此存照幹什麼！

我們剛剛走近檢票口，便聽到兩個警察說：前邊有外國人！顯得很緊張。這些警察顯然是為我們此行來執行任務的。我們剛進檢票口，只見一位高高的西方女孩快捷地一步跨到人群中，舉起相機，對着我拍照。一個小個子警察跑過來，將她推到一邊。陪同我去錦州的我的小侄子，見警察對女孩這麼蠻橫很氣憤，說要不是趕火車，真想揍他一頓。

上車後，我們看見窗外的月台上聚集着一群人，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足足有二十多人。不一會，駛來一輛高級小轎車，走下一位長者，可能是前來臨陣指揮的。見此情景，我們三人輕蔑地相視一笑。

十一月的關外，已是寒冬。十九日早晨六時三十分車到錦州。天氣陰沉，北風漫天。我們都是第一次來錦州，走出

歲月蒼蒼

車站，四顧茫茫。打出租車去太和區南山里，司機見我們身揹大包小包，便知是去探監。原來錦州監獄位於錦州南郊，當地人稱之南山監獄，幾乎人人知曉。司機很熟練地便把我們送到監獄的大門口。

傳達室人員聽我們說是王丹家屬，立刻電話通知有關人員，等了很久，上邊指示，先到招待所等候。監獄給我們的通知上明明寫着「務於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前到達」，我們準時到來，為什麼被安排在招待所呢？我感到疑惑，怕其中有詐，便沒去招待所，徑直找到獄政處，小辦事員不知其中緣由，很客氣地讓我們稍候，又等了許久，她回來說，我們在此妨礙工作，勸我們去招待所。無奈，只好隨她去招待所。

招待所和監獄相對。面對佈滿鐵絲網的高牆，痛心楚楚。孩子在大牆內，父母在大牆外，一牆之隔，不能相見。我望着高牆，呆呆地站了很久，真想到大牆腳下痛哭一場。

第一次探監

我們來到錦州監獄，恨不得立刻能見到兒子。不料，獄方百般搪塞，一味拖延，我們再三追問，幾番要求見監獄長，均無結果。直至下午五時仍不得相見，眼看就要下班，

歲月蒼蒼

十九日會見已無可能，非常氣憤，又無處發洩，我無法冷靜，走到招待所樓下的場地上，向着許多在此等待班車的警察大喊：「爲什麼把我們騙來不讓見人？王丹有什麼罪！發配到錦州來。」有些人跑過來聽，當聽到我喊「跟一個年輕學生過不去，這個政府光彩嗎？」有人趕快走開了。負責接待我們的獄政處的一位副處長趕快走來相勸。我已經把行李拿到樓下，執意當晚要回北京去。心想，寧肯不見孩子，也受不了這番愚弄。那位處長說：王丹剛剛到這裏，也很想見家裏人，他要是知道你們回去，該多難過啊（其實，此時王丹尚不知我們來錦州），這句話打動了我，先生和侄子也勸我回房間去，氣病了不值得。我只得又回到招待所。

夜幕降臨，郊外一片冷清。大牆內，黑幽幽，死一般寂靜，只有瞭望台上值班巡警的身影依稀可見。我猶如在夢中，一時不知置身何處。

不能如期返京，給留在家中的女兒打電話，剛剛說：「我們被扣在錦州啦」，電話便「啪！」的一聲被截斷了，從此，同家中失去了聯繫。回家後聽女兒講，電話截斷後，很快上樓來三個公安局一處的警察，把她同小孩嚴密監控起來。她很着急，不知次日要接送孩子上學怎麼辦？第二天，只好出動公安局的警車載着她接送孩子。一處的人還對她

歲月蒼蒼

講：你媽在錦州不冷靜，我們要派人去那裏。很顯然，把我們扣在錦州，並非獄方本意，而是奉了北京的旨意。在美國國務卿訪華期間，不許我們留在北京，就連我們啓程的日期也是他們精心安排的。

二十日上午，我們被允許會見王丹。在獄方工作人員的帶領下，進入大牆之內，拐了幾道彎，來到一個房間。檢查物品時，見帶有幾十本書，他們很驚奇，說：「還從來沒見過犯人家屬給犯人送書的！我們這裏有圖書館，要看書，可以在這裏借。」我們解釋說：這裏的書，恐怕無法滿足王丹的需要。他視書如命，一天不能沒有書讀。他們還算理解，將大部分書收下了，所帶報紙，全部退回。

上樓在一個筒道裏，看到一排陳列整齊的一個個半圓形的玻璃小洞，每個洞外放着一個耳機如我在電影中看到過，知道這是犯人接見家屬的地方。感到陰森森的，不敢細看。奇怪的是，我們沒有在這裏停留，而被帶到另外一排小房間的第五號房內，三張方桌拼成一條長桌，佔去大部分空間。工作人員介紹說，這裏是餐廳，犯人可以在這裏同家屬吃團圓飯。他主動提出，如果我們願意，今天可以在這裏和王丹共同吃頓午飯。我們自然願意。倒不在乎吃什麼樣的飯，是想借此機會，能有更多的時間同孩子多說幾句話。

歲月蒼蒼

將近中午時分，王丹在三位警察的「陪同」下走來。從十月十四日至今，我四次見到孩子，從北京的看守所，到千里之遙的錦州監獄，一切都似在夢中。

原來，王丹是十八日早晨來到錦州的。早我們一天到達，他沒有想到來到此地的第三天就能同家人見面，自然很高興，他的情緒沖淡了探監的沉重氣氛。說來，這還應當感謝美國國務卿。

王丹向我們介紹了他來到這裏的感受和生活環境。最令他滿意的是，獄方爲他準備了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談的最多的還是他在北京被關押的十七個月中的種種遭遇和「趣事」。兩名武警二十四小時在身邊「陪伴」，令他寢食不安；他同小武警也交上了朋友，他教他們讀書、認字，他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王凌雲與兒子王丹。（明報資料室）

歲月蒼蒼

教他在地上摸爬滾打。有一次，兩個小武警在他一左一右，搭着肩膀，三個人正竊竊私語，他們的上司正從此經過，看在眼裏，第二天，便把他們調走了；他爲了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十七個月中被迫六次絕食抗議。

談話進行了四個小時，仍覺時光匆匆。一年又五個月和兒子同處一地而不能相見，彼此苦苦牽掛。此次相見，縱是千言萬語，也道不盡骨肉親情。目送孩子離去，依依告別。

監獄長會見了我們，向我們瞭解王丹的性格及愛好、家屬有什麼要求。我們懇切地希望盡可能地爲他創造條件，讓他讀書，因爲孩子還年輕；同時，我們也希望能保證他的基本健康。監獄長說，法律無情人有情，我們會盡可能做到你們的要求。監獄長給我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走出監獄大門，夜幕已經降臨。急急登程返京。從此，我們便踏上了悠悠苦旅，嚴冬酷夏，義無反顧。

「我是一棵大樹」

面對厄運，王丹沒有屈服。他把自己比作大樹，任憑風雪肆虐，他將巍然屹立。兩度入獄，使他失去了很多，但他忍受磨難追求生活的勇氣和不倦的思考卻永遠不會失去。

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告訴我們，他將遵循「勤勉、樂觀、

歲月蒼蒼

慎獨、平和」的原則，調整自己的情緒。做到：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望天上雲捲雲舒。

他還通過背誦古詩詞，以「在喧囂中刻意營造一份寧靜」。

在王丹看來，「現在處境雖然困厄，但也不失為一種機遇，暫時跳出局外，作一個社會的旁觀者，也有利於冷靜思考」。他以自己的這種心態，勸我也要將憤懣的心情平靜下來，以沉着冷靜的心境，應付挫折和意外。

王丹認為。生活有各種各樣，自由是一種生活，不自由也是一種生活，就看你如何使它更有意義。他不能與朋友通信，不能同外人自由交流。在極端的精神寂寞和生活艱難中，他唯一的精神寄託就是讀書、讀報和每月兩封家信。

他讀書的興趣很廣泛，政治理論、歷史、哲學、文學和通俗的自然科學，他都想讀一讀。每個月的第二封信，他都開列一個長長的索書單。家中已有的圖書，遠遠滿足不了他的需要。每個月，我們都全家動員，為他購書，借書，搜集各類期刊、報紙。他讀書看報十分用心。剪報是他一大樂趣，從各類報刊中，獲取大量信息。他把讀書心得通過家信寄出來，有的寫成眉批，保存在書上。抒發自己的感想，評

歲月蒼蒼

論他人的觀點。家信成了他獨一無二的傳遞思想的園地。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王丹在秦城監獄關押和在北京第二監獄服刑期間，寫了二百多首詩詞和多篇散文。我見他第二次入獄後，很少寫詩詞，便鼓勵他多寫些短小的詩詞和散文。因為特殊的環境，可以激起人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更多的思考和感慨。寫一寫，既可以練筆，又可以抒發情感。後來，他讓我把他在一九九三年、九四年在各地旅遊時的照片送給他，以「聽風齋隨筆」為題，寫下了多篇散文，每篇七、八百字，隨信寄出。

儘管王丹刻意調整自己的情緒，也有宏大的讀書計劃。但是，從來信的字裏行間，有時也流露出在對漫長歲月期待中所承受的心靈折磨。一九九七年春天降臨後，他寫信勸我春天來了，多到公園去走走，舒展一下眉梢。對於他自己，卻說：「就我而言，還是喜歡冬天，因為無論是春天的復甦，夏天的豐富，還是秋天的詩意盎然，都不能不令我與身在囹圄之中的無所作為形成鮮明的反差對比，徒增一些無謂的心情。倒是冬天的嚴寒冷酷，使我覺得並不陌生。」

人間真情

王丹渴望友情。他寫信說：「不論外邊如何變化，我總

歲月蒼蒼

不相信人情似水。」

中國有關法律規定，服刑人員可以同親屬、朋友通信。王丹到達錦州監獄後，希望同朋友通信，幾位不怕「惹麻煩」的朋友，陸續將信寄往錦州。儘管信中不談政治，不論國事，不問案情，還是以「不適宜」為由，一一退回。他們大概也顧及一點點「法律的尊嚴」，最後只允許王丹同他大學的一位同學通信。就這一兩個月的一次書信往還，也為王丹沙漠一般的精神生活，營造了一片小小的綠洲。

所有主持正義的人們，沒有忘記飽受牢獄之苦的王丹。

海外的人權機構、民運組織、海內外的異議人士和相識、不相識的朋友，香港同胞，時刻關心着王丹的命運。他被判以重刑後，他們奔走，呼號。特別是國內的朋友，冒着坐牢的危險，向中國政府再三呼籲，釋放政治犯、恢復王丹自由。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就在王丹判刑的第三天，芝加哥城的朋友，包括王丹在天安門廣場的戰友張伯笠、周封鎖，發出給王丹的第一封公開信，遣責中國當政者對王丹的迫害，表達對王丹的關懷和支持。他們熱誠地表示：「我們會盡我們的全力幫助你和你的家人，度過艱苦的時光。獄牆可以割斷外界的聲音，但它籠住的每一絲寂靜都迴響着世界

歲月蒼蒼

對罪惡的抗議，鐵窗可以鎖住你的身軀，但它鎖不住我們對你每分每秒的關切。只要你一天不自由，我們就一天不放棄為你自由的抗爭。」朋友們衷心希望：「務必盡你最大的努力，保持身體的健康和精神的樂觀。邪惡永遠不會戰勝正義。」

在王丹被關押和被判刑期間，我收到許多來自美洲、歐洲、澳洲等地不曾相識的朋友的信，給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流亡海外的王丹八九年的戰友，更是時時刻刻關注着他，時常打電話來，詢問王丹情況，安慰我們幫助我們。很多朋友，每逢聖誕節、新年和王丹的生日，都寄來賀卡，短短數語，表示他們的祝願。

在國內，王丹往日的朋友，雖然不能公開爲他講話，但卻把友情埋在心底，時時牽掛着他，爲他購書，替他盡孝。一位朋友，在王丹生日那一天，巧妙地通過中央電台爲他點歌。

一些不相識、但卻同爲中國的民主事業獻身的朋友，通過家人，轉達對王丹的問候和祝願。安徽的沈良慶，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寫信給王丹，向他推薦兩本書。當我收到這封信時，他已再次被捕。這是一位爲了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奮力工作的人士。長春的因政治原因被判刑、剛剛被釋放的

歲月蒼蒼

三位朋友，來信祝願王丹早日獲得自由。

還有一些沒有地址、不具姓名的人士，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王丹、對我們全家的關心和支持。一張印有盛開着的梅花的賀卡上寫着：向王丹致敬，向偉大的母親致敬，向英雄的家庭致敬。嚴冬過去就是春天。山西臨汾一位署名「離休者」，寄來明信片，向我們全家祝賀春節。

飽經坎坷的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都有一身正氣，十分關心國家的民主和昌盛，關心和支持為中國的民主化事業獻身的青年一代。

方勵之和李淑嫻教授，遠隔重洋，在寄給我們的賀年卡上寫道：「在遙遠的異鄉，我們一刻也沒有忘記故土的一切及那裏的親人，尤其是受難的孩子。」他們囑咐王丹「好好學習，保重身體」；許良英先生是王丹的良師。他那剛直不阿的品格，對王丹很有影響。王丹被判以重刑後，許先生公開為他辯護。他和夫人王來棣先生時常詢問王丹情況，關懷他的健康；北京大學八十多歲的周輔成教授，不顧路途勞頓，三次登門，親自為王丹送來營養品；北京師範大學的劉遼教授，給王丹寄賀卡，「向小王致以衷心的慰問和祝福」。

這一張張賀卡，一頁頁信紙，幾句問候和祝福的話語，

歲月蒼蒼

都蘊含着一片真情。感人肺腑，催人淚下。正是這種關懷和鼓勵，使我們度過了最困苦的光陰。所有這些，王丹雖然不能直接感受到，我們都盡可能地，巧妙地向他轉達。正是大家的這番心意和友情，給他以力量，使他身在獄中，但卻不感孤單。

我也想藉此機會，向所有關心我們的各方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謝。我們也將會像你們一樣，關心那些尚在苦難中的人們。

冬天裏企盼春天

東北大地，冬日漫漫。我們在冰雪中跋涉，在寒風中呼號，企盼冬天裏會有春天。

王丹被判以重刑，又發配到千里之外的錦州。家人最擔心的是他的健康。第一次入獄，兒子年方二十歲，正值青春年華，男孩子也正是長身體的年齡。三年又七個月的鐵窗生涯，雖然沒有罹致重病，健康卻受到摧殘。出獄兩年，尚沒等完全恢復，再次被捕，將要遭受十一年牢獄之苦，本來就瘦弱的孩子，能承受得住嗎？做父母的心痛萬分。

在秦城監獄時，王丹患了嚴重的咽炎，到錦州後，因氣候寒冷，乾燥，咽炎更加嚴重，咳嗽不止。一九九七年五

歲月蒼蒼



一九九〇年春節在公園。在萬家歡聚的時刻，獨在公園感受蒼涼。
(作者提供)

月，他又患頭昏頭痛。獄方請了專家診治，病情沒見好轉，以致發展到嚴重失眠。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們探視時，他說近日視力下降，我懷疑大腦出了問題，十分擔憂。回到北京後，我立刻向司法部等有關部門寫信，要求為王丹盡快做一次腦部儀器檢查。沒有回應。迫不得已，我又先後向中國國家主席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寫信，呼籲關注王丹的健康，要求准予保外就醫。

王丹一案本是一樁冤案，家屬依照法律為他申訴，我們

歲月蒼蒼

又到信訪處四處上訪，多次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寫信，爲他申冤。所有這一切都石沉大海。

不論冬天多麼漫長，不管前程多麼艱難，只要我的兒子一天不獲自由，我們就一天不停地營救他。我堅信，正義總會戰勝邪惡。我也深深瞭解，在我們的背後，有着整個的民主世界。我企盼春天早日到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我們被告知，次日要爲王丹做體檢，錦州獄方希望父母在場。沒有多問，也不能多問。懷着一團疑雲，匆匆乘火車東去。獄方幾次爲王丹體檢，診斷結果從沒有通知過我們，這一次爲什麼要求父母陪同？是出了什麼事？當日下午還收到兒子的信，沒有異常。是接孩子回家？卻又無論如何不敢相信。

十八日清晨車到錦州。這是我第十八次走出錦州火車站，與往日不同的是，獄政科的四位人員早已等候在站口，還備有一輛嶄新的麵包車。談話間，張副科長動情地說：「每次都是我接待你們，時間長了有了感情，還真捨不得。」我聽了一怔，也沒有多想。在我們休息等候時，陪同我的一位女士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離，就連上廁所，也每每陪同。這時我才感到有些不尋常。難道真的是孩子出了事！將近中午，我們驅車去一家醫院，上樓正碰上王丹從檢

歲月蒼蒼

查室出來，只見他穿一身肥大的灰色囚服，臉色灰黃，連聲咳嗽。見我們到來，吃驚地問：「你們怎麼來啦！」沒說幾句話，他便被帶走了。我急切地追上去問：「我們還能再見面嗎？」「能！」他們肯定地回答。

下午三時許，監獄長帶來檢查結果，說經檢查腦部沒有發現問題。聽後我很高興。接着他說：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告訴你們，上級已經批准王丹赴美保外就醫，今天就走。我在一張寫好的擔保書上簽了字。

一年多來，我們多次請求，各方奔走，如今，願望終於成爲現實，但我還是不敢相信，只平靜地連聲說：「這樣就好！這樣就好！」我問，今天還能不能見見王丹？監獄長很得意地說：「等一會你就可以見到一個嶄新的王丹。」看得出，他也很高興。

雖然春天已經來到東北大地，但錦州還有幾分寒意。這一天，春風料峭，稀疏的榆葉梅在春風搖曳中凋零。觸景生情，春天到來，又怕它匆匆逝去。

四時三十分，我們來到每次會見王丹的那個房間。沒等多久，王丹着一身新裝，喜氣洋洋走來，像吹來一陣春風，我心頭爲之一爽。我打量着眼前的兒子，同上午判若兩人。深綠格茄克衫，藍褲子，黑皮鞋，是獄方上午剛剛買來的。

歲月蒼蒼

他們還爲我們三人置備了一桌飯菜，但誰也沒心思動筷。

一般情景兩番心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下午五時，王丹走出錦州監獄的鐵門，邁進自由世界。

我們同王丹及接送人員，分乘八部警車，在三輛交通警車的引導下，離開錦州。從錦州到秦皇島幾十公里的大路旁，隔不多遠便有一個警察畢恭畢敬地站立警戒。一路警燈閃閃，警笛長鳴，浩浩蕩蕩奔向北京，煞是威風。王丹要求同父母坐一輛車，被婉言拒絕了。監獄長說：「你父母坐的車比你的高級，你和我坐一輛車。」此刻，北風已經平息，夕陽西下，凝望窗外，一片春色。此時的心情又較上午舒展了許多。

屈指算來，到錦州來，這次已經是第十八次了，好像只有今天才有心思欣賞錦州的風光。夜幕降臨，暮色蒼茫。隨着車隊的行進，心潮起伏。回想起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第一次接王丹出獄，同是這般暮色，但同今日，卻是兩番心情。

那一次是接孩子回家，這一次是爲孩子送行。

我還清楚地記得，接孩子到家時那一刻的心情。從一九

歲月蒼蒼

八九年六月三日到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七日，整整盼望了三年又八個月，苦苦企盼，多少次夢中同兒子歡聚。如今，孩子真的邁進了家門，真是一刻也捨不得離開他。萬萬沒有料到事隔僅僅兩年，王丹又離開了家，並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以重刑。苦難再次降臨，我們家人以堅韌的毅力承受下來，再次踏上漫長的探監之路。家人像看待珍珠一樣，十分珍視每月一次一個多小時的團聚。王丹八十二歲的外祖父，不顧年邁體衰，從山東到遼寧，看望他唯一的外孫。王丹的小外甥，時常惦念着舅舅，三次隨我們前去探望，每次都纏繞在舅舅身旁，久久不願離去。我們多麼期望祖孫四代共享天倫之樂。

四月十八日當我們獲知王丹已獲准保外赴美國就醫，當天就要離開錦州時，我就意識到，此次出獄，不能接孩子回家，叫我們來，是要送他遠行。

王丹也很想念北京，因為這裏有他的親人，有他的朋友，家中還有他精心選購的一千多本圖書。此刻，他想的可能會更多。

十九日凌晨三時許，車隊進入北京市區。東方已經發白，北京的面貌依稀可見。此刻，王丹一定很興奮。北京一別，一晃一年又五個月，他想念北京，多次要求轉回北京服

歲月蒼蒼



王丹同小外甥在公園。(作者提供)

刑。一路上我還在癡想，兒子離國前會不會准許他到家去看一看，要是這樣，那該多好啊！恍惚中，車隊進入北京後好像一直往北開行。我有幾分激動，難道真的要送孩子回家！忽然，車向右拐，寫着「機場路」的大指示標牌躍入眼簾，我方如夢初醒。

車子在一幢好像是賓館的樓前停下。我們被接進一間接待室，王丹也隨我們走了進來。經過一天兩夜的奔波，此時才算能夠坐下來同孩子說說話，儘管談話是在方方面面諸多

歲月蒼蒼

人員的「陪同」下，不一會，來人宣布飛機上午九時起飛。我立即發問：「怎麼今天就走！不能停一兩天嗎？」引起一陣笑聲。在這樣的場合，發出這樣的呼喚，似乎是「冒傻氣」，但我卻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確乎出自母親的本能。

不一會，王丹的姐姐和八歲的小外甥也被從家中接來。小孩子的到來，氣氛頓時活躍了許多。大家說說笑笑，有意識地沖淡離別前悲愴的心緒。彼此都有許多話要說。他對我放心不下，勸我多到公園去走走，放鬆放鬆自己，特別叮囑我出門、上班，遇有陰天下雨，就打輛出租車，不要去擠公共汽車。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辛苦了一輩子，以後不要太苦自己了；希望他父親工作不要太累，出門騎自行車一定要當心；同他姐姐討論怎樣教育好孩子。我們也再三叮囑他，出國遠行，一定要謹言慎行，自己照顧好自己，出門注意安全。小天天知道舅舅要去美國，一定要舅舅帶他一同去。告訴他，沒有他的飛機票，他眼睛一眨，說：「有啦，你把我裝在紙箱裏，上邊留個孔，帶上飛機。」臨別的話千言萬語。

八時四十分，來人把王丹帶走，我們起身向他道別，但卻被無情地阻擋在室內。沒有道一聲再見，沒有人流一滴眼淚。倒不是感情淡薄，而是我們經歷的磨難太多。

歲月蒼蒼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赴美，父母親王憲曾和王凌雲在送走兒子後，在家中向傳媒記者展示兒子的照片。（路透社）

生活的失落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王丹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雖然遠離家人，但他卻一直是我們這個家庭的中心，他牽動着全家人的心。

王丹身邊不能一日無書。每個月我們都要根據他在來信

歲月蒼蒼

中開列的書目，爲他購買新書，到圖書館借舊書。他姐姐則分工爲他購買新出版的他喜愛看的各類期刊。他在獄中自費訂了《人民日報》，我們則爲他在家中訂了《中華讀書報》、《山西發展導報》、《報刊文摘》、《北京晚報》等等。《讀書》、《新華文摘》、《方法》則是每月必買。購買新書，搜集報刊，月月如此，常年不懈，每月一次探視，總是滿滿的兩大包，報刊每箇月中旬還要郵寄一次。

正是這些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爲他枯燥的監獄生活增添了活力。各類書、刊和報紙，向他展現了一個豐富多采的世界。

獄中生活清苦。每個月探視前，我們都要爲他購買一些基本的營養品和他喜愛的食品。愛吃什麼，姐姐最瞭解。每次逛商店，她總會帶來一兩樣弟弟愛吃的食品。小天天知道舅舅愛吃話梅，有一年，「六一」兒童節，幼兒園送給每個小朋友一袋話梅，他不肯吃，執意要留給舅舅。

爲王丹作後勤工作，多年來，一直是我們這個家庭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王丹的需要就像命令，來信不論要什麼東西，我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滿足他。他吃的苦太多了，不忍心讓他有任何一點失望。似乎我們爲他作任何一點細小的事情，都可以減少我們內心的一份思念。當然，王丹是一個很

歲月蒼蒼

懂事的孩子，要求自己很嚴格。他多次表示，不要給他送太多的食品，認為「到這裏，就是來吃苦的」，家人辦不到的事，從不苛求。

如今，王丹已經開始他新的人生旅程，我們家的生活也將相應發生變化。生活失去了中心，在我們感到輕鬆的同時，也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王丹出獄後不幾天，我猛想起，怎麼還不見小丹來信，因為他自錦州每月固定寫來兩封家信，中旬、下旬各一封。先生說：恐怕到那裏還沒有固定的地址，我才恍然大悟，他已經不在錦州了。王丹摯愛北大，北大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他都關心。為讓他及時瞭解北大，他父親為他搜集《北大校刊》，每期都不肯放過。王丹走後不久，他又去尋找，再一想，已經無法寄給他了。他姐姐來到報攤，習慣地為弟弟選購期刊，轉念一想，他已經去了美國。

四月十九日上午，我從機場回到家中，坐在兒子的房間裏，看着從錦州帶回來的滿滿六箱書刊，再看看那待送未送的四大書架一千餘冊圖書，心中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慨。這沉重的六箱書刊，是我們在那艱難的歲月裏一次又一次地送去的。我心痛孩子，怕他看書太多有損健康，總是叮囑他看書不要貪多，他總是說，身邊有書，心中踏實。如今，這一

歲月蒼蒼

本本內容各異，多姿多采的圖書，可曾知曉，他們的主人已經遠行，歸期渺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與它們為伴！

我們在由長期的、沉重的探監生活轉向一種正常的、輕鬆的生活過程中，還要承受一種失落的心理感覺。

異國相聚

四月十九日，王丹乘坐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當天晚上到達底特律，住進亨利福特醫院，接受檢查。第二天打來電話，通報平安。兒子終於踏上了自由的國土。

中國有句老話，「兒行千里母擔憂」，王丹此次出國遠行，同一般留學生還有所不同。他在監獄中生活多年，長期與社會隔絕。從監獄直接邁進那樣一個陌生的、自由的國度，語言、生活、文化等等，給他帶來的挑戰是方方面面的，所遇到的困難要比一般人多。

王丹出獄後的第四天，聽說他要在紐約舉行記者會，我非常關注，擔心他在眾多媒體面前把握不住自己，出言不當。不久，香港一位朋友給我寄來招待會現場錄相帶，看到他的講話和答記者問，我感到欣慰。

王丹出國後，許多記者朋友問我什麼時候去看望兒子！說實在話，當時我最強烈的願望不是立刻去看兒子，而是想

歲月蒼蒼



王凌雲正在與兒子王丹通電話（一九九八年四月）。（明報資料室）

安靜下來，休息休息。我實在太累啦！

在各方面的促進下，我決定八月份前往美國探親。辦理護照和簽證都比預料的要順利。八月九日，我在女兒和外孫的陪同下，乘坐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三藩市，於當地時間下午二時到達。兒子在朋友的陪同下，早已在此迎候。當我們在一樓大廳等候出關時，王丹和衆多記者朋友跑到二樓大廳，透過玻璃，向我們揮手致意。我們走出大廳，王丹

歲月蒼蒼

急忙迎上來，在二十多位記者的簇擁下，藉得出口處的一角，簡單回答了記者們的問題。

記者問的最多的是，見到兒子第一次感覺是什麼？終於可以和兒子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談話了，這是我最大的感觸。九年中，和兒子聚首，絕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談話被錄音、記錄，行動遭到監視。即便是一九九三年、九四年在家中，也不能確定是否裝有竊聽器。如今，我們一家老小來到這片自由的國土，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地相處了；同時，我也感到幾分沉重，這種自由對我們這個家庭來說，又別有一番滋味。

我半開玩笑地對朋友講，九年來，王丹走到哪裏，我便跟到哪裏。當年學潮初起時，我多次去北大；他絕食在天安門廣場，我則住在廣場東側的博物館守候；他被捕入獄，我也隨之被關進看守所；他發配錦州，我不遠千里去探視。如今，我又同女兒、外孫飄洋過海，到美國同他來相聚。幾度悲歡離合，不能不說是中國的悲劇。

當晚，我們乘飛機從三藩市前往波士頓，住在朋友早已安排好的「家」。最初幾天，他忙於考試，白天上學，早、晚回「家」。八歲的小外孫，活潑淘氣，同舅舅打鬧嬉戲。多少年王丹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了（儘管他父親不

歲月蒼蒼



相聚在哈佛大學校園。(作者提供)

在場)，他十分珍視這一幸福時刻。住下後，我首先為他做一頓家常飯，特地做了他愛吃的紅燒帶魚。我們給他帶去一本中國菜譜，打算教他做幾樣飯菜，只是時間匆匆，條件所限，未能如願。

王丹興奮地向我們介紹波士頓，陪我們遊覽哈佛廣場，我們一家老小在哈佛大學校園徜徉。一股幸福的暖流在我心中漾起。兒子要在這裏完成他在北京大學未竟的學業，這是我多年的夢想。

歲月蒼蒼

光陰似水，一個月的相聚很快過去。九月八日，我們再次來到三藩市，齊魯同鄉會設宴為我們送行。鄉親們希望王丹努力學習，為祖國的富強、民主作出貢獻，表示誓作王丹後盾，要我放心。濃濃的鄉情，淳淳的祝願，令我深受感動。

九月九日下午，同王丹和送行的鄉親依依告別。

我期望自己的國家盡快成為民主國家，我們同兒子早日在北京再相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於北京

歲月蒼蒼

母親是我的精神支柱

——《歲月蒼蒼》後記

王 丹

我兩次入獄期間，曾一再告誡自己要堅強面對逆境，尤其是不要在公檢法人員面前流露出軟弱的表現。但兩次都沒有做到。而這兩次失態——在對方面前流淚——都是因為想到了母親。一次是一九九〇年春天，母親到北京市半步橋的公安局看守所看我，結束以後我在囚車上看到她拖着因坐牢而致殘的左腿在寒風中蹣跚獨行的背影，淚水實在無法控制；另一次是一九九五年我第二次入獄，一次夜審中預審人員提到母親，我想起當年的十月是她六十歲生日，她曾表示多少慶賀一下，現在我不僅不能盡此孝道，反而又要拖累她，不禁潸然淚下。因為母親從來不讓我為她做什麼，而表示讓我給她過生日，這是多麼難得；她一輩子可能只想過這麼一次生日，可是我到底又讓她

歲月蒼蒼

失去了機會。記得從小母親周圍的叔叔阿姨們就誇我是個孝子，可是我卻讓母親本應安寧幸福的晚年顛簸動蕩，飽受折磨，想一想真是無地自容。每一想到這些，我只能默默地用「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的古訓來安慰自己。

我是牽着母親的衣襟長大的。還在上小學的時候，去母親的單位——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是我最大的幸福，因為那裏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書庫，就



慈母手中線。（作者提供）

歲月蒼蒼

這樣，我等於在館裏逐漸長大了。母親從未直接地要求我多看書，但每當她看到我鑽進書堆中，或是聽到別人誇我愛讀書時，她那滿意的微笑對我就是最大的鞭策。是母親，為我的一生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讀書。沒有對書籍和知識的熱愛，我是根本不可能度過日後的重重難關的。

母親像大多數經歷過「文革」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但也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在「六·四」的槍聲與血光下清醒了。尤其是我的兩次入獄，使她徹底丟掉了對當權者的幻想，勇敢地站出來為我呼籲。她的行為已經超出了對兒子命運關切備至的範疇，成了不畏強權、爭取權利的象徵。可以說，在我第二次入獄的三年多的時間裏，她不僅比我吃了更多的苦，也比我做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正是她的這種堅強，使我能在獄中樂觀地對待現實，平靜地期待自由。母親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真正的英雄。

講到母親，就不能不提到父親。這幾年，他們在患難中相濡以沫，共同對付逆境和打擊，走過了艱難的歷程。如果說母親更多地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那

歲月蒼蒼



在兒子二十五歲生日聚會會場。(作者提供)

麼父親則擔當起了後勤的工作。父親對政治並不瞭解，但受北大精神熏陶了幾十年的他有着出自基本良知的判斷，不管形勢多麼險惡，他始終默默而堅定地支持着母親和我。

我還要特別感謝年事已高、目力不佳但仍欣然為母親這本書寫序的許良英先生，他不僅是我的忘年交，更是我衷心尊敬、欽佩的知識分子良心的代表。在我入獄期間，他給了我的家庭以極大的鼓勵和幫

歲月蒼蒼

助。

母親的這本書，雖然記述的是一個家庭的苦難經歷，但折射出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在民主、富強之路上的坎坷歷程。我希望這樣的苦難再也不要發生，我希望一九八九年時「天安門一代」年輕學生在廣場上為之奮戰的理想能早日在中國實現。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

於美國哈佛大學



E027

塵劫

張寧

「張寧身受的「林府選妃」這幕大鬧劇，在中國歷史上雖可能絕後，卻並不空前，可是我們如果想找出個傾國傾城受害美人，於事後來現身說法，美人自道，那三千年來，就只此一人了。」

——史學大家唐德剛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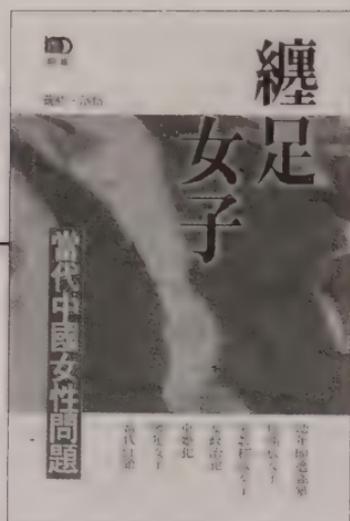


M028

從民運到出家

蘇守忠

蘇守忠曾於 1966 年為天星小輪加價而絕食抗議，引起社會上群眾的關注和響應，繼而掀起反殖民地政府的群眾示威暴動。他曾被捕入獄，也被判入精神病院觀察，及後浪跡歐洲，現已剃度為僧。其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究竟他如何從一個憤怒的激進青年蛻變成一個看破紅塵的出家人？作者在這本自傳中將其傳奇一生娓娓道來，讓人對其人生與思想信念有更深的體會。



E024

纏足女子 - 當代中國女性問題 戴晴等

在中國這個有着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度裏，婦女問題始終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特別在中國實施開放改革政策的時刻，更與古舊傳統的作風有極大的衝擊。

作者在這本紀實性文學作品中，分別從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角度，結合切身的感受和體驗，對與之有關的重大問題或提供詳盡的材料，或作精彩的分析，並向讀者大眾展示中國當代女性某種特定的生活與心理的重要層面。作者希望本書能夠對促進中國當代精神文明建設有所裨益。



L018, L019

叫父親太沉重（全兩冊）

艾蓓

艾蓓這本《叫父親太沉重》是沒法不惹人矚目的——她天生麗質，才情橫溢；她迷離的身世，書中政治人物的「解構」，全都引起媒體沸騰的論斷，社會強烈的反響。

艾蓓不屑充當桃色獵奇的嚮導，也沒有興趣扮演政治黑幕的揭祕者。她只是用綿密柔情描寫「全中國最美好的兩對眸子」的相遇相愛，又用澎湃激情鋪陳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時刻。一個億萬人崇敬的偶像，卻是一個可憐的父親。



E034

誰來養活中國

孔憲鐸

「國以農爲本，民以食爲天。」先人古訓道出農業於國於民之重要。

中國僅擁有全球 7% 的耕地，但卻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預期 2030 年爲十六億）要吃飯。中國農民衆多而純樸，辛勞而貧窮；中國的農業精密而保守，地薄而欠收。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布朗（L. Brown）博士爲文疾呼「誰來養活中國」，它猶如警鐘一樣敲醒了無數高枕無憂的中國人，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大關注，引發了中國一系列的有關研討活動……

「下一個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中國領導者和農業專家沒有半點含糊地給了有力的回答——「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

郵購表格

編號	書名	定價HK \$	數量	合共
E027	塵劫 (張寧)	89		
M028	從民運到出家 (蘇守忠)	69		
E024	禮遇女子 - 當代中國女性問題 (戴晴等)	56		
E034	誰來養活中國 (孔憲鐸)	83		
E037	第四座豐碑 (彭明)	98		
L018	叫父親太沉重 (上) 艾蓓	68		
L019	叫父親太沉重 (下) 艾蓓	68		
海外郵費(平郵掛號/空郵掛號) \$				
總額/港幣 \$				

海外郵費：

1. 海外郵費由讀者負擔，請於郵購時註明郵運方式
2. 平郵掛號費用均為書定價：亞洲區兩成，亞洲區以外（包括日本）三成
3. 空郵掛號費用均為書定價：亞洲區兩成，亞洲區以外（包括日本）二成
4. 每件海外郵件，須付掛號費 \$ 13，保障書籍安全送達

姓名：(中文)
(英文)

日間郵寄地址：
(中文正楷)

聯絡電話：
(日間)

傳真號碼：

郵購請寄：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明報出版社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

傳真郵購：(852)2898 2646
只適用於信用卡付款

付款方法：

附劃線支票 (香港適用)
(抬頭請寫「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用卡付款 (本港及海外適用)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

有效簽署：

(必須與信用卡上的簽名相同)

網上郵購：<http://www.mingpao.com/mpp/>

* 有關郵購價以出版社最新調整價為準

歲月蒼蒼——我與兒子王丹

作者：王凌雲

責任編輯：秦 夢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次：一九九九年一月初版

一九九九年二月再版

一九九九年二月第三版

一九九九年三月第四版

ISBN : 962 - 973 - 059 - 7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我的人獄 (戴晴)
- 我的四個父親——自己的故事(一) (戴晴)
- 在秦城坐牢——自己的故事(二) (戴晴)
- 纏足女子——當代中國女性問題 (戴晴)
- 叫父親太沉重(上) (艾蓓)
- 叫父親太沉重(下) (艾蓓)
- 塵劫 (張寧)
- 補天裂(上) (霍達)
- 補天裂(下) (霍達)
- 冷凍三十年 (王敬之)
- 中國競技體育揭秘 (李氣虹)

母親——中共黨史研究者；兒子——北大歷史系學生。這只是中國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家庭的組合。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改寫了這個家庭的歷史，也從此演繹出中國當代史及民主化建設的一頁傳奇。

王丹母子九年風霜雨雪，幾度悲歡離合，作者娓娓寫來，一筆樸實，滿紙平和。然字裏行間，盡顯慈母柔情，鐵漢錚骨。樸實中現真情，平和裏含悲愴。

書中再現九年滄桑：母子同遭囚禁、探監苦澀心境、判刑上訴爭辯、人權尊嚴訴求、以及自由等同流放的無奈與黯然。其間，親情、友誼、正義、民心，在在使人感慨，亦令人扼腕——為中國人艱難困頓的磨礪，為知識分子的剛直不阿，為追求民主富強的探索！

兒子終獲自由，一頁滿含心血淚水的歷史翻過，母親欣然之餘，仍難抑惆悵：去國萬里，何處是歸程？正是歸去來兮！卻又長亭連短亭……

FACEBOOK
PAGE ONE
WWW.PAGEONE.COM

E041

HK \$ 68

ISBN 962-973-059-7



9 789629 1730598 >